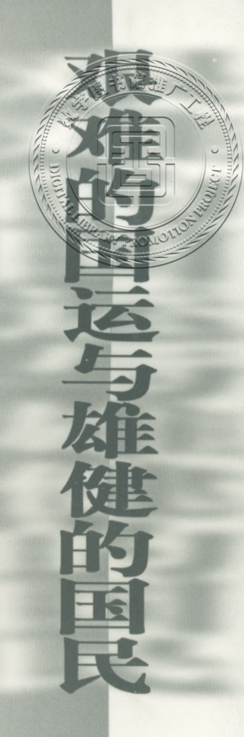
民国奇才奇文





東方出版社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苏曼殊　　天涯红泪

陈独秀　　我们断然有救

李叔同　　禅灯梦影

胡　适　　大宇宙中谈博爱

杨　度　　旷代逸才

王国维　　晚清的最后一个文人

章太炎　　名师骑士

李大钊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宋教仁　　护法使者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于右任　　黄帝子孙之元气

瞿秋白　　多余人心史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民国奇才奇文

李大钊卷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東方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卷 首 语

不到四十春秋的民国在漫长的岁月洪流中不过是历史之一瞬，但它的兴起在中国文明史上却写下了爱国求变者的辉煌篇章。新旧时代更替，中西文化交融，离乱动荡，百废待兴，这就是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给人们以空前的磨难也给人们以难得的机遇。这是一个英杰倍出、群雄并起的年代，既有振臂一呼、万众影从的政治巨人，也有埋首书斋、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这一个个至今听起来都令人激动的名字，无一不表现出卓然不群的真性情、超凡脱俗的真才华。对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讲，他们已成为永远无法复制的神话，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些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不是吗？家赀万贯、寄情有声的风流公子转眼间弃贤妻、别娇儿，伴青灯黄卷，竟成中兴释门的一代高僧；不是吗？开一代学风，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文化的国学大师却匍匐于一个年幼废帝的脚下，以自沉湖底而终；不是吗？狂热的保皇分子，历经坎坷，最后竟修炼成虔诚的共产党员……这种比小说、戏曲情节还要曲折神奇的人生只能出现在这个时代。其人奇，其文

更奇。无论他们是新派博士，还是老式学究；是政坛领袖，还是释门高僧，无一不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真才情。千字妙文，走笔而成；万言长卷，立马可待。这对他们来讲不过是日常小事。观其文，或怒目金刚、叱咤风云，或缠绵悱恻、凄惋欲绝；或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或似山间小溪，空澈明丽。无论治国宏文，还是闲适小品，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中国的文化史、文学史因此而丰富多彩，光芒四射。

有鉴于此，我们从民国众多奇人中选其品性独特、才情超群者，述其生平、粹其奇文，汇为一编，一并推出。既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自信，且可滋润性情，开启心智。相信会有沁人心脾，开人眼界的作用。对有关研究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该书系各卷传记或出传主之手，或由亲友、专家所写。正文选其才气、性情兼具，能体现作者风采者，以类相从。后附生平大事年表。阅读全书，可对其人其文有新的了解。倘读者诸君能有一二收益，则选编辛劳之余倍感欣慰。还愿高明之士多多指正。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五月

目　录

家国世情

妙手文章

译文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李 葆 华

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是父亲的九十诞辰。我在父亲身边生活的岁月并不长。但是，我父亲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的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及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等事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鞭策、教育着我。

一

一九一八年七八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渤海之滨的故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的喜庆气氛。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近黄昏，公园里仍然人山人海，拥挤非常。父亲带着我们来到按照克林德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地反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和卓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前者是他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演稿，随后又在中央公园的庆祝大会上讲过一次。父亲在这两篇著作中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预言，布尔什维克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尽管我们当时不能真正理解父亲的见解，但他那种欢欣鼓舞的热烈情绪，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父亲的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父亲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武器，奋起向旧世界宣战，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五四运动时期，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月刊的总编辑。这个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有分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以"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团体，是五四时代一个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父亲等人为争取确立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主义方向，多次同学会内的国家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后来，由于会员成份太复杂和时局的激烈变化，到一九二五年终于分化了。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许多早期的党员，如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高君宇、蔡和森、

恽代英、张闻天、罗章龙、张申府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学会。

二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夏季的五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父亲进山以来，他就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疾书。只是在工作实在疲劳时，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

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三

一九二二年底到一九二四年初，父亲经常不在北京，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

力工作。早在建党初期，父亲就通过林伯渠同志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党的二大、三大正式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父亲受党的委托，负责同孙中山先生联络，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精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由于父亲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依靠少数地方军阀不成，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正式确定了"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父亲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大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担负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领导工作。

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事业中，父亲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他的真诚帮助非常感动，对父亲的为人也极为钦佩。父亲很敬佩孙先生，认为孙中山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离开日本北上，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组织了盛大的欢迎，父亲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此后不久，孙先生不幸病逝，父亲异常悲恸。中共北方区党委组织了大规模的隆重的追悼活动，父亲是孙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扶灵。在开追悼会那天，《晨报》上专门刊登了父亲步出中山堂的照片。

四

一九二四年底，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加快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促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大分化。冯玉祥的"倒戈"，以段祺瑞为首的段、张、冯三派联合政府的成立，使北京的政局变得异常复杂。

那时父亲正在苏联，他是五月里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大会结束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父亲在苏联又逗留了一个时期。他到各地参观、访问、考察和讲演，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俄文。在苏联期间，父亲给家里来过几封信。他那时化名"李琴华"。父亲曾写信向家里要一件皮大衣，看来他是打算在苏联至少过了冬天再回国。他非常渴望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多走走，多看看。然而，他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北京政变的消息使父亲再也住不下去了。十一月份，遵照组织的决定，父亲怀着"回到战场上去"的战斗激情，回到了祖国。

父亲回国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北方地区执委会，由父亲全面负责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五年初，父亲和中共北方区执委在广大北方地区大力开展工作，党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各阶层人民中间，进行着非常活跃、卓有成效的活动，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大批党团员。我也是这个时期加入共青团的。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北方区党委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利用寒假培训骨干力量。党校设在距沙滩不远的北大三院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学员主要是北京的党团员，也有从北方其他省市来的，学习时间约一个月。一九二六年春节前后，我每天到党校参加学习。党的领导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亲自给我们讲课。他们除了讲

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外，也讲国内国际形势。最后一课是由父亲讲的，讲课的主要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的《政治生活》上。后来毛泽东同志把它收入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学员学习。

父亲很早就开始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又说："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他花了很大功夫调查、统计、研究土地问题。父亲在讲课中特别强调了依靠农会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五

中共北方地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对北京政变后的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当时段祺瑞虽是临时执政，但他手中无兵，只有一个几百人的卫队；奉系军阀张作霖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比较强大，是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公开打出"反直倒曹"的旗号后，还有一点同情革命的表示。他的国民军曾提出"不扰民、真爱民"的口号，并从故宫中轰出清末皇帝溥仪，一时颇得社会上好评。北方区委分析了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认为应当争取冯玉祥，特别是国民军，经过做工作之后，有可能争取它倾向革命。因此，北方区党委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张的革命策略。

父亲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工作。父亲还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后来，国民军各军中有不少负责工作是共产党员担任的。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行动是党组织统一布置的，我也参加了。群众来到段祺瑞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瑞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当天晚上，总指挥韩麟符向父亲汇报当天群众运动情况。父亲听到我们同国民军的士兵发生纠葛时，即表示同国民军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党对国民军的一系列争取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国民军的驻防区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往往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三一八”惨案后，冯玉祥解除了段祺瑞的卫队的武装，对段屠杀人民群众表示抗议。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向北京进攻，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国民军一位旅长跑到父亲住所，恳切地要求保护父亲出京，到他的部队里暂避一时。父亲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父亲牺牲以后，冯玉祥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戴孝，悼念父亲。国民军同情革命的倾向，为我党发展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父亲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北京等地的国民党市、区各级党部陆续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国民党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父亲牺牲前的一段时间，由父亲主持北方国民党的工作。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中共北方

区委专门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陈毅同志领导。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很多要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加入国民党，给国民党带来了革命的生气。其中的许多人从国民党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当时我们党内的同志们在谈话中，常常称国民党是“民校”，共青团是“中学”，共产党是“大学”。这些表明了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我们党与国民党合作，推进了革命向前发展。

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父亲始终坚持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作了尖锐的斗争。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之流反共反人民的面目一天比一天暴露得清楚了。他们处处同共产党和革命的左派作对，使用种种手段破坏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早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就要取消父亲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父亲代表我党同志发表了“意见书”，坚决回击了右派的进攻，使他们的阴谋破产了。孙中山逝世后，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立即“宣布开除”父亲等共产党人，同上次一样仍然未能得逞。一九二六年年初，国民党市党部在翠花胡同一号举行了一次升旗典礼，这次升旗典礼是针对右派另立伪市党部的分裂行为而举行的。父亲在典礼上发表了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讲。这天父亲回到家里以后，向我们讲起同国民党右派的这场激烈斗争。他说，右派只讲“青天白日”，那怎么行，我们还要“满地红”嘛。后来在国民党市、区党部的选举中，左派大获全胜。

在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派的代表人物曾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分化以后，他同共产党成了死对头。有一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三院召开大会，曾琦要发表反共讲话，党组织事先得到消息，发动了许多

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前去参加。曾琦刚上讲台讲了几句反动话，听讲的群众就高喊“打倒国家主义！”的口号，随后大家又“嘘”又“轰”，曾琦十分狼狈，连忙从讲台上溜下来，偷偷地逃掉了。其后不久，还是在这个礼堂里，父亲发表讲演，党组织组织了纠察队，防止国家主义派捣乱，大会开得十分成功。

六

“五卅”运动前后，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进入新的高潮，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迅猛异常，尤其是北京，几乎平均每个星期都有一次游行、示威或请愿、集会。父亲是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者，他总是亲自参加重要的群众运动，做实际的领导工作。他是一位重实践不尚空谈的革命活动家。

一九二六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父亲始终同群众战斗在一起。那天我跟着团组织活动，事先不晓得父亲也来参加示威请愿。由于前一天曾发生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丧心病狂的反动军阀政府，竟然动用排枪、刺刀，大肆屠杀无辜群众。

血腥的镇压完全是段祺瑞执政府精心策划好的。段对国民军十分不放心，把门卫全部换成他自己的卫队，还预先埋伏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有一位青年爬到大门一侧的石头狮子上讲演。就在这个时候，段政府的卫队朝这位青年开了一枪，成为镇压群众的信号，于是一场残酷野蛮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许多事先埋伏的军警，纷纷钻进人群中，一边咒骂，

一边用手枪射击。无数爱国青年在排枪、刺刀和大刀下牺牲了。在混乱中，我随着人流，向铁狮子胡同东边奔去，终于避开了刺刀和枪弹，跑了出去。事后得知，从西口走的同志大多数牺牲了，大部分人是从东口跑出来的。

回到家里，听母亲说父亲也去了，而且一直没有回来，她和妹妹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直到很晚了，父亲才进门来，他的脸和手都负了伤。原来，那天他和赵世炎同志在天安门前主持完抗议帝国主义挑起大沽口事件的十万人大会，也赶到铁狮子胡同参加群众的请愿示威。惨案发生后，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迅速离开现场，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最后他才从胡同东口撤出来，立即到党机关所在地，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一切安排好之后，他才回到家里。见到了他，我们全家松了一口气。听完父亲的讲述，他那种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为了革命的利益丝毫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们全家。

七

“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我国北方的革命运动开始转入低潮，段祺瑞执政府再三通缉父亲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北京的反革命气焰一时嚣张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父亲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这时我们的家几经辗转搬进了朝阳里三号，父亲虽然不在家里住，但每天仍有许多书信寄到朝阳里来，其中有每周一期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书刊，各种文字的都有，几乎每个星期都积存很多，由我送给父亲。

我的另一个任务是给要求同父亲谈话的人传信。来见父亲的人很多，除了青年人外，还有一些进步教授、军人等。尽管父亲的工作很忙，但对每个要求见他的人，不管是什么身分，都要尽量挤出时间来接待。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很想同父亲谈谈，父亲把他请了去，谈话后，又把他介绍到广州去参加革命。“三一八”前后，李立三同志从南方到北方来办事，住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得知反动派发现了李立三同志的行踪，立刻派我到北大送信，让他立即转移，使李立三同志安全脱险。

反动的军阀政府极端仇恨燃烧在它身边的革命火种。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敌人突然包围苏联大使馆，进行了蓄谋已久的大搜捕，父亲等一大批革命者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那天我偶然因事到西郊去，才免遭这场横祸。

父亲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以昂扬的斗志，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他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父亲的朋友们把我隐匿在他们家里，我只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当时所谓的“党案”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每天报上都登载有关的新闻。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父亲在敌人法庭上大无畏的革命形象。报上说：“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等等。

父亲一生热爱真理，崇信真理，曾为寻求真理历尽辛苦，走过不少崎岖的路。但只有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才真正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谛。从此，他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念，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

崇高理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正像父亲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的一样："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父亲正是怀着这样高尚的革命情操，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父亲是为建立新中国为世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的，他死的伟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等千百万革命先烈英勇牺牲、鞠躬尽瘁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他们为之献身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在全世界实现。我们要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继续先烈开创的革命事业，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铁肩道义

隐 忧 篇

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

蒙藏离异，外敌伺隙，领土削蹙，立召瓜分，边患一也；军兴以来，广征厚募，集易解难，饷糈罔措，兵忧二也；雀罗鼠掘，财源既竭，外债危险，废食咽以，财困三也；连年水旱，江南河北，庚癸之呼，不绝于耳，食艰四也；工困于市，农叹于野，生之者敝，百业凋蹶，业敝五也；顽梗未净，政俗难革，事繁人乏，青黄不接，才难六也。凡此种种，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矧在来兹，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正巨也。悬测逆睹，厥要有三：

一党私　　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而何以吾国政党甫萌，遽断断焉警之、惕之、箴之、戒之、诋之、祺之，甚至虑为亡国之媒者。岂吾华历代君主失国之际，均豫有党争为之朕，而有以促其亡，俾后之人受历史之迷惑，一闻党字，遂谈虎色变，而

以旧历史之眼光，视今之政党欤？非也。唐之清流，宋之蜀、洛、朔，明之东林、复社，均一时干国英杰，使在今日，吾人且铸金事之。徒以君子小人，有如水火。一方既以道义相号召，则嬖幸之流，恐不见容，遂而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正人义士，排挤倾轧于无余。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讵以时之今古而殊耶？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党界诸君子，其有见及此者乎？盍早图之。

二省私　　中华建国，版舆辽阔。昔者山川睽隔，交通尼阻，风俗之异，言语之差，胥以地理之关系，为疏通结络之梗，则界域之见，存乎其间，势必然也。然以中央权重，集中于一，前此省见，殊未与政治上以影响。逮满清末叶，各省督抚握权渐重，益以政运趋新，地方日增活动，省见因以稍启。革命军兴，各省以次脱离满清羁绊，宣告独立，自举都督，此不过一时革命行军之计画也。而孰知省界之分，以是及于人心者匪鲜耶。试思一国设省，一省设县，纯因地理人情之便而划之政治区域，其土地犹是国家之领土，其人民犹是国家之国民，宁可省自私之。乃近顷用人行政，省自为治，畛域日深，循是以往，数年或数十年后，势至各省俨同异国，痛痒不关，即军事财政之协助，系乎国家兴亡者，将亦有所计较而不为矣。至神州粉碎，同归于尽，始追悔痛恨于向者省见之非，晚矣！

三匪氛　　历稽载籍，一代兴亡之交，其先必匪乱丛起，良以失政之朝，民多怨之，加之饥馑荐臻，灾异迭见，于是枭雄乘之，狐鸣篝火，愚惑斯民，凡以欲遂其帝王事业之私图也。明之亡也，流寇遍天下，即无满清之西侵，亦决不能永其国祚，而黎元之遭其糜躏，亘数十年，亦不堪矣！民国之兴，基于大义，用兵不过三阅月，成功

之速，为东西历史未所有，吾华之幸，抑亦吾民之幸也。然窃有忧者，则匪氛之起，不在满清末运，而在民国初年。何则？战后之兵，蛮野浮动，在伍时既大肆劫掠，退伍后仍将流为盗寇，则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其因一；愚民不识共和为何物，教育不克立收成效，责以国民义务，群惊为苛法虐政，起而抗变，其因二；一度战乱，元气大丧，民间愁苦怨嗟，实为乱阶，其因三；左道之流，造谣惑众，此次革命，引起此辈帝王思想，其因四。怅望前途，不寒而栗，黯黯中原，将沦为盗贼世界，吾民尚有噍类耶！

以上三端，百思恐不获免。凡百君子，其有以嘉谋嘉猷而弭于未然者乎？曷有以解我忧？

（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大哀篇

嗟呼！斯民何辜！天胡厄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暴秦以降，民贼迭起，虐焰日腾，陵轧黔首，残毁学术，范于一尊，护持元恶，抑塞士气，摧折人权，莫敢谁何！口谤腹诽，诛夷立至，侧身天地，荆棘如林，以暴易暴，传袭至今。噫嘻！悲哉！此君祸也，吾言之有余痛矣。然自满清之季，仁人义士，痛吾民之憔悴于异族专制之下，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侪类，言之者瘏口哓音，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以获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镌心，志兹硕德，亦欣欣以祝之曰："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

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此非过言也。试观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脂膏耶？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归而犹给吾蠢百姓曰："吾为尔作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抑吾闻之，各党之支分部，因选举耗用者，动辄数万金，此其所需，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夫此踞要津享大名者，充其极不过一总统、一都督耳，否则两袖清风之空衔伟人耳，既无邓氏之铜山，更乏郭家之金穴，顾安得此巨金者，其故不大可思乎？或谓子殆不知政党之作用，故讥之无完肤。曰：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

共和后，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其今日一榜，明日一榜，得勋位、嘉禾、上将、中将者，要以武人为多，而尤以都督为横，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其抗中央也，则曰："吾拥护民权也。"其胁人民也，则曰："吾尊重国法也。"究之，国法当遵，而彼可以不遵，民权当护，而彼可以不护。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托辞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则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其力复散在各省，故民之受其患也较轻。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则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

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

嗟呼！今之自命为吾民谋福利护权威者，竟若是矣！吾民更奚与共安乐者，耗矣。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重以库帑空虚，岁出增巨，借款未成，司农仰屋，势不能不加征重敛于民。民既托庇于其下，在理当负斯责，亿辛万苦，其又何辞。然求于民者民应之矣，民之切望于国家者，乃适得其反。呜呼！吾民乃委无望矣。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试观吾国，版图若兹其阔，民庶若兹其繁，江河贯于南北，沃野千里，天府之区也。苟有善治者，不待十年，丰庶之象，可坐而睹，而锋镝扰攘之余，为之国家者，不有以解其倒悬，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呜呼！国家至此而穷于用，则吾民之所以牺牲其天秩自由，而屈其一部以就范于国家之下者，果何为乎？然是岂国家自身之咎哉？夫今之为政者，匪不纲其政缔以示斯民，若社会政策也，保护制度也，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狯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吾惟哀吾民而已矣！尚奚言！

（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暗杀与群德

暗杀可倡于有德之群，不可倡于丧德之群。暗杀可行于英雄，不可行于盗贼。暗杀行于英雄，则锄奸诛佞，长义侠之风，功乃比于甘露杨枝。暗杀行于盗贼，则摧贤害能，启残忍之端，祸乃深于洪水猛兽。而行暗杀者之或为英雄，或为盗贼，实其群德有以范成之。是暗杀之风，所以不可长于群德堕丧之国欤！

战国之际，任侠成风。秦暴而荆卿献匕，韩亡而子房椎车。流血五步，壮快千秋，斯以知其时群德之昌也。三韩既并，重根一愤而断藤，载明一愤而刺李，斯以知韩社虽屋，其群德尚未衰也。晚清之季，吾族男儿，慨中原之陆沈，愤虏廷之误国，相率乞灵于铁血者，则有吴樾之炸五使，徐伯荪之殪恩铭，燕都桥下，精卫飞来，良弼门前，彭公尽节。一瞑不顾，视死如归，群德将有复活之机，遂以开民国方兴之运。而孰知夫昔以殄民贼者，今乃伤我国士；昔以功我民国者，今乃祸我民国。神州光复之后，吾群德之堕落，乃反有江河日下者哉！痛矣，吾群德之衰也！

夫世之衰也，任侠每流为盗贼，衣冠遂沦于禽兽。盖天良一灭，万法无灵，而德义节操，不复能矩范于残暴之群。则向者崇侠之风，适开今者好杀之渐；犯禁之习，遂以为蔑理之阶。而嫉良妒能，仇怨相寻，杀机环报，宁有已时？毒戾之伧，贪利忘义，更敢于杀人以图酬赠。朝缠黄镪，夕弄黑铁，其去率兽食人者几何哉！则所谓手枪炸

弹，譬诸甘露杨枝者，其于群德堕落之国，功能或有穷时也。

抑暗杀者，不获已之举也。仁人志士，本悲天悯人之苦衷以出于暗杀，大不幸之遇也。惟以反抗暴力之故，有不得不需乎暴力者；以毁灭罪恶之故，有不得不蹈乎罪恶者。纵赖以为斯民除暴，而其深自忏悼者，终其身弗能怡然自安。仁人志士，疾恶若仇，犹必不获已而出此，且引以为大不幸焉。及强暴者为之，反恃此为快心之具，以济厥奸，滔滔祸水，流毒尚有穷时耶？

桃源渔父，当代贤豪，不幸而殒于奸人之手。死之者武士英，所以死之者群德也。群德非能死渔父者，群德非能使武士英，死渔父者，群德之衰，武贼之流，乃敢出没于光天化日之下，以行其滔天之罪恶。群有巨憝而容之，群有彦俊而无以卫之，乃渔父之所以死耳！然则渔父之死，非死于群德之衰而何也？非其群杀之而何也？昔晋灵公患赵宣子之骤谏也，使钼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夫麑，灵公之鹰犬耳，乃为民爱贤，为君守信，不惜杀身以殉。今渔父奔走南北，调洽统一，天以大任责斯人，生民利赖，旷世难遇，而栖息于其群者，遽戕贼之，俾赍志以殁。呜呼！黯黯中原，并钼麑其人者，亦不可得，吾于是益悼吾群德之衰矣。悲夫！

（1913 年 5 月 1 日《言治》月刊第 1 年第 2 期）

原 杀

天祸中国，杀机四伏，怨气郁蒸，愁云漫空。或争权固势，煽动兵机；或邀宠希恩，杀人献媚；或擅含沙之技，弹肉横飞；或极愤世之心，饮刃自裁。同兹世也，人何以慈祥乐利，吾何以残暴愀哀。同兹时也，人何以熙皞雍和，吾何以恣睢怨戾。光风霁月之天，乃一变而为血浪磷光之域。耗矣哀哉！吾少典氏之子孙，不死于暴君，不死于强敌，不死于水火，不死于疫疠，而将死于互杀、自杀以无噍类也矣！呜呼！岂不痛哉！

夫好生恶死，物之性也。爱平和，疾残暴，又人之情也，今之人胡以反是。生也弗乐，死也弗悲，背平和而蹈残暴，是物失其性，人失其情，天地失其常。顾天犹是此苍苍者也，地犹是此莽莽者也。江山草木，景物依然，东南未倾，西北未折，则又生息于其间者，有以造其象，天地乃因其象而易其常，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数月以来，宋遁初殂于沪滨，徐宝山死于扬州。手枪炸弹，争鸣南北。政会之所，蛇影杯弓。团而曰血光，党而曰暗杀，不祥之言，闻之骇愕。同是有生之伦，苟无绝大冤仇，乌忍置之死地。同负有觉之躯，苟无绝大罪恶，讵可绝其生机。今竟悍然行之，甚且善恶不辨，恩怨无关，受命黄金，遽逞黑铁，暴兽相食，曾不是过。是谁作俑，拨此杀机，其肉岂足食乎？

暗杀之祸未已，自杀之风又方继轨以来。顷者，保定军官校长，蒋方震自行枪杀。呜呼！社会恐怖，人生厌

倦，至兹已极。而环顾大宇，种种现象，有以造人间厌苦愁怨之思，开社会险恶恐怖之端者，尚滔滔乎不知所届。棘地荆天，晦冥闭塞，前途绝望，人生难安，不及十稔，中原其大乱乎？世有仁人，岂忍坐视四亿同胞惨痛以死而不救也。救之之道奈何？亦曰弭杀而已。

今欲论弭杀之术，不可不先究暗杀、自杀之原。暗杀何由而起乎？论者佥谓起于政治之不良。清之季世，摧折民权，一二精诚先烈，起而与之抗战。彼时权威赫赫，羽卫众多，将欲惩其元恶以警众厉，势不能不出于暗杀，于是徐、吴诸公首开暗杀之先路，断头绝脰，有所不辞，而暴俄专制毒压，暗杀亦至酷烈，则暗杀起于不良政治，彰彰明甚。顾共和肇建以来，暗杀之风转而愈倡愈炽者何欤？谓今日共和政治果遂为至良政治，吾不敢断言；然谓今日共和政治，其不良乃较前清专制政治为尤甚，吾斯亦未之敢信；则暗杀之所以炽盛于今日者，不良政治之余波耳！不良政治基于暴力，为世间一种罪恶；暗杀手段亦基于暴力，亦为世间一种罪恶。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除罪恶，以毒攻毒之计也。稍有不慎，贻害靡穷。今不良政治既倒，而随不良政治发生之暗杀手段，尚依然效用于人间。专制之暴力熄灭，暗杀之手段横行；专制之罪恶澌除，暗杀之罪恶滋长；有以知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于此不思所以弭之，涓涓一滴，酿为横流，其患害人间，实有烈于洪水猛兽者矣。今欲弭之，非残杀恐喝之能为功，亦非严刑密法之能奏效。盖夫一时人心既陷于狂涛之中，其间实有无形之魔力驱策之，使入此潮流，纵或威之以祸，尼之以力，彼亦有所不顾，惟感之以至性，动之以至理，启其悔悟，辟其迷惑，灵明一念，或有向阳之机。为今之计，吾人当发挥正义，维护人道，昭示天地之常则，回复人类之

本性，俾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则平和自现，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则暴力自隐，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恶，则罪恶自除。人心一念之悔，万象昭苏之几也。凄怆愁苦冤仇恐怖之天地中，涌现光明和乐之域，即在俄顷，万种杀机，一切恶根，胥如春雪朝露，阳光一耀，倏焉销灭矣，是在吾人心造之耳。

自杀又何由而起乎？宇宙万象，影响于人类精神上之变化者至极复杂，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即如蒋君自杀一端，就蒋个人观之，则出于一时愤激。就其愤激之原因考之，则又原于校事棘手，其影响及于一人，其原因基于一事，其愤激起于一时。若就社会现象观之，则蒋君自杀之现象，实为无量之他种社会现象促动之结果。模仿其一也，激昂其二也，厌倦其三也，绝望其四也。积此种种之心理现象，而缘于一事，发于一朝，其所由来者渐，其所蕴积者素，而所以激发此心理现象者，实为其对象之罪恶的社会现象也。人类富于模仿，有不知不识而从其途辙者，乃社会力之一种。今人轻身好杀，相习成风，自清季已然。陈天华、潘宗礼、杨笃生诸先辈，均以爱国热诚愤极蹈海而死，自杀之端遂倡于国，而接其踵者时有所闻，则模仿之力也。鄙陬之乡有自裁者，其家人或多相继出此，且有以同一方法行于同一场所者，庸俗不察，指为冤魂作祟，抑知此亦模仿之故。然发现此等事实之家，其家庭隐痛必有难言者。故蒋君之自杀，模仿或其一因，而校事棘手又其触发之机也。复次社会不平，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光复以还，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纷紊，世途险诈，贿赂公行，廉耻丧尽，士不知学，官不守职，强凌弱，众暴寡，天地闭，贤人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稽神州四千余年历史，社会之黑暗，未有过于今日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轻生而自杀，激之使然，乌足怪

者。复次政俗不良，人心厌倦之思，世之衰也，忠贤放逐，归隐林泉，其极乃至厌倦人世，饮恨自裁。在昔暴秦肆虐，仲连蹈海；楚国不纲，屈子投江；一瞑不顾，千古同悲。而清洁之流，不为世容，相率黄冠草履，歌哭空山者，征诸史册，尤不可以缕指数；则厌倦浊世，宁蹈东海而死，古今有同兹感慨者矣。复次绝望亦为自杀之最大因缘。自古忠臣殉国，烈女殉夫，临危尽节，芳烈千秋，此其忠肝义胆，固可歌可泣，有足称者。然人见忠臣之殉国也难，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国也不难；人见烈女之殉夫也难，而烈女之所以殉其夫也不难。盖忠臣烈女之所望于其国于其夫者，至恳且厚，举其毕生之希望既寄于其国其夫，一旦国危夫死，天长地久，绵绵无尽，更无可望者，则其殉之以出于自裁，其精神上实死，而愉快有甚于生而痛苦者焉。满清末造，吾人犹有光复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虽压迫横来，而吾人以有前途一线之望，不肯遽灰其志，卒忍受其毒苦。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无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伤心之士，安有不痛愤欲绝，万念俱灰，以求一瞑，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也。呜呼！社会郁塞，人心愤慨，至于此极，犹不谋所以救济之。世变愈急，人生苦痛且随之益增，而生活艰窘，饥寒更相困迫，佛说天堂而天堂无路，耶说天国而天国无门，万象森罗中，但有解脱之一路，即自杀是也。哀哀禹域，神明胄裔，行见其相杀、自杀以终也。然则求之荒渺，探之幽玄，毋宁各自忏悔，涤濯罪恶，建天堂天国于人世，化荆棘为坦途，救世救人且以自救，茫茫来纪，庶尚有生人之趣乎？呜呼！

（1913 年 9 月 1 日《言治》月刊第 1 年第 4 期）

政客之趣味

凡有觉性之动物，孜孜兀兀，不少怠荒，以从事一种勤动者，必有一种兴趣蕴于其间。彼既役于此种兴趣，则虽一往直前，生死以之，罔有憬悟。求所以自崖而反者，此纵下级动物，而所以成其奋勇不倦之精神，要有其兴趣可言，而亦为有味的生活也。希腊史学家Slcalus尝记一极小动物名猫鼬者，专寻鳄鱼卵而破坏之，为其一生事业。夫猫鼬之所以破坏鳄卵之心理，虽不可知，而其破坏之也，必有其高烈的兴趣焉。蜣螂一物，专以转弄粪丸为其本能，方正横斜，推行自若，顽童儿见而拨其粪丸，犹抱持弗忍舍。夫蜣螂之所以转弄粪丸之心理，虽不可知，而其转弄之也，亦必有其高烈的兴趣焉。吁！今之政客，鸡鸣而起，孳孳焉日在恶浊之政海潮流中求生活，其兴趣不知较猫鼬之破鳄卵、蜣螂之弄粪丸何若耶？

夫兴趣之发生，必其事物足供当时之愉快，或有未来之希望者。前者为消费的兴趣，同时付以代价，同时即取得报偿，行为终而兴趣随尽，其味较短；后者为贮蓄的兴趣，当时付以代价，异日方取得报偿，行为虽终，而兴趣尚存，其味较长。政客之兴趣，无论其存于当时之愉快，或未来之希望，而其眼光直射之目的物，要不出二者。然斯二者之数量有限，而政客之欲望无穷，此足为政客抱无涯之悲观者也。

国务员座位辛亥之役，侥幸成功，一时牛溲马勃，托开创丰功以猎得高厚爵者不乏其人。而一般人胸中之官之

势力，未能遽随专制之形影以灭，由是引起幸进之心。而国务员之座位，遂为多数政客目光集注之所。顾国务员位仅十数座，乌能充尔许人之欲望，势乃不得不出于奋斗，奋斗之结果，亦终为强有力者所攫去。一人捷足，万人向隅，此目的之难达，政客宁不知之。言念及此，当亦有索然寡欢者矣。

黄金　黄金在今世为最有雄大势力者，人尽爱之，何独政客！然政客虽爱黄金，黄金不怜政客，而秦楼楚馆、赵女吴姬、歌舞场中，正为政客出没之地。明敲暗剥，所得几何？裘马长安，不崇朝而床头金尽矣。闻之欧美政客，大都富裕之族，衣食无忧，始投身政帜之下；其有事畜之责，或操赢计奇、权衡子母、欲致陶朱之富者，则相率入于实业之一途，决不向政界问津。则求黄金于政界，窃恐为一场黄粱新梦，徒供其宽绰糜费而已。积邓氏之铜山，辟郭家之金穴，其何能望！斯尤足使政客灰心短气者也。

鬼混的生活　斯二者既已失望，则其兴趣顿减，而成为鬼混的生活。盖政界者游民之活动场所也。不问谁何，一入其中，即为洪鈩所镕冶。荒奢逸惰之余，即或厌倦此生涯，亦不能去而之他。为生活计，尤不得不鬼混其间。清夜自思，觉扰扰终朝者，尚不如猫鼬之破鳄卵、蜣螂之弄粪丸，犹为有味的生活，其病苦实有异乎恒情者矣。嗟呼！政客之生活，为鬼混的生活，政客满民国，民国遂亦为鬼混的民国。年来政象之奄无生气者，以此耳！

（1913年9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4期）

是非篇

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豪强霸世，扼抑真机，元恶首虐，僭据崇位。跼其下者，忍痛弗呻，口诽腹谤，诛夷立至，是其慑之以威者；曲学阿世，创言纲纪，人心道术，为所柔敝，敢有正直，嗤为大逆，是其笼之以术者。神州数千年，是非颠淆，心死道丧，芸芸有众，举其本于良知、发于天性者，弗克激于心而发于声，以共白于世者，政教有以戕贼之也。

顽凶既戢，黎元其苏。言论自由，如水决堤，潮流横溢。共和建造以来，海内言论界各标帜志，立论建议，策嘉谋猷。嗫嚅趦趄、踏天跼地之余，一旦脱其钤制，亦得飞眉舞色，张口伸舌，论天下事，抑何大幸。然事之束制愈酷者，其外伸之力亦愈大，冲怒决放，必趋于极端，而不获自限，其弊害乃与所欲矫者两无所择，则放言横议之究竟，天下真是非转为言论所淆混，斯又幸中之不幸矣。

今之以言论号召于天下者，多挟其党见之私，黄钟瓦缶，杂然并作，望风捕影，各阿所私。上焉者或无成见存于其间，只以同异之党伐，而正直之灵明，深蔽牢锢，遂不自知其失当，伺瑕蹈隙，抗辩攻讨；下焉者则如桀门之犬，嗷嗷吠尧，不惜出违心之论，肆口罗织，国体之荣辱，人格之保丧，外界之非笑，均所罔顾，惟以博其主人私党之快意。此以是相寻，彼以是相报，是者非之，非者是之，反唇相讥，循环无已，驯至恶声遍于国中，士庶之听闻，亦因以大惑。嗟夫！言论庞而是非乱，言论伪而是

非湮，是非由乱而湮，人心世道之真，遂以全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真理大义，暗而不明，郁而不彰，世人为所迷瞀，亦各因其所欲焉。以自为是非，悲夫人心纷而不固，必不合矣，彼汲汲于是者，犹不知所自返。循兹以进，国家将为说士裂夫，言论所以明是非者，是非乃反以是而泯，或亦主持言论者之所大痛者欤！

抑吾更有哀者，此次革命血浪中仅涌出有数人物，干国之英，胥在乎是。一年以来，由党见之故，诬蔑轧倾，不遗余力。此党戴为魁首，彼党将视为盗贼；彼党倚为柱石，此党将目为公敌；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一念之私，雌簧百口，莽莽神州，至竟无一完人，遂至激成二种势力相冲相荡，以有今日之乱。苍生水火，膏血横流，未始非莠言邪说之有以启之，此其为祸，不且烈于洪水猛兽耶？噫！

（1913年9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4期）

警告全国父老书

寅卯之交，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娵訾鹑火。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我举国父老兄弟姊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廛市，农夫激怒于甽郊。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以谓有国可亡，有人可死，已无投鼠忌器之顾虑，宜有破釜沉舟之决心。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事亟寇深，危险万状，谨陈斯义，布于有众，皇天后土，实式凭之。

呜呼，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前此痛史，姑不殚述。粗摄厥要，断自甲午。列强在华，拔帜竖帜，均势之局，乃具规模，以中国泱泱万里，天府之区，广土丰物，迈绝寰宇，任何一国，欲举而印度之、势所弗许。即欲攘我权利，亦辄为他国所遏，群雄角逐，赖以苟安。故欲夷我如卢克森堡、比利时者，亦所不能。惟是燕幕之惨，志士寒心，牛后之羞，壮夫切齿，诚以寄生即亡国之基，履霜乃坚冰之渐也。甲午之战既终，日人挟其战胜之余威，索我辽东半岛。外交黑幕，捭阖纵横；坛坫樽俎之间，乃不得不有所迎拒以图一时之牵制。而引狼拒虎之祸，势又缘兹以起，且至不可收拾。

卡西尼中俄密约之结果，旅大租于俄，广州租于法，威海租于英，胶州租于德。意大利闻而生心，亦欲据我三门湾。自是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之声，独立之邦，伏列强割据之迹。若则齐躯竞进，若则单骑独行，铁路告成，矿山斯去，军旗所至，商旅遂来。中更庚子之乱，日俄之争，外力益以潜滋，势力略有转易。凡其利权垄断之域，辄扬势力范围之言，均势之界愈明，瓜分之机愈迫；英之于西藏及长江流域也，俄之于外蒙、伊犁也，日之于福建、南满也，法之于滇，德之于鲁也。或由战胜攻取，或由秘密缔约，或由清廷断送，或由列国协谋，均于其所志之地，攘得不让他国之特权。夫势力范围云者，欧人拓土非洲，分据海岸，而以其后方之地，价定界域，俾隶各国，以避纷争之事也。非洲荒漠之野，欧人临之，视若无物，横行罔忌。而奈何以其施于非洲黑人者，施于吾文化渊源神明遗裔之宗邦，斯其夷视吾国族于何等耶！美之于华，向无领土野心，惟冀扩其商路，见夫列强之植力于华，若兹其猛进，深虑其不利于华者，将亦不利于美。于是其国务卿甄海氏，于千九百年，牒布各国，标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旨在使列强在华之势力，无间何国之于何地，均当与其他各国持平衡之度，勿得擅禁其贸易之权。虽于周缘租借之域，声明势力范围，亦弗许擅自封锢，秘为独有。一面破中国闭关锁国之故习，俾与各国以同一之机会，均沾利益。各国既受此牒，无不阳示赞同，而阴实梗之，美则益奋力以求此主义之实现。其间列强关系，斗角钩心，亦复互思防制。故扬子江流域者，英视为其势力范围也，而有粤汉、川汉二路之四国借款以间之，日本亦于汉冶萍公司及南浔铁路享有投资之权利。满洲者，日、俄视为其势力范围也。而美前国务卿诺克士有满铁中立之提议，同时，中国亦与英、美有爱锦铁路借款之

商榷。虽皆尼于日、俄而未果，而其变相则为四国借款，以振兴满洲实业，改革满洲币制为其用途。磋商妥洽，将有成议，而滔滔江汉，革命怒潮，掀天以起，兹事竟寝。然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至是不可不认为告几分之成功，而中国于此，乃得偷安苟存于旦夕之残喘。革命战后，剜肉补疮，犹患弗给，乃大举借款，以铁路作抵。列强在华之经济势力益密，经纬参差，纤维若织，中国等于自缚之春蚕，列强如争食之饿虎。而蒙、藏与俄、英之关系，较前益彰，各国对我领土之兴味，复从兹而益浓。然均势之基，固未动摇也。是则致中国于将亡者，惟此均势；延中国于未亡者，惟此均势；迫中国于必亡者，亦惟此均势。此列强在华中世之概观，世指为远东问题者也。同时其纷纭杂沓，有与之同符者，即所谓近东问题是。奥斯曼利土厥（即土耳其）帝国之兴也，飘飘半月旗，一挥而蔽欧洲之日月。自十七八世纪以还，一败于奥，再屈于俄，国势日促，外患既不可遏，内忧又复棼乘。巴尔干诸小邦，或前属行省，或久列藩封，以历史所遗种族宗教之痕印，历久未湮，根本一弱，遂纷纷畔离，谋所以自树。列强于此，则利用其种族之感情，阴操其宗主之权，大日耳曼主义与大斯拉夫主义之二大暗流，冲激摩荡，轧轹不已。彼一国一族之隆替，与之连封接壤者，即属异类殊族，亦莫不同其休戚。于是各从其利害之所同，而有三国同盟与三国协商之对抗，三同盟国者，德、奥、意也，三协商国者，英、法、俄也，以保一时之均势，以郁全欧之暗云。此近东之均势，又遥与远东之均势相为呼应，以成世界全局之均势。牵一发，则全身俱动，若待爆之火山，若奇幻之魔窟，风云万变，光怪陆离。巴尔干风鹤一惊，列强莫不皇皇焉戒惧以临，若大难之将至。盖企平和于均势之局，犹厝火积薪以求安也。近年巴尔干两次战争，列

强相戒，勿事干涉，虽能幸免于乱。今以奥储一滴之血，塞人一弹之光，霹雳一声，天惊石破。举世滔天之祸，全欧陆沉之忧，遂汹涌于巴尔干半岛之一隅。余波所及，更与极东之沉沉大陆相接。正如铜山东崩，洛钟西应，而呱呱堕地之中华民国，遂无安枕之日，此欧洲大战及于极东均势之影响也。民国肇造，邦基未安，方期举我全国刚毅强固之人心，尝胆卧薪之志气，艰难缔造，补苴弥缝。内之巩我邦家于金瓯磐石之安，外之与世界各友邦共臻和平康泰之盛运。何图天意难知，祸机卒发，奥、塞构兵于前，德、俄攘臂于后，英、法牵于协商之义，突厥（土耳其）念其累世之仇，黑山国（门的尼哥罗）则救助同族，比利时则捍卫中立，前后数月间，相率沦溺于战祸洪流之中而勿容自拔。我中华民国，爱人类之平和，闵友邦之殃厉。乡人有斗，披发缨冠，同胞互仇，宁容坐视。当夫战牒纷传，羽书四达，我政府体国民维持人道之众意，亦尝东顾日本，西讯彼美，蕲斯三邦携手，近维东亚之大局，远解西欧之惨变。美国政府复电赞同，许与共作调人。日本阳诺阴违，机谋诈变，假日、英同盟之虚名，报还附辽东之旧怨，朝发通牒，夕令动员，师陈黄海之滨，炮击青岛之垒。夫青岛孤悬一隅，德人不过几千，兵舰不过数艘，仅足自卫，乌敢犯人。讵能扰乱东亚之平和，阻塞过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报德也，非助英也，盖欲伺瑕导隙，借以问鼎神州，包举禹域之河山耳。溯自日、俄战后，旅大移租，三韩见并，南满实权，亦归日人掌握，殖民则任意经营，筑路则自由行动，关东有都督之设，铁路为军人所司，黑水白山俨非我有。夫鲁之有胶、澳，辽之有旅顺，相犄角而镇渤海之门户。旅顺失则辽东不保，胶、澳失则齐鲁亦危。旅顺与胶、澳，尽为日本所据，则扼燕京之咽喉，撼中国之根本，而黄河流域，岌岌

不守矣。今日本乘欧人不暇东顾之时，狡焉思启，作瓜分之戎首，逞吞并之野心，故其进攻青岛，迟迟吾行，沿途淫掠，无所弗至，杀戮我人民，凌辱我官吏，霸占我电局，劫发我公库。我政府勉顾邦交，再三隐忍，不得已而划交战区域，冀其蛮行稍有所限制。我国民茹痛吞声，亦勉遵政府之命令，多所供其牺牲。日本犹不自足，更进而强劫胶济铁路，军士肆其横暴，意欲挑起衅端，思得口实，试其戈矛。我国廉知其谋，咽满腔之血泪，忍切肤之奇痛，百般横逆，一味屈从，两国邦交，幸无枝节。青岛既陷，方谓一幕风云，暂可中止，我政府遂向各国宣告交战区域之撤去，本其固有之权，与所应为之事，而在交战期间，对于双方竭诚相与，无左右袒，严守局部中立之义务。凡在友邦，当所共鉴，纵欲加罪，宁复有辞。而孰知竟以撤去交战区域撄日本之盛怒，谓为辱其国体，挟其雷霆万钧之势，迫以强暴无理之条。全案内容，虽未确知，东西报章，已揭其要，析为四项，凡十九条，谨节原文最举于下：

（甲）南满洲及东蒙古

一，辽东半岛之租借，自一九一五年起，展期九十九年；

二，南满洲铁路条约，延长九十九年；

三，南满洲警察行政权；

四，日本人在南满洲应得居住经商及购置田地之自由；

五，安奉吉长铁道租借条约，延长九十九年；

六，承认内蒙古（即东蒙）为日本独享之势力范围；

（乙）山东

七，胶济铁路及所有德国在山东之矿山铁路实业，须无条件的让与日本；

八，烟潍铁路及龙口支路之建筑权；

（丙）福建

九，承认福建为日本独享之势力范围；

一〇，自福建至江西、湖南之铁路建筑权；

一一，福建省内所有矿山铁路及其他实业，应归日本与中国合资兴办；

（丁）一般的要求

一二，中国陆海军应聘用日本人为教练官；

一三，中国财政教育交通各部，应聘用日本人为顾问；

一四，中国学校之教授外国语者，应教授日本语；

一五，汉冶萍盛宣怀借款之事，应办理清结；

一六，凡授给矿山铁路及其他工业之特权时，应询问日本之意见；

一七，若中国有内乱时，应求日本武力之辅助，日本亦担负中国秩序之维持；

一八，煤油特权让与日本；

一九，开放中国全部，使日本人自由经商。

凡兹条款，任允其一，国已不国。况乃全盘托出，咄咄逼人，迫之以秘密，胁之以出兵，强之以直接交涉，辱我国体，舆论激昂，则捏词以诬之；国民愤慨，则造谣以间之。不曰独探，辄曰收买，忽而离间，忽而煽动，一若吾国人皆鹿豕之不如，尽金钱之可贿。至彼报章横议，主兴问罪之师，政社建言，促行解决之策，欲举其详，难更仆数。此日本乘机并吞中国之由来，吾人所当镌骨铭心，

志兹深仇奇辱者也。日本既发此大难，中国不敢于坐亡，日复一日，势必出于决裂。彼有强暴之陆军，我有牺牲之血肉；彼有坚巨之战舰，我有朝野之决心。蜂虿有毒，而况一国，海枯石烂，众志难移。举四百余州之河山，四万万人之坟墓，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且极东突有震动，欧战必亟议和，群雄逐逐，马首东回，德报新仇，俄修旧怨，美有邻厚之虞，英有弃盟之势，万矢一的，以向日本，而以我中原为战场，中国固已早亡，日本岂能幸免。苟至于此，黄种沦于万劫之深渊，皙人独执世界之牛耳，野心勃勃之日本，果安在哉！嗟彼日人，阴贼成性，当民国初建之际，挑兄弟阋墙之机，射影含沙，无所不至。双方蛊以顾问，百计施其鬼谋，欺我政府，愚我黎庶。凡兹岛国之阴谋，尽成一家之痛史，创痕犹在，前事未忘。今更恃强挟迫，无理要胁，大欲难填，野心不死，是不义也。且维持东亚平和，保全中国领土，日、英既有成言，举世实闻此语。今遽背盟爽约，躬为破坏东亚平和，吞并中国领土之戎首，而无所于恤，为世界扰乱之媒，酿未来大战之祸。今日既种恶因，异时焉有善果。戕贼人道，涂炭生灵，是不仁也。恶因既种，后祸难逃。直接以贾中国之怨者，间接以树列国之敌。今日以之亡中国者，异日即以亡其日本，利令智昏，同根自煎，辅车既失，唇亡齿寒，是不智也。向者日本对德恭顺备至，一旦卒遭大难，遽而反颜。趁火行劫，强盗所耻，堂堂国家，且又过之，是不勇也。查其对德通牒有云，以还付中国为目的，以欺世人耳目。曾几何时，青岛既下，牒章之墨未干，汶阳之田不返，因得陇而望蜀，遂雨复而云翻。世俗相交，犹重然诺，国际宣言，弃若敝屣，是不信也。此不义、不仁、不智、不勇、不信之行为，于日本为自杀，于世界为蟊贼，于中国为吾四万万同

胞不共戴天之仇雠，神州男子，其共誓之！

抑日本蕞尔穷岛，力非能亡我中国者。国人而不甘于亡，虽至今日，犹可不亡；国人而甘于亡，则实中国有以自亡耳，何与日本！忆昔甲午痛创，艨艟巨舰，旌旗蔽空，横槊临江，威震海表，纵不能称雄一世，以与敌较，数倍其力，宜可以摧折强邻，威加三岛，乃竟一战而败，尽歼于敌，国威自此一蹶不可复振。日、俄战后，敌气益炽。青岛之役，有如昨日，吾关东山左之父老，惊窜流离，死不得所。他如二辰丸之鸣炮升旗，五警士之死不瞑目，非分相干，有加无已，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呜呼！岂止数世而已哉！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居东京，适游就馆，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鼎彝迁于异域，铜驼泣于海隅，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言念及此，辄不胜国家兴亡之慨，而痛恨于前清末季，民国初年，朝野上下之忘仇寡耻，徒事内争，颓靡昏罔之人心也。夫苟一经创辱，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狂澜于既倒，则今日欧洲莽怪之风云，宁非千载一时、睡狮决起之机，以报累代之深仇，以收已失之土地，从此五色国徽，将亦璀灿光耀于世界。徒以清之君臣，酣嬉自废，畛域横分，民国承之，操戈同室，时机坐误，夫复何言！国人及今而犹不知自觉，犹不急起而为生聚训练之谋，来者视今，恐犹今之视昔，炎黄远裔，将沦降于永劫不复之域，而灭国之仇，夷族之恨，真天长地久，无复报雪之期矣！呜呼同胞！亦知今世亡国之痛乎？波兰之灭也，俄人迁其世族贵胄于荒寒绝汉之西伯利亚，玉关万

里，故国长辞。印度之灭也，英人役之以充兵，驱之以赴敌，出印人之血肉，为英族之牺牲，吁天无路，牛马长沦。乃若安南亡于法，朝鲜并于日，其墐户无天，避秦无地之惨剧，尤为见者心酸，闻者发指。昔者改姓易代，兴亡倏忽，而一二遗老孤臣，不忍见宗社之倾，君父之辱，犹或黄冠草履，歌哭空山，乱礁穷岛，相望饮泣，亦欲抱残经于学绝之交，存正朔于危难之际，虽至势穷力尽，卒无变志灰心，杀身成仁，刎颈殉国，流离转徙，客死天涯。宋之文山、叠山，明之苍水、舜水，垂于史册，炳如日星。矧今之世，允非昔比，国社为墟，种族随殄，亡国新法，惨无人理。君子有猿鹤之哀，小人罹虫沙之劫。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犹太遗民，梦怀故国，文豪富贾，屡出其热烈之文章，宝贵之黄金，以求一地，聚族而居，累世远谋，卒无所成。韩社既屋，安重根以哈宾之弹，当博浪之椎，虽此一滴刚正之血，未尝不足以点缀其黯淡无光之亡国痛史。然而枯藤可断，十三道之江山不可复保矣。呜呼，同胞！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当怀死中求活之心，最后五分，稍纵即逝，过此以往，皆凄凉悲惨之天地也。然则吾国民于今日救国之责，宜有以仔肩自任者矣。

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维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顾外交界之变幻，至为诡谲，吾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徇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

承担之。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胜则此锦绣之江山可保，而吾祖宗袭传之光荣历史，从此益可进展于无穷。败则锦绣之江山虽失，而吾祖宗袭传之光荣历史，遂结束于此。傔有全始全终之名誉，长留于宇宙之间，虽亡国杀身，亦可告无罪于我黄帝以降列祖列宗之灵也。河岳镇地，耀灵炳天，血气在人，至刚至大。九世之深仇未复，十年之胆薪何在！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愿我国民，从兹勿忘此弥天之耻辱可耳。泣血陈辞，不知所云。

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撰

（1915 年）

欧洲战事谈

近十年来，欧洲这些大国，今天你加练一个师团，明天他也加练一个师团，今天你添造一支兵舰，明天他也添造一支兵舰，在下就知道早晚有个大动干戈的日子。偏偏这些不识时务的政治家说不要紧，这是维持均势，以武装担保平和。好——好，到了现在，真正平和极了。自从去年七月底奥、塞两国开衅，接后九个国家陆续加入战争团体，杀气腾腾。这一个年头，就算天没有翻，地没有覆，银子花的同雪片一般不算，那战场上更是血流成河，尸积成山。就是卢森堡主、比利时王，也曾做一国的元首，现在弄得是有家难归，有国难奔。再说那些交战国的百姓吗，接近战地的，因为枪炮的子弹，没有长着眼睛，生命财产，本来是危险，合着一句俗语，叫做“打蝗虫连蚱蚂遭瘟”。至于那离战地远的，在理想着还没有灾难。哪里知道，这回战争的器械，不是像从前的，陆地上有田鸡大炮，口径是四十生的密达，一炮能打几十里，现在并听说有五十生的口径的出现，发射力能达八十里。这种大炮，如果多放几下，这八十里内还有人烟吗？水里面又有甚么威字号的潜行艇，在暗地里走，不论多大兵舰，一撞登时粉碎，附近居民，就同时遭殃。你想这又不是正式交战，谁知道走避哩？这还罢了，还有甚么夺柏林飞行艇，比飞行机更厉害得多了，能在半空投炸弹，并且能放一种枪。如果这飞艇在那一个地方投炸弹，这地方居民，就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现在著名都会如巴黎、伦敦，晚间全市都

没有灯光，像黑暗世界一般，就是防备飞艇看准投炸弹下来。这种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虽然那些宗教家在教堂内常常祈祷战祸早息，但是据在下看来，恐怕把钟打破，也没有用，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列位不信，待在下把欧洲现在的战局，略略叙述出来，就知道了。

欧洲现在的战局，按着实际，要分东、西、南和近东土耳其四方面。就西欧一面说，自德军破坏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中立，德、比两国，鏖战起来。后来德军破里爱巨要塞，取纳谬尔，陷安府（比京），太子军向前突进，兵临爱恩河，望着巴黎，简直有直捣黄龙痛饮之势。到底因为后防空虚，退却下去。现在比、法方面，是德军和联军（英、法）对峙，两军阵地，从北海到瑞士国境六百多英哩，变做筑城地带。德军在法国一个地方，造着一百密达长的铁条网，防御敌人不算，还时常向伊铺尔和伊者尔北方进攻。联军却也常常在亚剌斯北方，蚕食德军的阵地。这两军势力相抵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再讲到南欧的战情，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奥、塞，一方就是奥、意。这奥、塞方面，开衅以后，塞国以三十万兵，抵当奥国百万大兵，恐怕不敌。联合山里国军，常常侵入颇斯利亚，被奥军痛击七次，落后别尔克辣城（塞京），被奥军攻破，未过三天，就夺回来。所以闹了到现在，两边仍是夹守着国境，深沟高垒，不断小打罢了。那奥、意方面，在两月以前，意国破弃三国同盟条约，对德、奥宣战。沉沉战雾，就笼罩亚尔伯山头和亚狄里（外海）海面了。这意国统筹全局，陆军虽能调出百万大军，但德国在巴依埃尔屯兵五十万，常出入气罗尔方面，邀击北上的意军。奥国又派兵二三十万；在奥、意国境，控亚尔伯山势，阻止意军，陆路恐怕一时不容易得手。至于海面上，意国以一倍半优势的海军，制奥国舰队，原可以握住海权，再输送陆

军到达尔马奇亚沿海地方，与塞军接应，倒也是个制奥国的法子，但是想渡亚里狄海，却费事极了。这战局要想发展，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所以此刻军事最吃紧的，只有东欧加里西亚和波兰方面。这回俄军占住卡尔爬颠山地，俯瞰匈加利平原，作势南下，要算德国腹心之患。德国故立意扫除，调集重兵，到东方战线内，一面屯兵卡尔爬颠山南，扼住各隘路口，同时添派援兵到威奇约克、斯托利、布深威那等处，一意阻止俄军南下，一面进兵北方俄领波罗的海沿岸诸州，取进攻的态度，并用巡洋舰和驱逐舰在里巴港攻击俄国守备队，取得里巴，牵制俄国在加里西亚的军队。果然天从人愿，德国骁将马开占将军，当头所向，俄军全线退却，不能存留威依土罗卡河边，德军更奋勇向前，直捣俄军中坚，夺回布尔塞米斯尔要塞，此时俄军死伤十万，被虏八万，马开占更乘胜发令追击，发挥德军的野战技能，好在东方压迫俄军。新近并且听说波兰旧京华沙，又被德军三面围住。这东欧战事，要算近数月以来未有之大战了。此外近东方面战情，就是达达海峡，联军虽然有从加里波利上陆扫荡土国军队的计划，无奈土军受德国的将校指挥，固守要塞，实在无隙可乘。日前英国宣言封锁从达达海峡进口到塞暮斯和小亚细亚沿岸一带，这不过是句话罢了。虽然有潜行艇击沉土国运送船一只，本国的战舰马济爱炘气克号（一四九〇〇吨）和托剌依亚林号（一一八〇〇吨），却被德国潜行艇击沉。其余商船和法国的战舰、商船，也听说击沉了好多只，这算是联军从攻达达海峡以来之大损失了。

说到这里，现在战局的大概情形可以知道了。要问以后结局怎么样？不但在下不能推测，就是多少军事家也不能推测。一言以蔽之，欧洲战事，一时是不能了的。那么本报选述这一门，一时也不能了的。但是在下另有个意

见，因为这回陈述战事，简单得很，恐怕列位看着，没有甚么趣味，就是有点趣味，这一年经过的战争内，可歌可泣的事情太多，可以振起我们中国人的地方更多，在下要按着历史的体裁，把著名的大战争，作个骨子，用小说的口吻，从头一直叙述下去。列位无事，当着历史看也好，当着小说看也好，我想列位一定是赞成的。哈哈！

（1915年8月1日《通俗》杂志第1期）

《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人已汲新泉，尝新炊，而我犹卧榻横陈，荒娱于白发中华、残年风烛之中，沉鼾于睡眠中华、黄粱酣梦之里也。

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语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耳中，鲜不勃然变色，思与四亿同胞发愤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顾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由今论之，始云衰老，始云颓亡，斯何足讳，亦何足伤，更何足沮丧吾青年之精

神，销沉吾青年之意气！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祺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所以效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恋黤黤就木之中华，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是故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

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坟墓中之中华，尽可视为老辈之纪录，而拱手以让之老辈，俾携以俱去。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老辈之于社会，自其长于年龄、富于经验之点，吾人固可与以相当之敬礼，即令以此自重，而轻蔑吾青年，嘲骂吾青年，诽谤吾青年，凌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独至并此独有之特权而侵之，则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无所于踌躇，无所于逊谢。须知吾青年之生，为自我而生，非为彼老辈而生，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青年而造，非为彼老辈而造也。

老辈之灵明，蔽翳于经验，而青年脑中无所谓经验也。老辈之精神，局牖于环境，而青年眼中无所谓环境也。老辈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与境遇和解，与时代和解，与经验和解。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

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

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今日中华之青年，犹是崇拜老辈之青年，崇拜古董之青年也。人先失其青春，则其人无元气；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举一国之青年，自沉于荒冢之内，自缚于偶像之前，破坏其理想，黯郁其灵光，遂令皓首皤皤之老翁，昂头阔步，以陟于社会枢要之地，据为首丘终老之所，而欲其国不为待亡之国，其族不为濒死之族，乌可得耶？吾尝稔究其故矣，此其咎不在老辈之不解青年心理，不与青年同情，而在青年之不能与老辈宣战，不能与老辈格斗。盖彼老辈之半体，已埋没于黄土一抔之中，更安有如许之精神气力，与青年交绥用武者。果或有之，吾青年亦乐引为良师益友，不敢侪之于一般老辈之列，而葬于荒冢之中矣。吾国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辈之强，乃吾青年之弱，非彼旧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国之多老辈多旧人，乃吾国之无青年无新人耳！非绝无青年，绝无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气力耳！此则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觉与反省，不能不需《晨钟》之奋发与努力者矣。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欧人促于科学之进步，而为由耶教桎梏解放之运动者，起于路德一辈之声也。法兰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认得自我之光明，而开近世自由政治之轨者，起于孟德斯鸠、卢骚、福禄特尔诸子之声也。他如狄卡儿、培根、秀母、康德之徒，其于当世，亦皆在破坏者、怀疑主义者之列，而清新之哲学、艺术、法制、伦理，莫不胚孕于彼等之思潮。萨兰德、海尔特尔、冷新、乃至改得西尔列尔之流，其于当代，因亦尝见诋为异端，而德意志帝国之统一，殆即苞蕾于彼等热烈之想象力，彼其破丹败奥，摧法征俄，风靡巴尔干半岛与海王国。抗战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麦、特赖克、白仑哈的之成绩，乃讴歌德意志文化先声之青年思想家、艺术家所造之基础也。世尝啧啧称海聂之名矣，然但知其为沉哀之诗人，而不知其为“青年德意志”弹奏之人也。所谓“青年德意志”运动者，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为中心，而德国国民绝叫人文改造□□□也。彼等先俾斯麦、摩尔托克、维廉一世而起，于其国民之精神，与以痛烈之激刺。当是时，海聂、古秋阔、文巴古、门德、洛北诸子，实为其魁俊，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统一，才二十载，距今亦不过六十余年，而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余。居今穷其因果，虽欲不归功于青年德意志之运动，青年文艺家、理想家之鼓吹，殆不可得。以视吾

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记者不敏，未擅海聂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吾尝论之，欧战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亦以崭新之民族爆发于烽火之中。环顾兹世，新民族遂无复存。故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而是等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土尔其以老大帝国与吾并称，而其冥顽无伦之亚布他尔哈米德朝，颠覆于一夜之顷者，则青年土尔其党愤起之功也。印度民族久已僵死，而其民间革命之烽烟，直迷漫于西马拉亚山之巅者，则印度青年革命家努力之效也。吾国最近革命运动，亦能举清朝三百年来之历史而推翻之。袁氏逆命，谋危共和，未逾数月，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迫以死。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其胚种所由发，亦罔不在吾断头流血之青年也。长驱迈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庸人之哲学为天才之宗教，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变“求”之幸福为“取”之幸福。觅新国家，拓新世界，于欧洲战血余腥、炮焰灰烬之中，而以破坏与创造，征服与奋斗为青年专擅之场，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中华其睡狮乎？闻之当勃然兴；中华其病象乎？闻之当霍然起。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

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附言 篇中所称老辈云者，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大凡一新生命之诞孕，必历一番之辛苦，即必需一番之努力。

欧洲战焰之腾，杀人盈野，惨痛万千，此欧人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欧人不避此辛苦，勇往奋进以赴之者，则欧人欲得自由之努力矣。

西南义师之兴，呜咽叱咤，慷慨悲歌，此民国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吾民不避此辛苦，断头流血以从之者，则亦吾民欲得自由之努力矣。

《晨钟》创刊，缔造经营，竭尽绵薄，犹虑弗胜，此本报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本报不敢辞其辛苦，殚精瘁力以成之者，则亦本报欲得自由之努力矣。

夫宇宙本相，为不断之轮回。吾人日循此轮回生死、成毁、衰亡、诞孕之中，即日尝辛苦，日需努力，而不容有所怠荒。《晨钟》之所以警世，与其所以自勉者在斯耳。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

国庆纪念

黄花灿烂，五彩旗飞，民国五年之新秋，挟其肃清之气，拥兹宪法纪元之国庆日以俱至。吾侪躬逢盛典，追念前勋，盖不胜今昔之感矣！

间尝论之，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也。法兰西宪法，苟无法兰西国民数十年革命之血，为之钤印，则必等于虚文。美利坚宪法，苟无美利坚十三州市民独立战争之血，为之钤印，则必等于空白。其他各立宪国民所获自由之量，亦罔不准其流血之量而为损益。盖历史者譬如田亩，自由者譬如华木，而国民牺牲之血，乃当其灌溉沃润之用。灌润丰者，收获亦丰；啬者，收获亦啬。斯殆无所逃于因果之律矣。

吾国自革政以还，黄花岗上七二英魂之芳骨，固已孕伏自由之胚苗。厥后辛亥之役，癸丑之役，乃至今兹西南之役，其间义烈踵殉宁上千万，而后共和之华，始克畅育茁发于血光之中，而后觥觥议士，始得于今日从容谈辩商榷宪法于一堂。稽其宪法之成，虽成于议士诸公，而其实议士诸公之任，乃在寻现代国民斑斓之血迹，而如量彰之于宪典。正如美术家描写宇宙自然之美，而显之于图画文章也。

宪法之形式虽备于今朝，而宪法之精神则酿于革命旗翻、诸先民断头绝脰之日也。无识莽夫，以为宪法之根蒂，仅存于一纸空文之约法，何在不可以一人之任意摧残之。抑知取消约法，是无异于取消国民屡经痛创之血痕，

是胡可得！卒至护国军兴，义声四播，国民不惜更出其庄严之血，以增益其灵光，摧之实以荣之。使吾亿兆国民，于此艰难缔造之第五国庆日，犹得欢欣鼓舞于神圣议会制宪之声中，恍若对先烈淋漓之血迹，而奋其痛定思痛之心，保兹宪典于无穷。吾侪不敏，乃亦不敢不勉尽绵薄，以《宪法公言》之创刊贡之当世，而以今日之国庆纪念，为吾宪法史上创一新纪元也。

（1916年10月1日《宪法公言》第1期）

宪法与思想自由

西谚有云："不自由毋宁死"。夫人莫不恶死而贪生，今为自由故，不惜牺牲其生命以为代价而购求之，是必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人之于世，不自由而生存可也，生存而不自由不能忍也。试观人类生活史上之一切努力，罔不为求得自由而始然者。他且莫论，即以吾国历次革命而言，先民之努力乃至断头流血而亦有所不辞者，亦曰为求自由而已矣。今兹议坛诸贤瘏口哓音，穷思殚虑，努力以制定庄严神圣之宪典者，亦曰为求自由之确实保障而已矣。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

自有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为近世人类自由之保证书，各国宪法莫不宗为泰斗，如身体自由、财产自由、家宅自由、书信秘密自由、出版自由、教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诸荦荦大端，皆以明文规定于其中。吾之"天坛草案"，亦颇能模其成规，独于教授自由一项屏而不载，且于第十九条附加"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语。是语也，不啻将教授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隐然为一部分之取消，是必有大奸慝怀挟专制之野心者，秘持其权衡，而议坛诸公，未能

烛照其奸，诚为最可痛惜之事。盖彼袁氏之虐，不过僇吾人之身体，掠吾人之财产，剥夺吾人家宅、通信、集会结社之自由，其祸仅及于身体，仅及于个人，仅止于一时，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呜呼，酷矣！

吾国自秦以降，其为吾人自由之敌者，惟皇帝与圣人而已。清之季世，议定宪法，耳食之士，乃欲强宪法与皇帝发生关系，且欲袭日本特别国情之天皇万世一系而用之。卒之，宪法未立，而清室以之倾矣。共和肇造，袁氏擅权，灭国会，除政党，毁约法，诛党人，毒焰薰天，不可向迩。国之君子，乃复趋承其意，怂恿袁氏，以其炙手可热之权威，强宪法与皇帝发生关系。卒之，帝制未成，而袁氏以之毙矣。由是观之，皇帝与宪法，盖不能两立者也。有皇帝之时代，断不容宪法发生；有宪法之时代，断不容皇帝存在。而执皇帝之旗帜以谋侵入宪法领域者，乃以完全失败。彼辈犹不自悟，以为皇帝无灵，更乞援于圣人，务求于自由宪法之中，获一偶像之位置而后已。抑知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而在吾华，历史最古，历史上遗留之种种权威重压累积于国民之思想者，其力绝厚。故外人谓中国、印度、希腊、罗马诸邦之域中，非偶像之碑铭，即死人之坟墓。于此而欲畅舒国民之自由，不当仅持现存之量以求宪法之保障，并当举其可能性之全量以求宪法保障其渊源也。其渊源维何？即思想自由是已。苟有匿身于偶像之下，以圣人之虚声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当知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吾人对之与以其反抗之决心与实力，亦当视征伐皇帝之役为尤勇也。

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以孔子为吾国

过去之一伟人而敬之，吾人亦不让尊崇孔教之诸公。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像之前，使其自我为孔子之我不可也。使孔子为青年之孔子可也，使青年尽为孔子之青年不可也。吾在日本，尝见某评论家昌宗教无用之论，其言绝趣。彼谓孔子、释迦、基督、穆罕默德，其于吾人，不过一种食品。孔子与牛肉，释迦与鸡肉，基督与虾，乃至穆罕默德与蟹，其为吾人之资养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鸡肉，在使之变为我之肉也。食虾蟹等物，在使之变为我之物也。吾人食孔子、释迦、基督、穆罕默德，亦欲使其精神性灵，代为我之精神性灵而已。但人类为杂食动物，吾人为求肉之发育，不能不兼食牛鸡虾蟹，正犹为求灵之发育，不能不兼收孔、释、耶、回之说云云。斯言虽近谑，亦颇含有至理。以今世国民灵的消化力（即思想力）之强，绝非孔、释、耶、回中之一家所能满充其欲望者。今乃欲以保障自由之宪法，为孔子护持其权威，无论国民思想力要求之强烈，断非宪法之力所能遏止。即令果如其意，而以观其效绩，亦惟使其国民自我之权威，日益削弱国民思想力之活泼，日益减少，率至为世界进化之潮流所遗弃，归于自然之淘汰而已矣。即其忠于孔子之心，吾人多少亦表感佩之意，然此终非所以忠于孔子之道也。欧洲中世耶教之黑暗，苟非路德一辈先觉之士，热狂绝叫，以树反抗之帜者，则耶教之亡也久矣。诸公不此之务，而惟日挈其偶像以锢青年之神智，阏国民之思潮，孔子固有之精华，将无由以发挥光大之，而清新活泼之新思潮，亦末由浚启其渊源。以此尊孔，尼山之灵，不其馁乎？若必谓“天赋我以膝，不拜跪何用？”即天赋我以思能，不崇信孔子何用？则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斯真坟墓中之奇音怪

响，何有一辩之值。若社会而犹附和其说，则莽莽神州无复生人之足与语者矣，不其痛欤！

吾今持论，稍嫌过激。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在欧洲，自我之解放，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故言之不觉其沉痛也。故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而思想自由之主要条目，则有三种：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是也。请分论之：

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西班牙、土尔其。中国文字之劫，烈于秦火。近古以还，李卓吾、金圣叹之徒，亦皆以文字罹杀身之祸。前清乾、嘉文字之狱，冤抑罔申，惨无人理，秦火而后，亦浩劫也。盖尝考之，出版自由之要求，即在欧洲，亦非甚早。而欧洲古代对于出版之禁制，亦尝层见迭出。苏格拉的曾以否认国家之神而为梅利达士、亚尼达士及雷昆等所控诉矣，科巴尔尼加士与加里雷阿之书，为当时官吏所焚矣。即至法国革命之际，所有文书，尚归国家管理，书籍出版，亦为国家所指定图书馆之特权，且复严加检阅，科著者以苛刑。故法国有名之著作，多在外国出版，如孟德斯鸠之《法意》，则出版于杰聂窪，福禄特尔、卢骚之名著，亦多在伦敦、杰聂窪、亚母士达母刊行。千七百七十五年，《天理哲论》一书，依巴黎巴力门法院之命令破毁之，著者且受对于天神人类犯叛逆罪之宣告矣。千七百八十一年，雷那尔因所著《印度史》一书，而受渎神罪之宣告焉。此外之例，正复不遑枚举。迨至革命之风云卒起，巴黎市中，攻击时政之小册，传布街巷，飞如蝴蝶，非复禁令之所能遏制矣，卒于《人权宣言》中确认出版自由，而

美国渥金尼亚州、边西尔渥尼亚州之权利典章亦明认之。厥后各国宪法，莫不资为模范。惟德意志诸邦对于出版之禁令，较英、法、美、比诸国为迟，盖不过近五十年来事也。各国关于出版，初行检阅之制，然检阅由于官吏一人之偏见，每多失当，最足为文化之蠹。各国宪法，遂一面以自由出版为原则，一面复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其中，以补此缺点，如比国宪法第十八条、普国宪法第二十七条、奥国宪法第一部第十三条、美国修正宪法第一条是也。吾国“天坛草案”第十条有“中华民国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之条文。但此所谓法律，是否包有检阅制度，语意颇涉泛漠。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毁罪及泄漏秘密罪律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辩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

次于信仰自由，亦决不许稍加限制。盖信仰一种宗教，乃在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于人类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为之力施以干涉也。古来以政治之权力，强迫人民专信一宗，或对于异派加以压制者，其政策罔有不失败者。故至今日，世皆认信仰为个人之自由，而不复作干涉之迷梦矣。政教相混，原为人类进化必经之一阶级，世界各国莫不循此轨辙，而今尚有存此遗习者也。彼法、西、英诸国，关于教会与教育分离问题，纷议尚炽，其明证焉。盖政教相混，每酿绝大之纷争，欧洲一部历史，皆其纷争之纪录也。东洋自古无宗教之纷争，此最不足幸者。而吾中国，儒、释、道、回、耶，杂然并传，含容甚广，是信仰自由之原理，已为吾先民所默契。今乃欲反其道，而凭空建立国教，斯诚背乎国情而为致争之由也。现

时欧洲之维持国教制度者，虽不止于俄、英、希腊二三国，然皆有渐趋政教分离之倾向，乃为昭著之事实。观英国于数年前以下院百有余名之多数，可决废止英兰教会一名监督教会 Episcopal Church 之国教，可以知矣。议事之日，其教育卿巴雷氏曰："予个人甚望教会脱离国家之桎梏，复归于精神的权威之地位。然政府以目前有数多紧急问题之故，无任本案执行之意也。"邦拿曼内阁虽无以政教问题与上院抗争之意，而以舆论大势之所趋，虽上院亦弗能终抗。盖英兰教会属于耶苏新教之一派，三百年前，承亨利八世之意，与罗马法王分离，以国王为教会之首长，费用之一部，由国帑给之，僧正之任用，以王权行之，全出于政教一致之形式，以至于今日。而英兰教会之独立，止于以国王代法王而已。不惟未能举宗教改新之实，弊且益甚焉。于是非国教团体相继发生，彼 Congregationalist Methodist 之起，特为此耳。政府极力镇压非国教团体，制限其徒侣之俗权；虽能制止于一时，而以现在国民之一半，属于非国教，而使为他之一半均担国费，不平之声，遂而日高，迟早不可知，教会必将有特立于政权以外之一日也。吾之举此，此证国教制度，决不能存于今日进步之社会。旧行之制且将趋于政教分离之一途，而乃背自己之国情以行所谓国教者，斯真冥顽之尤者也。抑信仰自由云者，并任何宗教亦不皈依之自由亦括有之，稍涉迫胁，亦即非所以保障思想自由之道也。

复次教授自由亦当规定于宪法，而"天坛草案"付之阙如，反加以矛盾之条文（如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是），此与思想自由亦有莫大之关系也。盖今日吾国专制之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苟宪法无明文为之保障，则其他之学说思想，恐不能各如其量以传播于教坛学圃也。抑此非吾人之创议，千八百十五

年七月四日摩尼兹尔新志之以巴黎降于同盟军揭告有众也。翌日法国议会即行开会，直取加拉提出之“权利宣言”，为爽快之讨论。此宣言之第九条，即为“凡科学技艺及旨趣感想之要领，均得于大学教授之。”厥后各国宪法，亦有仿行之者。以吾国学艺思想之贫乏，非于宪法加入此项不可。其条文当为“各种之科学技艺，各家之性理思想，均得于国立、私立学塾教授之。”俾诸子百家之说，医药卜筮之术，均有教授之自由，以助进国家之文化，所关盖甚巨也，惟议坛图之。

（1916 年 12 月 10 日《宪法公言》第 7 期）

新中华民族主义

余曩有言，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断断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十九世纪以还，欧洲大陆茁生于拿翁铁骑之下者，实为国民的精神。希腊以之脱土耳其之羁绊而独立矣，巴尔干诸邦以之纷纷向土揭叛帜矣，荷兰与比利时以之分离矣，其屡经挫压以致未达此志者，惟有波兰（波兰独立之声近又宣传于世界矣）与匈牙利耳。而发扬蹈厉以树国民的精神，亿辛万苦，卒能有成者，则德意志帝国之建立、意大利之统一，其最著矣。

国民的精神既已勃兴，而民族的运动遂继之以起。于是德国则倡大日尔曼主义（Pan Germanism）矣，俄罗斯、塞尔维则倡大斯拉夫主义（Pan Slavism）矣，英吉利则倡大盎格鲁撒克逊主义（Pan Anglo-Saxonism）矣，他如美之守孟禄主义，日本近来之倡大亚细亚主义，即在印度民族，迩来对于英国亦颇思扬独立之旗，举革命之烽火者，无非应此民族的运动之潮流而兴者也。顾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其旨领何在，吾不得知。但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

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斯非吾人夜郎自大之说，以历史地理考之，此种断案乃逻辑上之必不可逃者也。

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的自觉尚矣。民族主义云者，乃同一之人种，如磁石之相引，不问国境、国籍之如何，而遥相呼应、互为联络之倾向也。或同一国内之各种民族有崩离之势，或殊异国中之同一民族有联系之情，如此次大战导火之奥大利，其境内之民族最为杂沓，老帝在位六十余年，未得一夕安者。职此之故，卒以一皇储为塞人所狙击，遂以召世界非常之风云焉。更如英国之爱兰独立问题，危急时在爱尔兰威士特之英人，皆欲执弹刃以与爱兰国民党相见于战场，而在美之爱兰人则为爱兰自治之运动，倾囊相助而不辞。最近美以德国封锁宣言而与德断绝国交已旬余日矣，犹未决然宣战者，其原因虽未明了，而以美国人口九千余万人中，有德系二千余万人，未始非其最大之隐忧也。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

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嗟乎！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新中华民族之少年，盍雄飞跃进，以肩兹大任也。

（1917年2月19日《甲寅》日刊）

此　日

记者足下：

光阴荏苒，民国建立，忽忽六年，今日又为民国六年之国庆日矣。仆于此日，淹滞沪滨，散步江头，百感交集。飘飘国徽，翻扬空碧，其与吾人以绝强之印触者，诚不知是悲是喜！但一回溯此六年中，风尘澒洞，戎马仓皇，此万众欢呼之国庆日，殆皆于风鹤中度之。吾民丁兹新旧嬗更之交，喘息未安，惊魂又丧，流离转徙，思痛抑且未遑，庸能忭欣鼓舞从容逸乐以为庆祝。此以知新命诞生之难，而国民所以为之努力者，益不容稍怠也矣。

仆尝论之，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而能忍此苦痛以赴之者，为足尽诞生新命创造新运之努力。美利坚之独立，必历八年之血战，始能告厥成功。法兰西自由之花，必有数十年牺牲之血以灌溉之，始有今日之繁茂。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树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凡其国民所不敢避之苦痛，即其国民所不容委之努力也。向使三国之民，畏难苟安，避苦痛而自弃其当尽之努力，则自由之惠与虽丰，恐不及于三国之民也。

吾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始有新中华之诞育，先天遗传之病惰种子，在在皆足以沉滞新命发育之机能，甚且有流产胎殇之恐焉。故吾人于新命诞孕之中，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尤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此则国庆日

者，乃新中华诞孕之纪念日，非新中华长成之纪念日；乃吾民开始努力之纪念日，非吾民太平歌舞之纪念日；乃吾民勇于牺牲之足庆，非吾民臻于安乐之足庆也。

年来国事之坏，造因固自多种，而最足痛心者，乃为党争一事。其在平时，各党人士之立言，多属一偏之辞，绝少同情之论。独于今日，乃罔不以奋斗拥护共和自矢，仿佛良知所诏，惟于此日，恩怨都消，各愿以其真实诚挚之天良，质诸神明，贡之国家。夫人非圣贤，岂能无过，惟善修养者，每于昧爽平旦之际，深自省察，故能复其明德。大局至斯，平心论之，亦岂一党一派之过。但望各派人士，皆以此日为一年中复旦之机，痛自忏悔，则往者已矣，未来之事，待各派人士之猛省以图补救者，尚自多端。国人苟犹有悔祸之心，请即以今日为洗心忏悔之日可矣。

昔者，德人蓄战英之志，尝胆卧薪，举国皆是，军士于杯酒酬酢之间，相与谈及，辄以“此日”（The Day）一语代之。仆今亦愿持此语赠吾国民，斯非必如德人之指与某国交战之日，亦谓由此亿万斯年，年年都有“此日”，等闲过之，宁复有何意味，即或唏嘘凭吊，徒回顾过去以为可歌可哭之节令，而忘劫未来活跃精进之生涯，亦岂兴国之民所应出者。窃以世运所逼，吾人仔肩所负之责任，愈益繁重。宜自今日起，至翌年此日，划为一期间，来年以下，亦复如是，而皆定其应做之事业，立其应达之目的。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以过去之此日为纪念，以未来之此日为理想；以过去之此日为陈迹，以未来之此日为前程，如是推嬗，吾人之此日无空期，即吾人之进步无止境。然则新中华无

疆之休，将以此日为发轫之始矣。

抑吾尤有感者，黄花岗畔，汉水潮中，先烈之殉共和以死者，固不知其几千万辈。此日招魂望祭，国家之所以崇报忠良，宜如何庄重其典礼，厚恤其遗族；而今酬勋授位，乃厚生而薄死，国庆之日，文虎嘉禾，勋章雨下，甚且洪宪帝孽，造反罪魁，咸膺上赏，独不闻于殉国先烈之丘墓、遗族有所瞻顾。在死者一瞑不顾，一前已为其国尽最终之努力以去，英灵在天，尚复何憾，区区后人之荣封祀祷，奚足以慰死者于九京？然而国家社会，薄待英雄至于若此，吾人坐食先烈之赐，诚于心有弗安者矣。

嗟夫！国有英贤，不幸而生于嫉贤妒能之社会，于其生前，既饱受世之诋毁排挤，而悲愤抑郁以殒厥身，因与兹世生死辞矣。今乃以其人之既死，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与生者之名誉地位无所妨害，始肯稍事敷衍，而此嫉贤妒能之心理，犹不能从死者以葬于坟墓之中，转而移注于其他未死之辈，风俗人心之坏，是则堪为痛哭者也。

偶有所感，以稔足下，非志庆之辞，乃伤心之语也。余不白。

国庆日 L.S.C. 生白

（1917 年 10 月 15 日《太平洋》第 1 卷第 7 号）

普通选举

世界上未行普通选举的国，只有我们中国和日本、土尔其。日本现在普通选举的声音，几乎震动了三岛。上杉慎吉也不倡他那凯撒复辟论了，德富苏峰也不说他那贫国强兵论了，大石正已也暂且不提他那大陆膨胀主义了，却都来鼓吹普通选举。回头看看我们中国！他说武力统一，他说武力护法。那有人提到这个问题！那能够提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

（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号）

黑暗的东方

天明了，曙光现了，光明的境界，没有强盗恶魔们立足之地了，一个一个的都跑到黑暗的东方来。所以边疆上就有谢米诺夫、霍尔瓦特这一流人扰乱治安，内地就有一种外国的外交官替崇拜强权的国家政府捕拿国事犯，摧残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呵！好了！我只替你们祝福。祝你们永远不要回归你们那光明的故土，祝你们永远有个黑暗的东方作你们的逋逃薮。

（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

太上政府

呵！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怿”、“不怿”。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呵！你是用惯了那年五月七日的哀的美敦书。呵！我如今才晓得你是要作我们的太上政府。

（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像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

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嗳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

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

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1919年6月1日《每周评论》第24号）

牢狱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

不要再说吉祥话

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这正是我们的大罪。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

光明权

北京市民对于电灯公司颇不满意，说电光不足，很妨害市民的“光明权”。嗳！在这黑暗世界中任是生活的那一方面，一线的光明，都没有希望。我们当真要求光明权，应该不止对于电灯公司。

（1919年7月6日《每周评论》第29号）

我与世界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7月6日《每周评论》第29号）

万恶之原

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一个人要是有点知识聪明，一般的亲族戚属，总是希望他去做官僚式的强盗，牺牲了他一个人，供他们大家的荒淫作乐。这样子待人，分明是莫大的冤仇，那里有丝毫的亲义！

（1919年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

灰色的中国

人说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我说无论是白是赤，总在本质稍有光明的国家，才能发现这样鲜明的颜色。像我们中国这样黑暗的国家，对于世界革命的潮流，不问他是白是赤，一味作盲目的抗拒。等到潮流逼进了门，大家仍是昏沈沈的在黑尘中乱滚，白革命会变成灰色，赤革命会变成黑色。辛亥以后的军阀政客，已竟把个中国弄成灰色了，盼望以后你们不要把中国再弄成黑色才好。

（1919年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望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去作我们的“少年运动”。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

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的一生生涯，是向“少年中国”进行的一条长路程。我们为达到这条路程的终点，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

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既然是二十世纪的少年，就该把眼光放的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

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总结几句话，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啊！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1919年9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妨害治安

“妨害治安！”“妨害治安！”在这句话的声音里，常常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剥夺了，有自由公民被囚禁了。但我要问，这个“治安”，究竟是谁的“治安”？妨害大多数“治安”的，到底是谁？我们大多数人的“治安”，并不泰奢，并不过分，也只求个穿衣吃饭而已。

我们“治安”范围，减到穿衣吃饭，应该无可再减了。你们还不答应，还要把我们穿衣吃饭的“治安”都牺牲了，供你们少数人奢侈淫乐的“治安”。你们拍拍良心，到底是谁妨害谁的“治安”？

（1919年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什么是歪史

前几天看见文治总统出了一道命令，说某人作的《元史》，是“名山盛业”，“应列入正史”。我想出版自由，载在“约法”，判断一切史传文书良否，自有社会上公允的批评在。不但不劳政府当局，用法令来断定那个是“正史”，那个是歪史，而且政府当局，实在没有这个权力。如果政府硬要妄行此种权力，以文饰文治的昌运，那就无异于侵犯人民的著作自由权、出版自由权，我们不可把这事看作无关轻重的事情。

（1919年12月14日《新生活》第17期）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今日亚细亚诸民族的青年运动，皆是由黑暗向光明的运动。

中华青年的反抗强权运动，日本青年的普选运动、劳工运动，朝鲜青年的自治运动，表面上、形式上虽有不同，且有互相冲突的地方，而精神上、实质上皆本于同一的精神，向同一的方向进行。

亚细亚青年的改造运动，既有相同的渊源，又在同一的方向进行。亚细亚的青年，就该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使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断不可再受那些特权阶级的愚弄、挑拨、隔阂、遮蔽。中华的青年应该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成一大同盟，本着全亚改造的方针，发起一联合大运动。

我们画出亚细亚来，不是要分什么黄白人种的界限，只是提出我们所居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改造的区域，就是远东的俄罗斯青年，也该包括在亚细亚青年以内。

亚细亚的权力中心，集中在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是不可掩的事实。亚细亚青年的解放运动、改造运动、光明运动，自然要从破坏亚细亚境内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下手，也是自明的道理。

请看！在朝鲜境内造成民族的仇怨、施行残忍的政治的是什么东西？在西伯利亚造成民族的仇怨、演成民族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在中华大陆造成民族的仇怨、酝酿未

来世界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不用说，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了。要想扫除这些怨仇、祸患，全亚细亚的青年都该负重大的责任。

日本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排日运动，我们固然不能承认；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假使日本的人民，一旦声明承认朝鲜民族的自由，我们的欢欣，我们的钦佩，比对于劳农政府的对华通牒，还要增加十倍。因为这个精神，和俄人的精神一样伟大；这个事实，影响于人类生活更要重大。

我们相信人类都有劳动权，都有生存权，只要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世界上的地方都许世界上的人劳动生存，我们大家安安宁宁的工作起来，只有互助，无须相争，只有友情，那有仇怨。

世界都是光明啊！

人类都是同胞啊！

愿我全亚细亚的青年努力！

一九二〇年四月三十日在北京

（1920 年 8 月 15 日《少年中国》第 2 卷第 2 期）

日本的武士道与国际的新伦理

我们一度到日本，便联想及于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武士道”与“大和魂”，可以说是日本的国粹，日本民族的精神。日本民族所以能在世界有现有的地位，全靠这种的精神。

“武士道”、“大和魂”的精神，究竟是一种甚么精神呢？明了的说，就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扶弱摧强的精神，为公家牺牲个人的精神。日本人有这种精神，所以能爱国而为国死，爱恋人而常至于情死。日本的社会，所以常有壮烈康慨的牺牲行为，刺激一般人的精神，使之感奋兴起。过去数十年的国家主义之所以成功，全是这种精神的产物。

但是自从前的日本人，只把这种精神限域于自国以内的社会伦理，没有把它发扬光大应用到国际的社会伦理上去。换句话说，就是从前的日本人，发扬这种精神于爱国的行为的地方多，发扬于爱人的行为的地方少。甚至把这种精神恶用了。我很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日本人一定能把那“武士道”、“大和魂”就是任侠好义、扶弱抑强的精神发扬光大，应用于国际的生活，使之不至再蹈恶用的覆辙，以实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国际的新伦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1922年1月1日《东方时论》第七卷第一号）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

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坦荡平原，有时是崎岖险路。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的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得一种冒险的美趣。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1923年12月20日《新民国》第1卷第2号）

人种问题

人种、民族与国民 讲到人种问题，必先分辨“人种”、“民族”与“国民”这三个名词的意义。何谓国民？国民的意义是从政治、法律的概念中发生出来的，故不问人种与民族之同异，只须在一种政治之下所形成共同生活的人们便叫做国民。何谓民族？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至于何谓人种？则更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历史、文化之同异，只就人类学的范围，从生理上考察其特征而发生的概念，便是人种。

人种与民族之关系 在不同的各种族之间，自然要发生一种“异视”的感觉。这是种族的本能。英国白徕士(Bryce)男爵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在伦敦大学的讲演中，指明这种本能有下列各重要之点：

（一）这种“异视”的本能，在原始时代糅杂的种族之间，往往存在，一到相同的种族间，就似乎立即消灭，看不出来。

（二）在文化进步的时期内，政治上的竞争和宗教上的冲突，各本其所有的“确执”，往往把人种的“异视”的冲突压倒了。

（三）人种中“异视”的冲突，有如海中的暗礁一般，时时存在海底，却不表现于海面。然在异种的政治或宗教

的冲突激烈时，这种“异视”的作用，能使此冲突扩大而强烈。

不过，近世民族感情之发达，并不根源于这种“异视”的作用，而是依据于言语、文学及历史传说之共同而后成立的。在十八世纪的末期已有人承认此说了，至于十九世纪，更因民族感情的迅速增长而光明显著。可见人种的差异，确是民族冲突之附要的原因。

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冲突中带有人种差异的色彩，由此就可以看出民族与人种的关系。从前人种竞争以至于人种斗争的种种学说并不盛行，例如德国，在一八八〇年有人讲到这类问题，一般人都以为无关重要，不加重视。但在现在，凡谈世界大势的学说或问题，无不言及人种，无不与人种有关系，就可见其重要了。

我们于同种之中也能寻出争斗的事实，更可证明人种差异的“异视”实在是一切斗争的附因。白徕士更以为民族观念发生显著的原因，又由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因为自法国革命成功以后，欧洲各国人民发生政治生活的感觉，对于国内国外的政治压迫，群思抗拒，因此遂发生国民统一的要求。这种要求不免又牵动了人种的枢纽，于是就发生人种的关系，又因此而发生民族同异是以人种为中心的观念。所以民族独立，无论在欧亚各洲的各民族主义运动，均是特别激昂。

在德国一八四六年的人民自治运动，不过为要求在民族国家之下的政治统一。至于现在科学发达，商业进步，愈使民族观念日益强烈。又兼有各民族的文学家、诗歌家以及美术家的作品，往往激动起各民族自尊自雄的精神。从此民族间就因之发生竞争，甚至于战斗。俄国革命运动就含有这种民族主义的意义。

民族主义　民族之成立由于甚么？有以为由于统一的

语言的；有以为单凭统一的语言不足为成立之原因，而要更兼有主观的事实，要在相互的意识之承认及精神上认为同族之后而民族才能成立。此外有以为民族之成立纯由地理（Nation）的事实使然，其以言语、文字、政治和宗教之统一系统，不足以为民族成立之原因。法国 Odysse-Barot（新闻家）、Elise Reclus（地理家）、Justin & romner（新闻家）三人都拥护这派（地理的）学说。有以为法国民族是单纯的民族者，Barot 驳之，而指明法国之民族由于法国的地理使然。欧洲除葡萄牙、瑞典……等国外，都有单纯的民族所组织的国家。就如英国虽小，也由于威尔士（Wales）、爱尔兰（Ireland）、苏格兰（Scotland）、英格兰（England）的民族组合而成。至于法国，则为 Romandy、Proochce、Giuenne、Garcony、Larraine、Brittany 等小民族所组成。各民族的特性质，都各自保存，不稍渝灭。Barot 以为现在欧洲的民族，其以言语、文字……的统一为成立的原因者，不过是暂时间人为的民族，将来必至崩裂瓦解。所以他主张自然的国家，是以小民族的国家代替欧洲大民族的人为的国家。他的意思，只有依地理上山川形势的天然分划，才可为民族成立的根据。但是，果真依照他的学说做去，英国就不仅分为四国了！于此也可见他的"地理的"民族学说，不能自圆。

欧洲人的世界观　欧洲人以为他们的文明，除了基督教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说。他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以为只有白人的世界。法人 Theodor Jouffroy 以为野蛮人将来能进化到文明的地步，其系统可分为三：（一）基督教；（二）回教；（三）婆罗门教。只有基督教是进步的，改化不已而能适应世界潮流的。其余二者与基督教相比，是懒性的，迟滞不进的。因此构成基督教的国家，只有日渐进化，日益文明。其余的国家，只有退步，只有堕落。倘若

基督教长此不发生其他特别原因，则世界将变为基督民族的世界！现在德、法、英三国各以其科学的、哲学的和实用的民族特性引导文化的进步，实在可算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先驱，一切欧洲的战争，将来也一定可以停止的。这是依据历史的事实所得的断定。不过，Jouffroy 的结论，总以为世界完全是白人的，未免言过其实了。

白人在世界居于引导文化的先驱，视异色人种为低下阶级而自居于高上的地位，因此人种在世界上也成为阶级的问题，于是世界上就形成了相对的阶级。人种的斗争于将来必定发生，这是可预为断定的。而且这斗争或许为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战争而与“阶级斗争”并行哩！我们于俄国革命的事实可引为例证。俄国革命虽然有白色人种，然而参加有被压迫阶级的有色人种，其目标则同是反抗压迫阶级的白色人。可见低下阶级的有色人种与高上阶级的白色人种之“阶级斗争”已粗具雏形，其进展则方兴未艾。

一九一〇年英人辛博森（Putnan Weale）著《毛色之争》（Contest of colours）一书，他以为凡物皆有此性，人为万物之一，故人亦有此性——因毛色的不同而发生的冲突。但有因嗜好的原故，能相调和的，如中国人虽为黄色，然性喜白色，或即此例，也未可知。据 Weale 调查各色人种的数目，有如下表：

白色人种	
欧洲	四五三，五〇〇，〇〇〇
北美	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澳洲	六，〇〇〇，〇〇〇
南美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非洲	一，五〇〇，〇〇〇

附杂白色人种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计	五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黄褐及黑色人种	
亚洲	九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非洲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太平洋诸国	二，〇〇〇，〇〇〇
北美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计	一，〇九九，〇〇〇，〇〇〇

白色人种的总数与黄褐及黑色人种的总数比较起来，后者多于前者。据上段的推述，人种斗争将来必与阶级斗争同时表现出来，其胜利者亦可依此比较而预断为有色人种。法人 Gobinean 著《人种不平等论》（一八五〇年出版）略谓人种既然不同，优劣亦自不免。据他的判断，以为亚利安人种为最优，而代表亚利安人种的尤以日耳曼族为最。但是他持一种悲观论，以为优的总要坠落，而将来多数劣级人种相联合来与少数优级人种相斗争，后者必败，前者必胜，亦是理所当然。此外，尚有许多历史学者也承认其说为的当。

至于法人 Oictor Cousin（哲学家，其思想很受黑格尔的影响），他的论点，完全立足于地位（Place）。他以为这种优胜劣败的事实与地位有重大的关系，如人与自然，都是在同一地位之下才发生的，如一民族所在地之山川形势，于历史上即为各时代的民族舞台。他分历史进化为三时期：在第一期的，以无限制的力量观念的为生活，完全信赖上帝；在第二期为有限的；在第三期为前二者混合起来的。故第一期的舞台常在广大辽阔的平原，有汪洋溟渺的海水为疆界——这在亚洲，即东方文明。第二期的舞台很窄小，在希腊、罗马等处。第三期的舞台是在有内海的大陆，如现在的欧洲便是。由此可以寻出不同的民族各有

其不同的文化；这不同的文化之发生又各由其不同的地位了。然而一民族的特性必代表其一时代的理想，但须于这时代的总精神之下乃能了解。因为同一时代，各民族所代表之理想其相同的比相异的还多。不过各民族之相异的特殊理想都可认为真识，而不是完全的真理。若用哲学的眼光，把他们这些真识合而为一，乃为完全的真理。

不同的民族所代表之理想至于冲突、爆裂，于是发生战争。故战争不过是民族理想不相调协的象征。因此于胜败的结果必有强弱的理想可以表示出来：昨日的真理，到今日可为错误了。战争显得是真理与错误之决斗；胜利也就是真理战败错误的凯旋。故胜败不是听天，而是必然之理——即真理必胜。因此又于战争的胜败可以测定民族精神和其特性的价值的高低。——这是 Oictor Cousin 附带的战争论，也可引为谈人种问题的考证。

我们革命的先锋孙中山先生自从提倡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其目的；民族主义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是三民主义的主干；至于民权主义，乃运用民生主义的方法）以来，关于民族主义，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解释略有更变。其在未革命时（辛亥以前），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对汉满民族而言的意义；其在既革命（辛亥）以后，所谓民族主义是指合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家，只不过稍有汉族为中心的意义。至去年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开会，关于民族主义又有新的解释。这解释系分对外、对内两方面：在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这是对外；同时在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这是对内。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经了这番新解释，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

这种民族主义的新意义与人种问题很有关系，诸君可于上述的理论中看出来。同时，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应对世

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的准备，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但我又要问一句，这民族究竟真能复活吗？时机倒也到了，只看我们是怎么的奋斗和如何的努力！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但是，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所有的现象：无论甚么团体，时间不过许久，其中就发生一些无谓的争执与乎卑鄙的猜忌……种种鬼鬼祟祟的怪现象，这是很可悲观的啊！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猛力勇进，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今天提出这个人种问题来与诸君谈谈的意思。望大家从此努力！

（1924年6月20日《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6期）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记者足下：

入俄以来，忽已数月，以道途修阻未尝通讯于足下，而国中朋辈亦多以未接音书为念者，兹特借与足下通问之便，一述我漫游中所得的印象，能假大报余白为之披露，获以间接告其近状于朋辈，幸何如之。

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及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色，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却有大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

自满洲里来莫斯科，约经七昼夜可达。在此漫漫长途中，只有手一卷以为消遣，偶或探窗以观此幽深伟大绵延万里的长林，故亦不觉旅中的倦苦。抵莫京时，正值全世界五十余个民族的共产党代表集于此赤色的都城，参与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他们与弟相值，辄询及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来。俄人卫林士基，现执笔于真理报，近著“孙逸仙及其主义”一书，曾以一册赠我，

属为批评，我以不谙俄文，未能览读，故至今犹无以应。据留俄青年告我，当路透电告中山先生噩耗的谣言时，消息传来，俄都各大报自“真理报”以下，均著论哀悼，把中山先生的肖像刊于论首。这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先生在世界上的位置了。

暑中无事，曾到莫京近郊的马拉霍英卡一游。此地从前为莫京贵族及资产阶级避暑的处所，故有多数别邸建立于丛深的松林间，今皆为政府所没收，多为工人及儿童避暑之用了。东方大学于此处亦领有房屋数所，有学生百余人和儿童数十人来此避暑，中国留学生之在东大读书者亦与焉。我因中国朋友之介绍得在此小住数月，一观童子军及少年团的生活。其时正值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十周年纪念，我曾随同童子军及少年团到一农村看他们的宣传工作。当他们报告大战惨状的时候，环立而听的妇女有涔涔下泪者，盖有不堪回首之感矣！报告毕，有一双已逾中年的工人夫妇，抱出一个刚刚弥月的小孩，亲手授之于一少年共产党员，说他们愿将此子送给党中入“红十月”的队伍，稍长即入少年共产党的队伍。当日即为此事举行庆祝礼也。礼成，有童子军表演大战的故事，描写前次大战完全是因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而起的。演完，已夕阳西下，他们便整队出了农村，一幅华美的赤帜临风飘扬，引着International的歌声，他们归去了。苏联的少年组织分为三部：九岁以下者为“红十月”，以苏联的劳农国家诞生于十月革命故云，九岁至十五岁者为“先驱”，十五岁至二十三岁者为“少年共产党”。这一班小孩子，都是在革命的风土中开起来的鲜红的花，其精神气度完全与旧社会里产生的人划一新时代。他们的宣传力特别伟大，听说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儿童，看见他们的队伍，听见他们的歌声，便想跑进队伍跟着他们去，他们的父母关不住了。这

些小孩的小手，不但可以打破他们的旧家庭，实在可以打破全世界束缚人类的一切锁链。

九月初，我和一位同志陪同一位海员代表到列宁堡（旧名圣彼得堡）去参观，我们沾海员的光，住在一个“国际海员之家”里。这是一个海员俱乐部，其中设有图书馆及种种娱乐的设备，每日由下午五点到十一点开门，凡停泊列宁堡的船上的海员，都可到此读书玩赏。管图书馆者为一五十岁左右的女子，能操英语，曾到过中国上海等处。其中欧文书籍不少，日文书籍仅有一本，至中文书籍则绝无。据此女子云，两个月前，曾有中国海员二人到过此地，很希望我们送点中国书来。我们在此住了一周。兹将列宁堡所与我的印象略述一二。

列宁堡街路宽阔，建筑的规模宏大，不知道怎样，他可以使游人起一种历史的感情诗的兴味。最大的街为“十月街”，我甚爱此街的建筑。此地的人情生计，似均有超越莫斯科的点，往来街市的男男女女，大都衣履朴素而大方，不似莫斯科街上新经济政策下的暴发户的女子千奇百怪的样子。以莫斯科与列宁堡相较，我爱列宁堡。

我们承“海员之家”的办事人介绍，我们到列宁堡的劳动宫和主席团的一位见面，具述前来参观之意。此君首先示我们以一通列宁堡职工苏维埃打给英国职工大会的电稿，大意系唤起英伦的职工起来反对马克丹诺政府干涉广东革命政府，电中并声明系代表列宁堡四十万工人的意思。某君告我们说，此电已用无线电打过去了。某君派人陪我们在劳动宫里略一游览，时正在修缮各建筑物，预备图书馆博物院等等设置，因时间已晚，未能观毕，即在宫中匆匆午餐毕，即由劳动宫备一汽车送我们往红三角橡皮制造工厂去参观。这工厂有八千工人，是列宁堡第一个大工厂。在厂中略一参观，即参与他们的工人代表大会，为

报告英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革命政府的近情，举座皆为愤慨，随即通过一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议决案。

列宁堡的近郊有一儿童村。此地原为皇家村，俄皇的夏宫在此，其附近皆为贵族的别邸故名。今皆没收为国有矣。此地有十七处儿童及少年的住所，我们为要参观儿童的生活，所以特往一游。我们只参观了一所，中有儿童六、七十人，由一位管理儿童的女子导领参观毕，伊殷殷的嘱我们努力于改造世界的运动，伊在那里为我们训育后备军，并告我们以赴皇家花园的去路。我们便遵路往花园去。在花园中遇见赤军兵士三人，很恳切的询问中国革命的状况，并云"去年此际我们望眼欲穿的盼望德国的革命，惜竟未实现，今又盼望中国的革命了。中国何时为革命而需要吾人者，吾人当立往，吾人执戈待命也久矣"。我们握手谢谢他们革命的同情而去。

我们在列宁堡的时候正值少年国际的纪念日。是日有十数万的工人并少年男女，整队作游街的示威运动，冬宫前有一高台，示威行列都经行其下。台上每遇一队经行其下，即高呼"世界少年革命万岁！"等口号，该队亦高呼万岁以应之。我们因为去参观海口来冬宫稍晚，已经行过半矣，至则多人拥我等到台上的中央，群众便狂呼"中国革命万岁！"

是晚复在五一公园开一盛大的晚会，俄、德的少年演说中，均道及同情于中国革命及反对英美干涉中国的话。待我们回到莫斯科的时候，知道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马克曼努斯，法国共产党执行委员特润及美国共产党代表亚门特儿合电中山先生，攻击英、美、法三国的帝国主义。全俄职工联合会对于英国职工会大会关于此事有所建议。此种运动在莫斯科及其他诸大城均是一样的热烈，"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

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同声一致的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最近东方大学特为此问题开一示威运动大会，英国少年共产党代表杨君演说，攻击英国政府甚力。前晚在大剧院又有数千人的集合，英国共产党领袖马克曼努斯及中国、法国、美国、日本的共产党代表均出席演说。马克曼努斯演说中，说到他曾记得当中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英伦的时候，在满切士特有一示威运动，庆祝中国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成功。马克丹诺曾有演说祝贺孙逸仙的革命成功，此种声音尚在人耳。曾几何时，而马克丹诺的所谓劳动政府竟自干涉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政府了。云云。（演说详稿容觅得寄去）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余容续白。

九月念四日守常在莫斯科

（1924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今当民国十五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的日期，我们很是欢欣，同时我们又很是伤感。欢欣的，是这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已经很庄严的飘扬在中国首都的北京，作北方民众革命的指导；伤感的，是我们这一班同志在今年此季以热烈的情感共同庆祝升旗典礼的时候，不由的要追思那已经离开我们的总理孙先生。前年此季，总理正在广州，于军书旁午的时顷，他还很忙碌的指挥同志们筹备国民党改组的事。记得总理那时曾命廖仲恺同志告我说：总理要和京津的青年同志们谈话。总理把他们召集在面前，奋勉他们，鼓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于首都革命的运动；并且约他们留在广州的期间，多来听总理训话。有一个同志问总理道："总理每日政务军务很忙，我们什么时候来见好呢？"总理说："政务军务无论如何忙迫，都可以暂搁，你们何时来，我便何时接见，因为党务比政务军务都要紧。"更有一位青年同志，问总理道："广东的军队，何以不称为革命军呢？"总理说："革命军这一个名称，不能轻易的被在目前纷杂的军队的身上，因为他们的无纪律，无政治教育，徒引起广东人民的怨恶，丧失革命军的面目。这一个好好的名称，还要留待给那方在创立中的黄埔军校所造成的军队用。你们有志的青年，可以加入黄埔军校所造成的军队，才配称得起是真正的革命军。革命军的徽名，不能轻以加诸无纪律无政治教育的军队，致为所糟塌。"由这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总理是如

何的倚重北京的青年同志们担负这首都革命的责任，是如何倚重那黄埔的军校培成这可称为人民的武力的党军。可是从那时到今天，不过有两年的光景，广东的党军已经将广东全省的反革命势力肃清，这一幅表现国民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旗，也居然在首都革命的凯歌声中，飘扬在北京的空际了！假使总理在世，他看见我们举行升旗的典礼，该如何的欢喜？如今他却同仲恺同志都离开我们了！我们如何不伤感呢？

我们再回想去年此季，总理抱着满腔的热望来到北方，要和全国民众商量解决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二大问题，不料那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百般阻梗，以善后会议阻挠国民会议，以“外崇国信”的谬论，阻挠废除不平等条约。其时不幸总理又以积劳成疾，国事遂误于媚外军阀之手。犹忆总理在病榻上，一听到“国民会议”及“党军在东江胜利”的消息，便色然喜；一听到“善后会议”及“外崇国信”的话，便怒不可遏。如今屈指以数，总理离开我们，已快到一年了！我们的旗帜虽然高树在北京城，而国民革命的障碍，尚残存在政治中枢的地方，未能根本铲除，这又是我们于伤感之余，觉着有未能告慰总理在天之灵的。

我们的欢欣，我们的伤感，都能激动我们革命的情感，使之凝结而成为革命的勇气。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是地久天长的如青天白日一般，照临着我们，指导着我们，随伴着我们。我们只有鼓舞勇气，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牵起手来，向革命的战线上前进。

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的势力给我们的黑暗，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民众的革命精神，正如皎洁的青天白日一样。民众要团结起来，站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打破帝国主义及反革命的黑暗势力！黑暗的势力，遮不住青天白日

的光辉。

国民党改组以来，因为共产派的参加，党内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误会。但我们相信这些误会转瞬即能消释；因为凡是革命者的襟怀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够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即有些微的误会，决阻隔不住革命者的声应气求，正如几点浮云，决遮蔽不住青天白日一样。我们国民党中的同志，不论他是共产主义者，抑是非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披肝沥胆的提携起来，把由内部发生的误会或敌人挑拨的造谣而生的疑云障雾，一扫而空之！

蒋介石同志在他所作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序文》中，有几句最沉痛的话。大意是说："我们所能告慰先烈的，就在我们有总理遗留给我们的一系相传的国民党内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凝结而成的血统，继续国民革命的大业。我们悔未问过那些殉死的先烈们，是为共产主义而死呢？抑为三民主义而死呢？但是我们可以替他们回答道：他们直接是为总理的三民主义而死，间接即为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死。"我们同志们应该谛听介石同志沈痛的话，本着我们党内三民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凝结而成的精神，踏着他们提携前进的血路，为革命的工作努力，把一切的猜嫌疑忌蠲除净尽！

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尽管在那里造谣，以图减低民众对我们的信用，煽起我们内部的纷争；让我们保持住青天白日的光辉，照澈他们鬼蜮的伎俩。

近人评论现代的中国军人，每把"北冯"与"南蒋"并举，说中国军人以他们俩最有希望，亦惟他们最易有走入歧途的危险。他们所谓"歧途"即是赤化。我们要知道一般人所以感觉他们俩有希望的原故，正是因为感觉他们有走入赤化的"危险"。因为赤化不是旁的，就是民众化，

就是武力的民众化。

又有人挥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喊出“青白化”的口号，来对抗赤化，反对赤化，似乎青白化与赤化是相反的东西，其实这是大错。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

在近来每次北京的民众运动中，布满全城的，不是青天白日旗，便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五色旗则独不多见。中外人每起一种怀疑是，说中国民众已经废弃了国旗。殊不知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是国民领袖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旗。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工农民众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亦就是中国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征。

全国革命者联合起来！

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元旦

中国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之期

（1926年1月8日《国民新报》副刊第31号）

家国世情



风　俗

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今人但惧亡国之祸至，而不知其群之已亡也。但知亡国之祸烈，而不知亡群之祸更烈于亡国也。群之既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顾氏亭林有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谓亭林亡国之说，仅指一姓之丧灭，则其亡天下之说，即今日亡国之说也。谓其亡国之说，乃混易姓亡国于一事，则其亡天下之说，即今日亡群之说也。今日之群象，人欲横于洪流，衣冠沦于禽兽，斯真所谓仁义充塞人将相食之时也，斯真亡群之日也。群之人而甘于亡也，夫又何说？其不然也，则保群之事，必有任其责者矣。

夫群之存亡，非人体之聚散也。益群云者，不仅人体之集合，迺具同一思想者之总称。此种团体，实积有暗示力与暗示于他人者之层级而结合者。结合之容愈扩，暗示之力愈强。群之分子，既先天后天受此力之范制，因以成共是之意志，郁之而为风俗，章之而为制度，相维相系以建其群之基。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其力也。风俗之变，捷于雷火。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今其所挠，挠于人心也。龚氏自珍亦尝为说以释之，曰："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风之本义

也。”今其所樸，亦樸于人心也。是故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人心向道义，则风俗日跻于纯，人心向势力，则风俗日趋于敝。声之所播，力之所被，足以披靡一世之人心。人心之所向，风俗之所由成也，人心死于势利，则群之所以亡也。故曰：“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

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枢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枢。风之以义者，众与之赴义。风之以利者，众与之赴利。顾群枢之所在，亦因世运之隆污而殊。世运隆也，其人恒显于政，而势与义合，故其致俗于善也较易。世运污也，其人恒隐于学，而势与利合，义与势分，故其致俗于善也较难。前者易奏登高而呼之功，后者愈重障而东之之责。世无论其否泰，要于其群有自宅之位。功不问难易，要于其群负克尽之任。在朝可也，在野亦可也，因政可也，因学亦可也。惟群枢既离于政，则高明之地，必为势利所僭居，夺天下之观听，贼风俗之大本，斯时苟非别建群枢，以隐相与抗，则权势之所丛，利禄之所诱，群之人靡然趋之，亡群之祸，将无可幸免。仲尼之论政也，有风行草偃之说，垂上好下甚之戒。匡稚圭之疏政也，亦曰：“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主，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圣贤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诚以化俗于政，力非加强，势使然也。汉之光武，崇尚名节，士风丕变。哀平之衰，而能进于东京之盛，变齐至

鲁，功亦何伟，流风所被，虽至末造，党锢之流，独行之士，犹能依仁蹈义，舍命不渝。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不足，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毁世败德，可胜慨哉！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薦绅，知以名节为高，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亭林躬逢亡国之痛，深致慨于风俗之靡敝。而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曾涤生原才之言，殆亦非欺我者矣。

今以观于朝，执政之人，则如何者，政如疾风，民如秋草。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杀也，盈廷皆争权攘利之桀，承颜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机谲。将军变色于庙堂，豺狼横行于道路，雄豪自专其政柄，强藩把持其兵权。论功闻击柱之声，思乱多满山之寇，勇不如郑伯，其民敢劫货杀人，信不如秦穆，有士皆鸡鸣狗盗。祭祷开淫祀之风，有类好巫，嘉禾锡聚敛之臣，庸知尚俭。仁暴不同，流风自异，与人以术不以诚，取士以才不以德，不仁不孝，迺受崇奖，有气有节，则遭摈斥。意向既示，靡然向风，少年不以学问为本，士夫但以势利为荣。谗谄面谀，青蝇惑耳，直言谠论，寒蝉销声，不为光武之成，徒事孟德之毁。群学告我，风俗之行，一缘暗示，一缘模仿，相应并行，群之人且不识不知，顺率其则矣。况以有意之揣摩，益造一时之风气。嗟

呼！汉室之倾，宋社之屋，尚有一二慷慨就义从容尽节之士，以殉其所忠。循是以往，任群德之沦丧，若江河之日下，智者尽其智，勇者尽其勇，肆恶作孽，惟所欲为，似太平天日之无多，胥奴隶生活之是备，国终于必亡，人尚希苟免。一旦天倾地折，神州陆沈，旌旗飘扬于海外，壶箪奉负于中原，将求一正邱首而死者，亦不可得，亡群之祸，于斯为痛已。吾尝论之，群与己之关系，盖互为因果者也。有如何之人群，斯产如何之人物，有如何之人物，更造如何之人群。必有法之人群，始产拿破仑，亦自有拿破仑之人物，而后法之人群至今犹尚权诈。必有美之人群，始产华盛顿，亦自有华盛顿之人物，而后美之人群至今犹重道义。昔人评鹭孟德，亦谓为治世能臣，乱世奸雄。同一人也，胡以可为能臣，可为奸雄，则世之治乱为之也，则所产孕之人群异也。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亡国废墟，迺兴妖孽。平心论之，亡群之罪，不必全尸于助长之人群之自身，亦实有自作之业，惟幸而遇光明之人物，与人为善，则世风可隆，不幸而更遇桀黠之人物，助桀为虐，则世风愈下。观于哀、平可变于东京，五季可变于宋世，今之风俗，胡遽不可反于纯良。既握政权，世风攸系，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未可以挽狂，适益以阶厉，竟其所造，险恶秽暗，正不知其胡底。属望已绝，责备斯严，所不能为当今执政之人物讳，愈不能不为未来之人群忧者此也。

大易之道，剥上而复下，改邑不改井，群枢倾于朝，未必不能兴于野，风俗坏于政，未必不可正于学，立于朝显于政者，吾无敢责矣。草茅之士，宜有投袂而起，慨然以澄清世运，纲纪人心为己任者。而以观于野，或则以圣人自居，有奉之者，利禄之徒也；或则以英雄自命，有从之者，暴厉之子也。一将以术取，一将以力夺，阴希政

柄，殊途同归。及其究也，圣人得志，欺世盗名，英雄吐气，殃民乱国，均非吾侪所敢望也。余若一般士夫，则又鸡鸣而起，暮夜叩门，孳孳焉以求官为业，逢恶为能。势在一党，则蝇附一党，势在一人，则狐媚一人，既以贿而猎官，更以官而害民，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各择其地位之便，从而发挥其才智聪明，尽量以行于恶。满清之亡，民国之乱，党人之狂，政府之暴，皆有若辈之幻影，趋承缘附于其间，以长其恶。一旦恶贯满盈，则首示离异，争下落井之石者，又若人也。突梯滑稽，暮楚朝秦，世运有时而沧桑，人情有时而荣枯，若辈总无失势之日。明之亡也，朱舜水究致虏之由，归莫大之罪于士大夫。今之士夫，其罪视明之士夫为何如？而望其培刚正之风俗，倾罪恶之势力，石烂海枯，绝无可望，欲群不亡而国或保，乌可得哉！乌可得哉！然灵均去国，犹冀改俗，之推仕人，尚知明耻，凄凄碑碣，永招党锢之魂，滚滚黄河，不没清流之骨，松柏未凋于岁寒，鸡鸣讵已于风雨，纵遘彼昏之日，宁无独醒之人。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国一日未亡，责一日未卸，我尽我责，以求亡国之后，无憾而已。论者得毋谓祸已迫于眉睫，计尚求之迂缓，此诵经退敌之事也。曰，是不然。宇宙尚存，良知未泯，苟有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四方之士，望风兴起，千里一人焉，百里一人焉。或闻名而向慕，十人之尤者，百人之尤者，或吊风而感叹，声应气求，流湿就燥，未尝以志道相约也，而士皆和之，未尝以徒党相召也，而士皆归之。利达不易其心，威武不夺其气，力矫凉薄之习，共切澄清之志。朝有乱政，议论以裁抑之，于是世复有清议。人而无耻，风节以折服之，于是

世复知耻辱。严杜求仕之风，恬安百姓之分，积为群力，蔚成国风，其效至迅。群枢潜树于野，风俗默成于学，元恶大憝，必不敢披昌于吾群矣。亭林所谓“匹夫之责”，涤生所云“一命之士”，拯救国群，是在君子。虽以不肖之陋，亦将勖厉其匹夫之任以从之。

（1914年8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

厌世心与自觉心

记者足下：

前于大志四期独秀君之“爱国心与自觉心”，风诵回环，伤心无已！有国若此，深思挚爱之士，苟一自反，要无不情智俱穷，不为屈子之怀沙自沉，则为老子之骑牛而逝，厌世之怀，所由起也。有友来告，谓斯篇之作，伤感过甚。政治之罪恶既极，厌世之思潮，隐伏于社会，际兹晦盲否塞之运，哀哀斯民，谁则复有生趣，益以悲观之说，最易动人心脾。最初反问，我需国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则国家者，方为可爱。设与背驰，爱将何起？必欲爱之，非愚则妄。循是以进，自觉之境，诚为在迩。然若所思及此而止，将由兹自堕于万劫不复之渊，而以亡国灭种之分为可安，夫又安用此亡国灭种之自觉心为也。愚惟独秀君构文之旨，当不若是。观其言曰：“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似其言外所蓄之意，未为牢骚抑郁之辞所尽也。厥后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东。询以国门近象，辄又未言先叹曰：“一切颓丧枯亡之象，均如吾侪悬想之所能及，更无可说。惟兹行颇赐我以觉悟，吾侪小民，侈言爱国，诚为多事。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是则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其文中，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愚则自忘其无似，僭欲申独秀君言外之旨，稍进一解。诚以政俗靡污，

已臻此极，伤时之士，默怀隐痛，不与独秀君同情者，宁复几人！憔悴行吟，怅然何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所述友言，即其征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梗喉，不吐不释，独秀君其许我乎？国家善恶之辨，古今学者，纷纷聚讼，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智儿诸人，赞扬国家之善，装璜备至。自然法派，则谓为必要之罪恶，而昌无治之义者，辄又遮拨国家，几欲根本推翻，不稍宽假。此事诉于哲理，太涉邈玄，非本篇所欲问。惟就今世论今世。国家为物，既为生存所必需，字以罪恶，未免过当。至若国家目的，东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东方特质，则在自贬以奉人；西方特质，则在自存以相安。风俗名教，既以此种特质精神为之基，政治亦即建于其上，无或异致。但东西文明之融合，政俗特质之变革，自赖先觉者之尽力，然非可期成功于旦夕也。惟吾民于此，诚当自觉。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觉力，黾勉奋进，以向所志，何时得达，不遑问也。若夫国家兴亡，民族消长，历史所告，沧桑陵谷，迁流罔极，代兴代亡者，辩然其非一姓氏一种族也。秦皇、元代之雄图，波斯、罗马之霸业，当其盛时，丰功伟烈，固莫不震赫于当世。曾几何时，江山依旧，人事全非，英雄世主之陈迹，均已荒凉沦没于残碑断阙之间，杳如烟雾，不可复识，所谓帝国宏规者，而今安在哉！是故自古无不亡之国，国苟未亡，亦无不可爱之国，必谓有国如英、法、俄、美而后

可爱，则若而国者，初非与宇宙并起，纯由天赐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凭其国民之爱国心，发挥而光大之，底于有成也。既有其国，爱固不妄。溯其建国伊始，或纵有国，而远不逮，今斯其爱国，又将云何！复次谓朝鲜、土耳其、墨西哥乃至中国之民，虽有其国，亦不必爱，则是韩并于日，土裂于人，墨联于美，或尚足夸为得所。如吾国者，同一自损，更何所择，惟有坐以待亡，听人宰割，附俄从日，惟强者之威命是听，方为得计。斯而可乐，人间更有何事足为畏怖？愚不识斯时果有何幸福加于国家尚存残体之时，并不识斯时自甘居亡国奴地位以外，究有奚裨助于吾侪者。独秀君之所谓自觉心者，必不若是矣。

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诚可痛，亦宜亟谋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国之民，犹为惨酷，殆亦悲观过激蔽于感情之辞。即果有之，亦不过一时之象，非如亡国惨劫，永世不复也。昔有文人 Souvestre 者，尝游巴黎，感怀所触，著为笔录。曾纪一日漫游曲巷，目击穷苦细民，杂处蓬窦，褴褛曝日，风飘蔽牖，泥沟流秽，臭气逼人。亦有孤客，愁死他乡，累然一棺，零丁过市，北邙委骨，狐狸食之，泉台咽恨，幽魂何依！感此惨象，归而永叹，辄谓人世悲苦，真不如草木之无知，鸟兽之自得也。追见梁前燕子，雏俱分飞，中有弱稚，弃于故巢，绕室哀鸣，母燕不顾，呢喃自啭，竟以僵死。以视人间母子之爱，海枯石烂，卒无穷期者，判若天渊矣。则又憬然曰："佳儿慈母，例证若斯，其足令人反省，使仍乐为人类者，何其深也。一时激于厌世之思，则羡蛮貊之人为幸运，谓以人而不如飞鸟之回翔自得，但平允之明察，旋即轨似是而非之念于正理。试深考之，当知人性于善恶杂陈之间，善量如此之宏，乃以惯见而不觉，恶一感人，辄全觉之，以其为善之

例外也。”（见所著 An Attic Philosopher in Paris 第八章 Misanthropy and Repentance）与其于恶国家而盲然爱之，诚不若致国家于善良可爱之域而怡然爱之。顾以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遽祈无国，至不惮以印韩亡国之故墟，为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对于国家，已同自杀，涉想及此，亦可哀已。第平心以思，国苟残存，善之足以庇民而为惯见不觉者何限，其恶之为吾人所不耐者，乃以其为善之例外，感而易察。反之，亡国之境，甘苦若何，印韩之民，类能道之。万一不幸，吾人而躬蹈其遇，亲尝其苦，异日者天涯沦落，同作亡民，相逢作楚囚之泣，或将兴狐兔之悲矣。吾人今日取以自况，而羡为善者，殆以为其恶之例外耳。故吾人自愧于印韩之民，乃与厌世者之憎恶人间，以为不如草木鸟兽之无知者，出于同一之心理。是当于厌倦（Misanthropy）之后，继以觉悟（Repentance）纯正之自觉，斯萌发于此时矣。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挽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 Henri Bergson 氏之“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尚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乌可过自菲薄，至不侪于他族之列。他人之国，既依其奋力而造成，其间智勇，本不甚悬，舜人亦人，我何弗若？必谓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则此特别之民，当隶于特别之国，治以特别之政，此种论调，客卿尝以之惑吾当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

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倘谓河清已叹无期，风云又复卷地，人寿百年，斯何可望！则愚闻之，国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犹身之生死。日人中江兆民，晚年罹恶疾不治，医言一年有半且死。兆民曰："命之修短，宁有定限，若以为短，则百年犹旦夕耳。若以为修，则此一年有半，亦足为余寿命之丰年矣。"遂力疾著书不稍倦。愚今举此，或且嗤为拟于不伦，但哲士言行，发人深省，吾国今日所中之疾，是否果不可为，尚属疑问。即真不可为，犹有兆民之一年有半，为吾民最终奋斗之期，所敢断言。吾民果能谛兆民精勤不懈之意，利此余年，尽我天职，前途当发曙光，导吾民于光华郅治之运，庸得以目前国步之崎岖，猥自沮丧哉！

近者中、日交涉，丧权甚巨，国人愤激，骇汗奔呼。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裁者。爱国之诚，至于不顾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则至可闵，而亦大足戒也。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聪颖优秀者，悉数且甚寥寥，国或不亡，命脉所系，即在于是。而今或以精神，或以躯干，纷纷以向自杀之途，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国真万万无救矣。然则国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国之罪，无与于人，我自尸之。少年锐志，而亦若此，是亡国之少年，非兴国之少年也。夫自杀之举，非出于精神丧失之徒，即出于薄志弱行之辈。日本少年，一遭艰窘，只有投华严之泷之本领，哲人每以是薄之。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拟彼华严之泷，人其又谓我何也。且时日害丧，国耻难忘，充吾人之薪胆精神，迟早当求一雪，即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

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不此之图，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妇之自经沟渎，是人不战而已屈我于无形，曹社之鬼，嘻嘻笑于其侧矣。是皆于自觉之义有未明也。往岁愚居京师，暗杀、自杀之风，并炽于时，乃因蒋某自铳之事，作“原杀”一文以论之。兹复摘录其一节：

自杀何由起乎？宇宙万象，影响于人类精神之变化者，至极复杂，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即如蒋君自杀一端，就蒋个人观之，则出于一时愤激，就其愤激之原因考之，则又原于校事棘手，其影响及于一人，其原因基于一事，其愤激起于一时。若作社会见象观之，则蒋君自杀之见象，实为无量之他种社会见象促动之结果，模仿、激昂、厌倦、绝望，皆其造因，积此种种之心理见象，而缘于一事，发于一朝。其所由来者渐，其所蕴蓄者素，而所以激发此心理见象者，实以有罪恶之社会见象为其对象也。人类行为，有不识不知而从其途辙者，谓之模仿，是乃社会力之一种。今人轻生好杀，相习成风，自清季已然。陈星台、杨笃生诸先辈，均以爱国热诚，愤极蹈海而死，自杀之风，遂昌于国，而接其踵者，时有所闻，则模仿之力也。鄙陋之夫，有自裁者，其家人或相继出此，至有以同一方法行于同一场所者，庸俗不察，指为冤魂作祟，抑知此亦模仿之故，然发见此类事实之家庭，其隐痛必有难言者矣。复次，社会不平，郁之既久，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光复以还，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纷紊，世途险诈，廉耻丧尽，贿赂公行，士不知学，官不守职，强凌弱，众暴寡，天地闭，贤人隐，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稽神州四千余年

社会之黑暗，未有甚于此时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轻生，而自杀，社会见象，激之使然，乌足怪者。夫世之衰也，政俗不良，人怀厌倦之思，忠贤放逐，归隐林泉，其极乃至厌弃人世，饮恨自裁者有之。在昔暴秦肆虐，仲连蹈海，荆楚不纲，灵均投江，一瞑不顾，千古同悲。而清洁之流，不为世容，相率黄冠草履，歌哭空山者，征诸史册，又未可以偻指数。则厌倦浊世，宁蹈东海而死，古今盖有同兹感慨者矣。抑自杀亦为绝望之结果也。自古忠臣殉国，烈妇殉夫，临危尽节，芳烈千秋，此其忠肝义胆，固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然人见忠臣之殉国也难，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国也不难；人见烈妇之殉夫也难，而烈妇之所以殉其夫也不难。盖忠臣烈妇之所望于其国其夫者，至恳且厚，既举其毕生之希望，寄于其国其夫，一旦国危夫死，天长地久，绵绵无尽，更安可望者，则殉之以出自裁，其于精神，实觉死而愉快，有甚于生而痛苦者焉。满清末造，吾人犹有光复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虽内虐外侵，压迫横来，而以有前途一线之望，不肯遽灰其志，卒忍受其毒苦。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无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伤心之士，安有不痛愤欲绝，万念俱灰，以求一瞑，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也。呜呼！社会郁塞，人心愤慨，至于此极，仁者于此，犹不谋所以救济之方。世变愈急，人生苦痛，且随之益增，而生活艰窘，饥寒更相困迫。佛说天堂，而天堂无路；耶说天国，而天国无门，万象森罗，但有解脱之一路，即自杀是。哀哀禹域，行见其民之相杀自杀以终也。然则求之荒渺，索之幽玄，毋宁各自忏悔，涤濯罪恶，建天堂天国于人世，化荆棘

为坦途，救世救人，且以自救，茫茫来纪，庶尚有生人之趣乎！

由斯以谈，自杀之象，其发也虽由一时一事之激动，而究其原，则因果复杂，其酝酿郁积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遏之，惟望政治及社会，各宜痛自忏悔；而在个人，则对之不可蔽于物象，猥为失望，致丧厥本能，此即自觉之机，亦即天堂天国之胚种也。尤有进者，文学为物，感人至深，俄人困于虐政之下，郁不得伸，一二文士，悲愤满腔，诉吁无所，发为文章，以诡幻之笔，写死之趣，颇足摄人灵魄。中学少年，智力单纯，辄为所感，因而自杀者日众。文学本质，固在写现代生活之思想，社会黑暗，文学自畸于悲哀，斯何与于作者？然社会之乐有文人，为其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也。方今政象阴霾，风俗卑下，举世滔滔，沉溺于罪恶之中，而不自知。天地为之晦冥，众生为之厌倦，设无文人，应时而出，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人心来复之几久塞，忏悔之念，更何由发，将与禽兽为侣，暴掠强食以自灭也。若乃耽于厌世之思，哀感之文，悲人心骨，不惟不能唤人于罪恶之迷梦，适以益其愁哀。驱聪悟之才，悲愤以戕厥生，斯又当代作者之责，不可不慎也。偶有怅触，拉杂书之，仅以述感，不复成文。惟足下进而教之，余不白。李大钊白。

（1915年8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

青　春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人事万端，那堪回首，或则幽闺善怨，或则骚客工愁。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贡其柔丽之姿于吾前途辽远之青年之前，而默许以独享之权利。嗟吾青年可爱之学子乎！彼美之青春，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怜子之劳，爱子之才也，故而经年一度，展其怡和之颜，饯子于长征迈往之途，冀有以慰子之心也。纵子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圣神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而夙兴夜寐，不遑启处，亦当于千忙万迫之中，偷隙一盼，霁颜相向，领彼恋子之殷情，赠子之韶华，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

块然一躯，渺乎微矣。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其得永享青春之幸福与否，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如其有尽，纵有彭、聃之寿，甚且与宇

宙齐，亦奚能许我以常享之福？如其无尽，吾人奋其悲壮之精神，以与无尽之宇宙竞进，又何不能之有？而宇宙之果否为无尽，当问宇宙之有无初终。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于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质言之有而已矣。庄周有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云："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夫晦朔与春秋而果为有耶，何以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而菌蛄独不知也？其果为无耶，又何以菌蛄虽不知，而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也？是有无之说，亦至无定矣。以吾人之知，小于宇宙自然之知，其年小于宇宙自然之年，而欲断空间时间不能超越之宇宙为有为无，是亦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耳！秘观宇宙有二相焉：由佛理言之，平等与差别也，空与色也。由哲理言之，绝对与相对也。由数理言之，有与无也。由易理言之，周与易也。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宋儒罗泌尝论之于《路史》，而金氏圣叹序《离骚经》，释之尤近精微，谓"周其体也，易其用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圣人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尘尘刹刹，无

不普遍，又复尘尘周于刹刹，刹刹周于尘尘，然后世界自见其易，圣人时得其常，故云周易。”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同异之辨也。东坡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此变不变之殊也。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其色者差别者青春之进程，其空者平等者无尽之青春也。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周执其易，以其无持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道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邃研物理，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之有高下而后流也。今太阳本热常耗，以彗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冈

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斯能耗热耗力。故大宇积热力，每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天地且有时而毁，况其间所包蕴之万物乎？漫云天地，究何所指，殊嫌茫漠，征实言之，有若地球。地球之有生命，已为地质学家所明证，惟今日之地球，为儿童地球乎？青年地球乎？丁壮地球乎？抑白首地球乎？此实未答之问也。苟犹在儿童或青年之期，前途自足乐观，游优乐土，来日方长，人生趣味益以浓厚，神志益以飞舞；即在丁壮之年，亦属元神盛涌，血气畅发之期，奋志前行，亦当勿懈；独至地球之寿，已臻白发之颓龄，则栖息其上之吾人，夜夜仰见死气沉沉之月球，徒借曜灵之末光，以示伤心之颜色于人寰，若以警告地球之终有死期也者，言念及此，能勿愀然。虽然，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于地球之责任。虽明知未来一刹那之地球必毁，当知未来一刹那之青春不毁，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犹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未来一刹那之我，仍有对于未来一刹那之地球之责任。庸得以虞地球形体之幻灭，而猥为沮丧哉！

复次，生于地球上之人类，其犹在青春乎，抑已臻白首乎？将来衰亡之顷，究与地球同时自然死灭乎，抑因地球温度激变，突与动植物共死灭乎？其或先兹事变，如个人若民族之死灭乎？斯亦难决之题也。生物学者之言曰：人类之生活，反乎自然之生活也。自妇人畏葸，抱子而奔，始学立行，胸部暴露，必须被物以求遮卫，而人类遂有衣裳；又以播迁转徙，所携食物，易于腐败，而人类遂

有火食。有衣裳而人类失其毛发矣，有火食而人类失其胃肠矣。其趋文明也日进，其背自然也日遐，浸假有舟车电汽，而人类丧其手足矣。有望远镜德律风等，而人类丧其耳目矣。他如有书报传译之速，文明利器之普，而人类亡其脑力。有机关枪四十二珊之炮，而人类弱其战能。有分工合作之都市生活，歌舞楼台之繁华景象，而人类增其新病。凡此种种，人类所以日响灭种之途者，若决江河，奔流莫遏，长此不已，劫焉可逃？此辈学者所由大声疾呼，布兹骇世听闻之噩耗，而冀以谋挽救之方也。宗教信士则从而反之，谓宇宙一切皆为神造，维护之任神自当之，吾人智能薄弱，惟托庇于神而能免于罪恶灾厄也。如生物家言，是为蔑夷神之功德，影响所及，将驱人类入于悲观之途，圣智且尚无灵，人工又胡能阏，惟有瞑心自放，居于下流，荒亡日久，将为人心世道之忧矣。末俗浇漓，未始非为此说者阶之厉也。吾人宜坚信上帝有全知全能，虔心奉祷，罪患如山，亦能免矣。由前之说，固易流于悲观，而其足以警觉世人，俾知谋矫正背乎自然之生活，此其所长也。由后之说，虽足以坚人信仰之力，俾其灵魂得优游于永生之天国，而其过崇神力，轻蔑本能，并以讳蔽科学之实际，乃其所短也。吾人于此，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更宜悚然于生物学者之旨，以深自警惕，力图于背逆自然生活之中，而能依人为之工夫，致其背逆自然之生活，无异于顺适自然之生活。斯则人类之寿，虽在耄耋之年，而吾人苟奋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返于无尽青春之域，而奏起死回生之功也？

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

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洪荒而后，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踌然其不可纪矣。粤稽西史，罗马、巴比伦之盛时，丰功伟烈，彪著寰宇，曾几何时，一代声华，都成尘土矣。只今屈指，欧土名邦，若意大利，若法兰西，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和兰，若比利时，若丹马，若瑞典，若那威，乃至若英吉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回溯往祀，是等国族，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躯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其校新者，惟德意志与勃牙利，此次战血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才矣。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支那自黄帝以降，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历世久远，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稽其民族青春之期，远在有周之世，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过此以往，渐向衰歇之运，然犹浸衰浸微，扬其余辉，以至于今日者，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夫人寿之永，不过百年，民族之命，垂五千载，斯亦寿之至也。印度为生释迦而兴，故自释迦生而印度死；犹太为生耶稣而立，故自耶稣生而犹太亡；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黤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吾青年之骤闻斯言者，未有不变色裂眥，怒其侮我之甚也。虽然，勿怒也。吾之国族，已阅长

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与吾并称为老大帝国之土耳其，则青年之政治运动，屡试不一试焉。巴尔干诸邦，则各谋离土自立，而为民族之运动，兵连祸结，干戈频兴，卒以酿今兹世界之大变焉。遥望喜马拉亚山之巅，恍见印度革命之烽烟一缕，引而弥长，是亦欲回其民族之青春也。吾华自辛亥首义，癸丑之役继之，喘息未安，风尘澒洞，又复倾动九服，是亦欲再造其神州也。而在是等国族，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建国伊始，肇锡嘉名，实维中华。中华之义，果何居乎？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吾辈青年之大任，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中以前之历史，不过如进化论仅于考究太阳地球动植各物乃至人类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者，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也。中以后之历史，则以是为古代史之职，而别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更生回春为其中心之的也。中以前之历史，封闭之历史，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洁白之历史，新装之历史，待施绚绘之历史也。中以前之历史，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

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华与实相为轮回，即开敷与废落相为嬗代。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白首中华者，渐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有渐即废落之中华，所以有方复开敷之中华。有前之废落以供今之开敷，斯有后之开敷以续今之废落，即废落，即开敷，即开敷，即废落，终竟如是废落，终竟如是开敷。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斯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溉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与归矣？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宜有即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敷，开敷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抑吾闻之化学家焉，土质虽腴，肥料虽多，耕种数载，地力必耗，砂土硬化，无能免也，将欲柔融之，俾再反于丰穰，惟有一种草木为能致之，为其能由空中吸收窒素肥料，注入土中而沃润之也。神州赤县，古称天府，胡以至今徒有万木秋声、萧萧落叶之悲，昔时繁华之盛，荒凉废落至于此极也！毋亦无此种草木为之文柔和润之耳。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畴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顾人之生也，苟不能窥见宇宙有无尽之青春，则自呱呱堕地，迄于老死，觉其间之春光，迅于电波石火，不可

淹留，浮生若梦，直菌鹤马蜩之过乎前耳。是以川上尼父，有逝者如斯之嗟；湘水灵均，兴春秋代序之感。其他风骚雅士，或秉烛夜游；勤事劳人，或重惜分寸。而一代帝王，一时豪富，当其垂暮之年，绝诀之际，贪恋幸福，不忍离舍，每为咨嗟太息，尽其权力黄金之用，无能永一瞬之天年，而重留遗憾于长生之无术焉。秦政并吞八荒，统制四海，固一世之雄也，晚年畏死，遍遣羽客，搜觅神仙，求不老之药，卒未能获，一旦魂断，宫车晚出。汉武穷兵，蛮荒慑伏，汉代之英主也，暮年永叹，空有“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之慨。最近美国富豪某，以毕生之奋斗，博得 $ 式之王冠，衰病相催，濒于老死，则抚枕而叹曰：“苟能延一月之命，报以千万金弗惜也。”然是又安可得哉？夫人之生也有限，其欲也无穷，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坐令似水年华，滔滔东去，红颜难再，白发空悲，其殆人之无奈天何者欤！涉念及此，灰肠断气，厌世之思，油然而生。贤者仁智俱穷，不肖者流连忘返，而人生之蕲向荒矣，是又岂青年之所宜出哉？人生兹世，更无一刹那不在青春，为其居无尽青春之一部，为无尽青春之过程也。顾青年之人，或不得常享青春之乐者，以其有黄金权力一切烦忧苦恼机械生活，为青春之累耳。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岂惟无处购买，邓氏铜山，郭家金穴，愈有以障翳青春之路俾无由达于其境也。罗马亚布达尔曼帝，位在皇极，富有四海，不可谓不尊矣，临终语其近侍，谓四十年间，真感愉快者，仅有三日。权力之不足福人，以视黄金，又无差等。而以四十年之青春，娱心不过三日，悼心悔憾，宁有穷耶？夫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以吾人之生，洵如卡莱尔所云，特为时间所执之无限而已。无限现而为我，乃为现在，非为过去

与将来也。苟了现在，即了无限矣。昔者圣叹作诗，有“何处谁人玉笛声”之句。释弓年小，窃以玉字为未安，而质之圣叹。圣叹则曰：“彼若说‘我所吹本是铁笛，汝何得用作玉笛？’我便云：‘我已用作玉笛，汝何得更吹铁笛？’天生我才，岂为汝铁笛作奴儿婢子来耶？”夫铁字与玉字，有何不可通融更易之处。圣叹顾与之争一字之短长而不惮烦者，亦欲与之争我之现在耳。诗人拜轮，放浪不羁，时人诋之，谓于来世必当酷受地狱之苦。拜轮答曰：“基督教徒自苦于现世，而欲祈福于来世。非基督教徒，则于现世旷逸自遣，来世之苦，非所辞也。”二者相校，但有先后之别，安有分量之差。拜轮此言，固甚矫激，且寓风刺之旨。以余观之，现世有现世之乐，来世有来世之乐。现世有现世之青春，来世有来世之青春。为贪来世之乐与青春，而迟吾现世之乐与青春，固所不许。而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遽弃吾来世之乐与青春，亦所弗应也。人生求乐，何所不可，亦何必妄分先后，区异今来也？耶曼孙曰：“尔若爱千古，当利用现在。昨日不能呼还，明日尚未确实。尔能确有把握者，惟有今日。今日之一日，适当明晨之二日。”斯言足发吾人之深省矣。盖现在者吾人青春中之青春也。青春作伴以还于大漠之乡，无如而不自得，更何烦忧之有焉。烦忧既解，恐怖奚为？耶比古达士曰：“贫不足恐，流窜不足恐，囹圄不足恐，最可恐者，恐怖其物也。”美之政雄罗斯福氏，解政之后，游猎荒山，奋其铁腕，以与虎豹熊罴相搏战。一日猎白熊，险遭吞噬，自传其事，谓为不以恐怖误其稍纵即逝之机之效，始获免焉。于以知恐怖为物，决不能拯人于危。苟其明日将有大祸临于吾躬，无论如何恐怖，明日之祸万不能因是而减其豪末。而今日之我，则因是而大损其气力，俾不足以御明日之祸而与之抗也。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

有我、有我之现在而足恃。堂堂七尺之躯，徘徊回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何待他人之援手，始以遂其生者，更胡为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惟足为累于我之现在及现在之我者，机械生活之重荷，与过去历史之积尘，殆有同一之力焉。今人之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羶，蛾之投火，究其所企，克致志得意满之果，而营营扰扰，已逾半生，以孑然之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盖其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者也。耶经有云："富人之欲入天国，犹之骆驼欲潜身于针孔。"此以喻重荷之与青春不并存也。总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罣，全其优美高尚之天，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唯一之蕲向，青年唯一之责任也矣。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尔欲享兹幸福，当死于少年之中。"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评骘锡札曰："彼由青春之杯，饮人生之水，并泡沫而干之。"吾愿吾亲爱之青年，擎此夜光之杯，举人生之醍醐浆液，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役于物，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自我之青春，何能以外界之变动而改易，历史上残骸枯骨之灰，又何能塞蔽青年之聪明也哉？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乃示以去累除忧之道，有曰"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

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舟车。"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此其谓道，殆即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吾文至此，已嫌冗赘，请诵漆园之语，以终斯篇。

（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

吾侪际此新旧衍嬗之交，一切之生活现象，陈于吾侪之前者，无在不呈矛盾之观。即吾侪对于此种之生活负担，无在不肩二重之任。吾侪欲于此矛盾生活中胜此二重之负担，实不可不以沈雄之气力、奋斗之精神处之。

新年才过，旧岁又阑，一切岁前岁后之所需，凡夫清结债务，购置物品，乃至一切新年之风俗礼节，有如宴会贺礼等事，均为二重之负担。对于新人，则当于新年以新礼节为新社交；对于旧人，则当于旧年以旧礼节行旧社交。若者脱帽，若者拱揖，若者鞠躬，若者拜跪，或则松坊焕采，或则爆竹迎神，或则桃符更新，或则悬旗志贺，纷纭错杂，莫所适从。此矛盾之生活一也。

因是联想，北京之地，警队林列，夜则荷枪通衢，梭巡不已。而一方则鸣锣更夫，抱关击柝，一仍其旧。试问此鸣锣更夫与荷枪警士之俸费，何莫非吾民之负担？既有警士，何用更夫？苟取更夫，焉需警士？此矛盾之生活二也。

因是联想，辛亥之役，武汉一呼，天惊石破，南部义师，北方将士，均以共和立宪要挟清廷，逊位之诏朝颁，统一之业夕就。其间使节轺车，南至沪渎，议和电报，各处交驰，结果以优待条文载在盟府。于是一方则负皇室经费，一方则增公府经费、元首岁俸，蚩蚩者氓，不知不识之间，又增一种之二重负担。此矛盾之生活三也。

因是联想，文豪政客，十年以还，多以立宪政治之实

行，为唯一之希望。自戊戌以迄辛亥，其间政派无间，其为温和为激烈，有所言动，无不以此为归。而今国会开矣，代议政治（立宪政治）稍具形式矣。默察夫国中贤者，一面要求国会，一面嫌恶国会，一面施行代议政治，一面鼓吹开明专制。此矛盾之生活四也。

因是联想，青年学子，修学庠校之中，一面须涉猎本国之经史子集，一面须研究现代之新式科学，一面须讲周、孔之学，一面须取卢、孟之说。以视四十年以往之前辈，其心思神脑之负担，加重之度，正不仅二重而止。此矛盾之生活五也。

因是联想，吾侪日常生活，乃至应用什器，无一不兼尚并需。衣冠为物，乃人生三大要需之一，苟其但求整饬，无事美观，亦须一面制洋服一套，一面备华服一身。即记者伏案构此文时，眼中映陈之物，一方则为毛锥，一方则为 Pen，一方则有松烟，一方则有 Blue Ink。斯篇如不以鄙俚见弃，则付印时，一方又须排华字，一方又须排英字。即此艰苦之排字工人，亦需具差能胜此之二重智识。否则此种营生，不能不让之他人，而其人或以是不免于冻馁。此矛盾之生活六也。

因是联想，一夫一妻之制，衡诸天理人道，最称允当，不可渝犯。文明各国，悉本此义，制为法律，有犯之者，则为重婚，重婚者，罪律有明条。今于吾国，一方则有禁止重婚之法律，一方则欲保存蓄妾之恶风。为妾之女，于法无受其保障之权，重婚之夫，于法无施以制裁之效。此矛盾之生活七也。

因是联想，最终及于宪法。夫旧式礼教与现代生活，本不并容。吾侪既不能离于现代生活，而返于草昧半开之时代，而偏欲以旧式礼教使人循守于今日。于是当兹制宪之际，一方则绝叫保障信仰自由，一方则运动以孔教为国

教，一方尊重国民之自我，一方保持偶像之位置。纷呶叫喧，今犹未已。此矛盾之生活八也。

以上种种，不过就一时联想之所及，拉杂陈之，雅无伦次。其他类此者，正复不可殚述。一言以蔽之，中国今日之社会，矛盾之社会也。今日之政治，矛盾之政治也。今日之法律，矛盾之法律也。今日之伦理，矛盾之伦理也。今日之经济，矛盾之经济也。乃至今日之文艺、美术、宗教、哲学，矛盾之文艺、美术、宗教、哲学也。国民之生活以是等为基础。生活之基础既陷于矛盾之域，故今日之生活现象，无往而非矛盾之生活现象也。

以何因缘而成此矛盾之生活现象乎？欲答此问，因果繁赜，殊难悉举。简言之，亦曰新旧不调和而已矣。旧者自守其旧，新者自用其新，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合之效，卒至新者自新，旧者自旧，同时同地而不容并存者，乃竟各存其形式。即其实质，察其精神，终于新者不能成其新，旧者不能存其旧。凡夫新旧伦理、法制、艺术、哲、宗，将悉臻于破产之境。青黄不接，矛盾相寻，此一阶段之国民生活史，最为危险。故曰：矛盾之生活，不调和之生活也。

所以造成此不调和之生活者，其主因亦有二端：一由于累代之专制政治戕贼民性泰甚，以成此不自然之状态，并以助长好同恶异之根性，致保守之力过坚，但知拒而不知迎，但知避而不知引。重以吾国历史之悠久，有吾民族固有之文明，逮夫近代西方文明汹涌东渐，一方迫之愈急，一方拒之愈甚，遂现此不调和之象焉。日人市村赞次郎氏尝谓吾国民生性有五大矛盾：（一）保守而不厌变化，（二）从顺而有时反抗，（三）一般文弱而个人有所不屈，（四）极好主我而又能雷同，（五）贵实行而溺于形式。此其所言，未必皆中，愚则谓苟有此态，是亦专制政治造成

之果。故曰：矛盾之生活，不调和之生活，亦不自然之生活也。

一由于东西文明接触之初，未能调融一致，则其相摩相荡、相攻相守之际，当然呈此矛盾之象，无足怪者。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觉之士，以调和东西文明自任者，犹不惮大声疾呼之劳，以图殊途同归之效。况在吾国，以其固有之文明与外来之文明相遇，离心力强，向心力弱，即同化之机不易得，即归一之径不易达。故曰：矛盾之生活，不调和之生活，亦不统一之生活也。

吾侪既一时不能骤脱此矛盾之生活，不调和之生活，不自然之生活，不统一之生活，即一时不能不竭其心思气力以负荷此二重之生活负担。然此种生活状态，只于新旧文明过渡之时期可以安忍于一时，而不能长此以终古。吾侪当进而以负荷此二重生活负担之心思气力，谋所以打破此矛盾生活之阶级，而使之新旧合一，以轻此负担。其打破之方术，在固新文明新生活之地位，以与旧文明、旧生活分对等之势力，而深养其锋，以迫旧文明、旧生活与新文明新生活相妥协、相调和，否则征服之而已矣。此则视乎醉心新文明、新生活者，沈雄之气力，奋斗之精神何如耳！愚于新旧元旦，谨各浮三大白，以壮吾青年之勇气。行矣，任重道远之青年，凯歌之声，将与岁岁之春风以俱至也。

（1917年1月10日《宪法公言》第9期）

调和之美

人莫不爱美，故人咸宜爱调和。盖美者，调和之产物，而调和者，美之母也。

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漾而出者。美味，吾人之所甘也，然当知味之最美者，殆皆苦辛酸甜咸相调和之所成也。美色，吾人之所好也，然当知色之最美者，殆皆青黄赤白黑相调和之所显也。美音，吾人之所悦也，然当知音之最美者，殆皆宫商角徵羽相调和之所出也。美因缘，吾人之所羡也，然当知因缘之最美者，殆皆男女两性相调和之所就也。饮食、男女如是，宇宙一切事物罔不如是。故爱美者，当先爱调和。

《甲寅》而欲成其自身之美以固阅者之爱也，必与各方之利害情感以调和之域，俾如量以彰其实。《甲寅》而欲以其自身之美，感化国人，使之益昭其美而交相爱也，必人人本《甲寅》之精神，与人人以调和之域，俾如量以获其分。

是即《甲寅》之美，亦即宇宙之美。

（1917 年 1 月 29 日《甲寅》日刊）

真　　理（一）

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

余信世界文明日进。此真理者，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

孔子之道也，佛法也，耶教也，未尝不本此真理而成也。然既称为真理，毕竟宇宙之间无古今、无中外，常有此真实之一境，非孔子、释迦、耶稣辈之私有物也。

由是言之，不惟宪法上规定孔道为无用，即信教自由之条文亦为无用。吾人苟希冀此宪法而有保持真理，助进文化之用者，且当排斥信教自由，主张不信教自由矣。

（1917年2月1日《甲寅》日刊）

真　　理（二）

吾人欲寻真理之所在，当先知我之所在，即其我之身分、知识、境遇以求逻辑上真实之本分，即为真理。

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释迦之说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耶稣之教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乃至各宗各派，吾人对之罔不若是。盖其传说中所含之真理，偏而不全，驳而不确。吾人断不可举其自我以贡崇奉偶像威灵之牺牲，仅可取其传说之几分以为发育自我性灵之资养。

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不如信真理。

（1917年2月2日《甲寅》日刊）

青年与老人

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贵族与平民协力，资本家与工人协力，地主与佃户协力，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协力。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贵族与平民调和，资本家与工人调和，地主与佃户调和，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调和。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

青年贵能自立，尤贵能与老人协力；老人贵能自强，尤贵能与青年调和。盖社会之优美境地，必由青春与白发二种之质色性能缀配匀称，始能显著而呈鲜明壮丽之观；否则零落销沈，无复生气矣。故青年与老人之于社会，均为其构成之要素，缺一不可，而二者之间，尤宜竭尽其所长，相为助援，以助进社会之美利，文明之发展。若为青年，则当鼓舞其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沈滞之质积；若为老人，则当运用其稳静深沈之体验，为社会整理其善良之秩序。若夫互相轻侮与妄自菲薄者，如老人一闻青年之行动，辄骇为危险；青年一见老人之云为，辄嗤为腐败；此其无当，正与青年之以后进自贬，老人之颓衰自废者无殊。吾人均认为野蛮的，非文明的；专制的，非立宪的。若而青年，若而老人，皆在吾人排斥之列矣。

吾尝论之，群演之道，乃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无秩序则进步难期，无进步则秩序莫保。阐论斯旨最精者莫如弥尔，其言曰："凡于政治或社会之所企，无独关于秩序者，亦无独关于进步者，欲兴其一，二者当必

共起也。……进步之所需，与秩序之所需，其质相同，惟用于进步者视用于秩序者为量较多耳。安巩之所需，与进步之所需，其质亦无异，惟用于安巩者视用于进步者为量较少耳。安巩也，秩序也，进步也，盖同质而异量者也。……一群之中，老人与青年之调和，有其自然之域界。老人以名望地位之既获，举动每小心翼翼，敬慎将事；青年以欲获此名望与地位，则易涉于过激。政府有司调和于老人青年之间，苟得其宜，不妄以人为之力于天然适当之调和有所损益，则缓激适中，刚柔得体，政治上调和之志的达矣。"古里天森氏论世界观与政治的确信，谓皆基于二种之执性，即急进与保守是也。亦曰："有一义焉当牢记于心者，即此基于执性之二种世界观，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竞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也。"准二子之言，益知世界之进化，全为二种观念与确信所驭驰以行，正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二者缺一，进步必以废止。此等观念，判于人之性质者，即进步与保守；判于人之年令者，即青年与老人而已矣。

轻蔑老人为蛮僿社会之恶风。中央亚非利加之土人，将与他部落战争时，必先食其亲。盖恐战争一经开始，老人易为敌所捕虏，或遭虐遇，甚至虐杀；故为老人者，宁以为己子所食为福，而为之子者，亦以食其亲为孝，诚奇闻也。马来群岛之布尔聂伊附近某岛中人，遇达于一定年龄之老人，则穷追之，使登于亭亭大木之颠，部落中之青年，群集于其下，摇其木使之坠地而惨死焉。日本古代亦有姥捨山之语，相传为捨弃老人之地云。此以证老人于未开之群，实无生存之资格；文明进步之结果，老人之价值乃从之日增。现代文明诸国，对于老人之平生卓著劳绩于其社会国家者，且与以养老年金，以为晚年之慰安，而寓

报功崇德之意焉。其故一由于社会之进步，争存之道，渐由腕力而趋于知力也。蛮人社会上之地位由腕力之强弱而分优劣，文明人社会上之地位，则由知力之深浅而判崇卑。未开时代之老人，以于腕力为弱者，故遭虐待；开明时代之老人，以于知力为优者（西谚有云：白发即知识之意），故蒙敬礼。今日之社会，实厚与老人以与青年竞争之机会。此老人所当益自奋勉，以报答社会之恩宠者也。一由于老人之自强，体力益以健康，知力益以丰富也。老人之体力，虽视青年为衰，而依其不断之修养，亦可减其程度，而其知识与经验，乃足以其长于青年者补其体力之所短，故其为用于社会，亦殊无劣于青年。吾闻欧美老人之活动于社会者，为数之众，使人惊叹不置。今日之老人，实能多助社会文明之进步，此社会所当设立种种制度，以酬慰老人对于社会之勋劳者也。盖夫宇宙之间，森罗万象，莫不有其存在之意义，苟存在于兹世，即有应尽之职分，可为之事业。西谚有云："不劳者无食"（Man that does not work shall not eat）。老人岂得以老人之故，而有坐食之权利耶？吾爱二十四岁为英国内阁总理之比特，吾尤爱以八十四龄之老躯为爱尔兰问题奋战之格兰士顿；吾敬以二十六岁之青年驱百万雄师越亚尔白士天险征服义大利之拿破仑，吾尤敬以八十二岁之老翁驰驱于铁血光中卒以委骨伏尸于战场之罗巴慈。

吾国现代之老人，以其于青年时代既无相当之修养，一臻耄耋之年，辄皆呻吟展转于病榻之间，投足举手尚待青年之扶持，其知力之固陋，亦几不识今日之世界为汉唐何代。青年而欲与之协力，与之调和，殊为至难。吾人惟有怜之、惜之、以奉养之，此外无所希望于彼等。吾惟盼吾新中国之新青年速起而耸起双肩，负此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即由青年以迄耄老，一息尚存，勿怠其努力，勿荒

其修养，期于青年时代为一好青年，即老人时代为一好老人，勿令后之青年怜惜今之青年，亦如今之青年怜惜今之老人也。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号）

美与高

蔡孑民君归自巴黎，刻来京就北京大学校长任。前于政学会欢迎会中，演说欧洲战争所以持久之原因，归本于科学与美术之发达，其论“美”之与“高”，尤为精辟。中有一段曰：

……然则德法两国不信仰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又有道德心也？此即知之作用。大凡天地间之生一物，无一而不有“知”。夫婴儿无“知”也，而“知”哺乳；植物无“知”也，而“知”吸收养料；若矿物之有重量之能互相吸引，皆系“知”之作用。由一分推而极之，则为气德，所谓“美”之与“高”。所谓“美”者，即系美丽之谓；“高”者，即有非常之强力。假如描写新月之光，题诗以形容其景致，如日月如何之明，云如何之清，风又如何之静，夫如是始能传出真精神，而有无穷乐趣，并不知此外之尚有可忧可惧之事，此即美之作用。又如驶船于大海之风浪中，或如火山之崩裂，最为危险之事，然若形容于电影之中，或绘之于油画，亦有极为可观之处。而船中人之惊怖，火山崩裂焚烧房屋之情形，亦足露于图中，令人望之生怖，此即所谓“高”。至于喜悦飞鸟而思置之于笼中，遇美人而欲与之相亲，以及我国女戏园较男戏园能受一般人之欢迎之故，皆“美”之作用。然此种之“美”，确为一种欲美，而非真美也。

现今世界各国，如希腊民族即近于“美”，日耳曼民族多偏于“高”。故德国建筑拿破仑攻普鲁士之石像，颇极伟大，其所绘之图堂，如绘希腊、罗马当时之情形，皆偏于“高”之一方面。法国近于“美”。然而“美”与“高”、于道德有莫大之关系。凡性质富于“美”之民族，对于生死问题并不计较，必从容以行素所计画，非于临时所可勉强。至于性质富于“高”之民族，一经认定目的之后，即竭尽其智力以行之，置生死于弗顾。所以此次欧洲战争，德国军士死亡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无畏惧之心。是以攻比攻法，无往不克，以迄于今，粮缺饷乏，致每礼拜中每人只与半磅牛肉两枚鸡卵，仍坚持不易。以此精神，平时用之于实业，焉得而不发达？且此次战争发生之初，德国已将应先攻某国、次攻某国之计画，先事预定，故战争一发，毅力直行，并无畏难之色。法国人民，多近于“美”，其平时极为从容，不事战争预备，及至战争发生，比京被陷，法国仍不动声色，持其固有之性质。盖法国预算以为法国人民尽不逮德国之众，倘系背城一战之举，自必全灭之。即退一步言之，使两方军士死亡相当，德国元气亦已大伤，所以法国对于德国，必不绝对主战。假使德国军士死亡，军火毁弃，可得相当代价时，法国即将其地退让于德，然而法国又非绝对退让。如遇有机会可乘，仍竭力进攻。故德法两国，能相持两年之久者，皆科学与美术之功也……

是说也，颇足揭出德、法国民性特殊之采色。顾一入吾人之耳，而反躬自问，吾之民族性，于“美”于“高”，今日果何有者？余闻一国民族性之习成，其与以莫大之影

响者，有二大端，即“境遇”与“教育”是也。“境遇”属乎自然，“教育”基于人为。纵有其“境遇”而无“教育”焉，以涵育感化之，使其民族尽量以发挥其天秉之灵能，则其特性必将湮没而不彰，久且沦丧以尽矣。伊考吾先民之历史，文学美术，名作辈出。就建筑工程而论，如长城之连绵万里，至今犹为世所推称。此以知吾民秉彝之所畀赋者，不惟有“美”，抑且有“高”。盖以宅国于亚洲大陆之中，高山峻岭，长江大河，泱泱乎纵横于南北。以言山陵，则葱岭雪山峙于西域，行其间者经三旬而不能逾也。以言河流，则长江一泻，黄河奔流，浊浪滔滔，远望真有连天之概也。以言大泽，则洞庭云梦兰蕙芷莅，皆产于其间也。以言原漠，则燕、齐、鲁、豫平野漫漫，一望无际，越长城而外则又黄沙白草万里无人烟也。衡以地灵人杰之说，以如此灵淑之山川，雄浑之气象，栖息其间之民族，当必受自然之影响，将兼含“美”与“高”而并有之宜也。顾何以吾之民族，日即销沈于卑近暗昧之中，绝少崇宏高旷之想。回视古人，近观他族，稍有心性血气者，当无不愧恧无地焉。或谓大陆平原自然之“美”，远逊于岛屿近海之区，故其民性亦如之。是殊不然。美非一类，有秀丽之美，有壮伟之美，前者即所谓“美”，后者即所谓“高”也。彼岛屿近海之区，山水湖沼，花木园林，楼台村落，种种复杂之象，集于狭隘之域，故其美为常人所易见。乃若大陆之景物，散于殊方，道里辽远，今虽有汽车、轮舟、飞艇等器之发明，但其迅捷之度，去足以缩小自然使能益显其美之域尚远，故非得具绝大眼光、绝大手笔之文学家、美术家如李白其人者，未足以描写之。然而旷达之象，远迈之趣，固已于不识不知之间，神化于吾民族之性质之襟怀矣。是则吾民族特性，依自然感化之理考之，则南富于“美”，北富于“高”。今而湮没不

彰者，殆教育感化之力有未及，非江山之负吾人，实吾人之负此江山耳。嗟呼！吾其为“美”之民族乎？“高”之民族乎？抑为“美”而“高”之民族乎？此则今之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感化牖育之责，而个人之努力向上，益不容有所怠荒也矣！

（1917年4月1日《言治》季刊第1册）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

以何因缘，东西之文明之生活，各驰一端，适相反对？此其故固甚复杂，而其最要之点，则在东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据不同。东方之生计以农业为主，西方之生计以商业为主。惟其务农，故利于固定；惟其营商，故利于流通。惟其固定居处之久也，故血统日繁，而庞大之家族主义于以盛行；惟其流通转徙之远也，故族系日分，而简单之个人主义于以建立。又固定则女多于男，渐演而有一夫多妻之风；流转则男多于女，渐演而有尊重妇人之习。于是著于政治，一则趋于专制，一则倾于自由；显于社会，一则重乎阶级，一则贵乎平等。乃至饮食、居处、车马、衣服，无不具动静二种之采色。譬彼泉源浊，则万流皆浊，清则万流皆清。文明之于一切生活，亦犹是耳。

百年以还，西方之动的生活，挟其风驰云卷之势力，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而沈沈大陆之酣梦为之惊破。盖以劳遇逸，以动临静，无在不呈披靡之观，无往不有摧拉之势。于是始悟以逸待劳之失策，以静制动之非计，乃谋变法维新，不惜弃其从来之一切静的生活，取彼西洋之一切动的生活，去其从来之一切静的文明，迎彼西

洋之一切动的文明。顾宇宙间之质力，稍一凝静，惰性即从之而生。矧以数千万年惯习自然之静的生活，而欲革除之于一旦，此为必不可能之事，于是矛盾之生活现象，乃随处而皆是。即如吾人于日常生活所肩之负担，无论其为空间的、时间的、精神的、物质的，均有气竭声嘶日不暇给之势。吾尝求其故，而知西洋人之生活，以动为原则，以静为例外，故其应动的生活而能绰有余裕；吾人之生活，以静为原则，以动为例外，故其应动的生活而觉应接不暇。盖以动为原则者，于不知不识之中皆动，皆所以顺其生活者也。而以静为原则者，于不知不识之中皆静，皆所以反其生活者也。以今日动的文明之发达，动的生活之烦累，而吾人乃日在矛盾生活之中，以反其道而行之，乌在其有济乎？乌在其能胜乎？

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吾人又认定于静的文明之上，而欲创造一种动的生活，非依绝大之努力不足以有成。故甚希望吾沈毅有为坚忍不挠之青年，出而肩此钜任。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勿令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为白皙人种所专有；以应兹世变，当此潮流。若而青年，方为动的青年而非静的青年，方为活泼泼地之青年，而非奄奄待死之青年。

（1917年4月12日《甲寅》日刊）

真理之权威

余曩在本报著论，谓："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孔子、释迦、耶稣辈之于此真理，皆为近似得半，偏而弗全。故吾人今日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时贤多以为与目今之社会不相应，颇以为过。余友仲公，著《丁巳杂志》卷首发端，即陈此义曰："……今日学术社会之不发达，与思想界之窒塞、腐败所由致之使然，其责读者固应分之，即著者亦乌能辞其咎。浅演之群，其智不足与语高深，譬执今之人而劝之，宁崇拜真理，勿崇拜孔子，必将哗然群詈，訾为大逆。虽有至理，其不能以入焉，固也。然彼之不知崇拜真理固愚，而我曰汝勿崇拜孔子亦过。喻之理而挑之怒，将求我信，宜乎其难。……"似为针砭余言而发者也。余既拜赐良友药石之箴，复喜余崇拜真理之主张，实已得吾友之同情，又进而以其委婉曲谅之言，展转以渐入社会之心趣，而潜消其訑訑固拒之程，益信真理之权威，不以流俗社会之未喻，而有所损削。余此后持真理以发言立义之气用益壮矣。

言论之挟有真值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

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故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盖背乎逻辑之推论，苟为根于事实而设者，视合于逻辑之推论，其所据全属子虚者，厥失为少。盖事实确而推论妄者，有时而或可合，推论正而事实虚者，则永世而无其果。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

然而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即令各人竭其所知，以求真理之所在，而见仁见智，又人人殊，此其为道，不几一分而不可复合，一乱而不可复理，将言真理者愈众，求真理者愈多，而真理之为物愈以湮没而不彰乎？曰此不足以障真理之表显也。吾人各有其知力，即各有其知力所能达之境，达于其境而确将其所信以示之人，此即其人所见之真理也。言真理者之所谓真理，虽未必果为真理，即含有真理而亦未必全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认识其所谓真理者，即或违于真理，真理亦将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故言论家欲求见信于社会，必先求所以自信社会之人，能自信者众，则此自信之众，即足成其社会之中枢，而能轨范其群于进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堕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而葬于幽暗之域，乃为死亡之特征。然则吾人苟有所自信，初不必计及社会之于吾言，或遵为天经地义，抑斥为邪说淫辞。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

也。法律禁之，固所不许，社会压之，亦非得宜，使人人皆慑于社会心理之势力，而苟且姑息以与之因循敷衍，不惜枉其所信以暂屈于现状维持之下者，亦觉于真理之生涯未能彻底。平情论之，社会之进演、进步与秩序宜并重之。即高悬理想与俯就社会之言论，亦当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此立宪政治之所以重乎言论，而言论之所以重乎自由也。虽其立言之旨不容于当世，要其助益进步之功，亦与渐进之言论为用相等，或且过之。方其一群之中，犹自封于前人先圣之说，骤闻之或且訾为离经畔道之徒，而于其说乃扞格而不相入。究之自有此离经畔道之说，一于世人之思想，着其痕影，虽受之者期期以为不可，而由斯已得正负相反之意象，并列杂陈，以于不知不识之间，动其坚固不拔之单纯思能，彼纵始终对于斯说，深恶痛绝，而有较为和缓委曲之说，以向之陈说，斯其言之虽不得直接以承其信许者，而间接以收调剂之功，已为不少。即让步言之，此种骇世之言论，直接间接丝毫不为并世之人所用，亦不足以沮立言者之气，而遂默持其所信以终于暗昧之乡。此其事，古人有行之者矣！杨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之旨，固二子所信为真理者也，而孟轲之徒，则距之辟之，不遗余力，以无父无君罪之为禽兽。然自今日观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李卓吾氏究讨内典，得罪儒宗，举世儒生，尽情谤僇，几不侪于人类之伦，卒至囚其人，火其书，然而卓吾当日，固明知其书必遭焚毁之阨，而犹自榜其书曰“焚书”，将其所信表而出之，而今其书固犹流在人间也。苏格拉的当其身，尝以慢神不道之罪，而受国人之众推廷鞫，终以受戮矣；耶稣基督，亦以逆天之罪受时人之磔杀，流血于十字架上矣；近代俄之大儒托尔斯泰氏，亦尝见嫉于政府，破门于宗教矣。然而

今世之人，或则崇为哲家，或则尊为教主，或则称为旷代文豪，此以知言论之权威，即不行于当时，犹能存于异代；虽或见厄于社会，仍可自信于良知也。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虽为急进之言论，余并不排渐进之言论，盖言论而发于良知之所信，无论其为急进、为渐进，皆能引于进步之境，而达于真理之生涯也。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

（1917年4月17日《甲寅》日刊）

不自由之悲剧

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秀士博士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民主政治与舆论（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演，是日演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其说焉。博士谓在美国舆论之渊源有六：（一）学校，（二）报章，（三）教会，（四）剧场，（五）工人团体，（六）妇人俱乐部是也。由博士之言以观，演剧之影响于政俗者，不减于学校、报章、教会之势力，而在吾国今日之社会，或且迈之。吾而欲于政俗开一新面目，不可不于此类加之意也。

京中广德楼所演之新剧，颇与社会生活有所感触，故能引起听众之兴致，尤以悲剧为其擅长。惟其注入剧中之思想精神，则多蹈于陈腐固陋之辙，虽间亦有充足描写现代生活之处，而以其终结之的，不在促进锐新之理想，而在维持因袭之道德，不在助益进化之机能，而在保存守旧之势力。其结果不惟不能于政俗之革新有所奖诱，反以致其阻梗，此其咎固宜由编剧者任之，而演试之诸伶不与焉。

余自前月闻该剧场排成《自由宝鉴》一剧，欲观之而未果。朋辈中有往焉者，如梁君漱溟至为之洒泪，白君惺亚则大愤此剧精神注重之失当，而为自由呼冤，遂于《言治》季刊作《家族原论》，披露所怀。余于申明吾说之前，欲使阅者得悉此剧情实之梗概，并与以批评此剧之印象，

故借白君之言以起吾说焉。白君之言如左：

……京伶演剧有名为《自由宝鉴》者，意在为自由结婚者资其劝诫，情殊哀惨，悱恻动人，然其精神点睛之所在，真可谓完全代表旧式家庭之思想者也。剧系二少年男女，均学于沪，邂逅爱慕，冀共图姻好，事为其亲所知，重遭申詈，男女志甚决，抗不从命。坐是家庭情感益恶，遂抉禁范成之。婚既就，两家各以其子之不肖，辱门楣，绝之。少年夫妇不得已辍学浮海，北来京师，期发愤功名以自赎。顾少年不省世态，性憨穉，再为宵小匪人盗骗，罄资金，贫不克自存，陷匪人计，女遂坠身妓中，男落魄以恶疾亡，女既悲夫之死，尤恫自身之辱，仰药以殉。男女临终忏悔自语，溯膺古训，悼往此之误入新说，重喻以警来者。余鉴于斯剧，辄涕不可仰。顾继而追溯斯剧之始末，则又致憾戏剧之业至要且重，所以系群化思潮者至深。端人哲士，举无所问，而一任盲优市驵为之，剧业可无，通俗教育可废。彼少年男女，际兹蜕变之季，见理特真，于家虽为逾度，然心性固伉毅卓特人也。揆其所为，既死殉矣，末路固不应重为人道痛。编斯剧者，徒以新旧思想冲突之结果，重污自由之神圣，刍狗少年之人格，于事为荒，于理为谬，不可训一。自由结婚，亦复何害？第须计及婚姻以后之事，故自由结婚具备之条件，必为有能力独立生活者，少年修学时代，万不应以男女情缘自扰。兹乃智力能否问题，非婚姻是非问题。智力不周，误入孽境，婚姻之自由，纵可得达，由斯以往，皆忧患也。吾国情死，多在婚姻不自由之先，而西国情死，恒在自由婚姻以后，亦正以智力困于独立之故。兹二少年

夫妇，以愚意所案，决非失之于先，乃失之于后者，完全坐智力不完之问题而已。斯剧点睛之所，首当以斯义之精神，归入忏悔，引伸譬喻，用警愚俗，不斯之悟，魔上转魔，乃归宗于破坏家族伦义，致得此果，奖励依赖，助长家顽，不可训二。不可训而训，愚谓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勿以其剧为小道而忽之……

余于前晚，始得观览此剧，而深悟惺亚君之所论，颇得我心之所同。然余犹忆在剧场时，见其演至悲痛穹愁处，辄为之百感交集，觉眼中有千百副泪，同时皆欲夺眶而出，以哭此不得社会同情之少年，哭此神圣之恋爱，哭此横受摧制之自由，哭此诸多缺陷之社会也。夫家庭者，爱之泉源，而幸福之府藏也。而家庭之组织，则又基于婚姻，婚姻之结媾，以理言之，当为恋爱之结果。故无恋爱则婚姻不生，苟婚姻而非恋爱之结晶，徒拘牵于社会上之礼型而就，则有家庭与无家庭等，甚且为罪恶之窟，仇怨之府焉。盖恋爱为人生之真境，家庭而建筑于恋爱之上，纯实不杂者，则其人于兹世所遭之生活的风雨炎凉，皆能赖斯以避之安之。若其家庭之建筑，不基于男女两性之自觉的恋爱，而或为门阀所限，或为金钱所动，或误信于媒妁，或听命于父母，则其婚姻之关系，不成于人而成于物，不因于情感而因于势力，男女之当事者，非为其自身而嫁娶，乃为他人而嫁娶，非为其人生之幸福而缔缘，乃为其门阀之地位而缔缘，其间不生虚伪之罪恶，必兴悲怆之怨诟，将缘而适以为孽，爱而反以成仇矣。吾国今日社会之缺陷，在在均足以酿人生之不幸、不平、悲哀、烦闷，而激之甚者，或则怨气所召罹于罪恶，或则穹愁所驱流于堕落，其最要且甚者，尤为婚姻制度。夫婚姻既以恋爱为唯一之条件，则其自由之权，当一操之本人，乃为天

经地义不可或违。为父母者，只宜于家庭教育稍加注意，示以择人寻配之准则，俾勿轻陷于情魔爱网之中，于义已足，决不可更进一步，代居子女之地位而为之缔婚，以伤其神圣，夺其自由。在社会亦当顾时代思潮之大势，可以指导之而不可阻挠之，可以促其注意而不可吝其同情，期于青年男女，得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真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真爱既已蕴蓄于一门，仁风斯能广播乎全国，而后爱国、爱群、爱世、爱物之思，油然而生。此其所关，良非小故矣。今吾国之社会习惯，家族制度，皆未足以喻此。而以恋爱为轻，自由为妄，婚姻惟听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幸而如天之福，两小无猜，尚能相爱，家庭之内，犹不至惹起意外之悲剧，倘或性行相与径庭，则必至以洁白无邪之少年，沦陷于悲哀怨苦之中也。其或遇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对于自由解放之要求甚为强烈，对于恋爱神圣之自觉甚为彻底，则必抉其藩篱，以达所志，社会家庭又从而诟谤之，诋毁之，厌弃之，拒绝之，使之转徙天涯，风尘沦落。如此剧中所陈者，允为不自由之结果，允为社会不与同情之所致，家族专制之所迫，而与自由婚姻无关。今该剧之精神，乃归咎于自由，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而以演剧之功用言之，抑锐新之思潮而保旧腐之传说，实为社会所不取，亦为现代文明所不许。最可怜者，剧中写少年夫妇当绝离兹世之顷，自白忏悔之旨，违心以自责，谓为误信自由新语之所致，是其受社会尔许之厌弃，蒙家族尔许之冷遇，以致展转流离，穷愁潦倒，以殒厥身者。咎固在于不自由，彼宁不知之，知之而犹不敢明揭其故，反以咽几多不平之泪，忍几多不满之情，以降服于旧制度思想之前，然后知社会制度、家庭势力之积压，其力足以侵迫个人之自由者，固

若兹其重也。近者日本东京芳川伯爵之少夫人镰子，以限于门阀家族，代缔婚媾，遇人不淑，家庭中每有隐痛，以致坠于罪恶，而与汽车掌通焉，卒至相抱而情死，男女各有遗书一通，颇自忏其生前之所为，谓为有玷两家之门楣。此其自忏之旨，与剧中少年夫妇临危之所陈，事实虽不相类，心理则相同也。此事既发见于东京，彼邦学者，多有评论。浮田和民氏溯本穷原，归于婚姻不自由之结果，谓家族代子女缔婚之制为社会之缺陷。其他之以镰子夫人为时代之牺牲，而为文以吊之者，正复不乏其人。佐藤红绿氏至以二人之遗书，临终以告其戚友者，遭人焚毁，谓言论之压迫，乃亦延及于死人，颇愤慨日本社会对于个人之自由，侮辱剥夺之甚。余今于斯剧之精神，持与浮田、佐藤诸氏之说以相证，益知不自由之悲剧，其演于世界者，正复不止于吾国今日之社会。然使文学演剧，又从而推波助澜，则由剧场中悲剧之感化，因而造成社会上之悲剧者，必且环兴而无已，则是文学演剧之功，不及于社会，而适以助长罪恶，增加缺陷，是不独一剧编演得宜与否之问题，政俗之变易、思潮之革新系之矣。余故郑重以为此论，一以忠告广德楼剧主，对于斯剧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徒以艺员冰雪聪明之技能，为顽旧思想之奴隶，张偶像道德之权威，滋可惜也。以希望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学家、美术家，对于演剧，宜随时以文学的眼光，加以严正之批评，与以诚恳之贡献，有功社会当非浅鲜矣。

（1917 年 4 月 19 日《甲寅》日刊）

罪恶与忏悔

俄国大哲托尔斯泰诠释革命之意义，谓惟有忏悔一语足以当之。今吾国历更革命已经三度，而于忏悔之义犹未尽喻。似此造劫之人心，尚未知何日始能脱幽暗而向光明。瞻念前途，浩劫未已。廉耻扫地，滋可痛矣！

夫以一二人之罹于罪恶，吾人为其个人已不胜悼惜；而其个人之罪恶，同时又为吾人所与共处之社会现象，故其罪恶同时亦为社会之罪恶。斯则忏悔之责，固不仅为躬犯罪恶之人所独任，即呈布此罪恶之社会中之各个分子，亦当因之以痛加省察，深为忏悔。须知一个罪恶之构成，因果复杂，决非当事者之一人所能致。在个人固不可以此自脱，在吾人对于其个人亦不宜以此恕之。而在社会本身，则当以此自责；在吾人对于此社会，亦当为沈痛之警告也。

吾人试寻政治上、社会上之腐败，足与个人以易堕落于罪恶之暗示模仿者，其端甚多，不遑枚举，兹特择其要者言之。

一势位之足以保障罪恶也。今之膺显职握实权者，莫不以敛钱为事。鸦片可买也，公帑可盗也，民脂民膏可以任意剥敲也。凡夫坐拥重兵、列职疆吏者，对于其治下之财政，直视为一人之私，囊括席卷，莫可谁何！举国空虚，官僚厚富，其所剥民蠹国而得之财货，与其所居位置之级、所握权势之分，成一正比例。上行下效，全国风从，而大盗民贼，盈天下矣。

一法律失其权威也。中国承专制之余，本于法治之精神多所舛背。又以袁氏当国数年，蔑弃法纪，纵容奸宄。但为一姓之鹰犬，虽犯盗国殃民之罪，而亦为所优容，甚且在赏奖之列焉！法律不敢过问，即问之而亦无效。今袁氏虽殒，一般人民心理，对于法律之信畏，终不甚厚。一旦为罪恶所诱惑，遂忘却法律之权威，而悍然不顾以行之。

一奢侈之风盛行也。书生得志，一跃而置身荣显，辄如乞儿暴富，极欲穷奢。于是衣必金紫，食必甘旨，居必广宇，行必汽车，内以骄夸于妻妾，外以酬应乎亲朋，每月俸资有限，乌能供尔许之挥霍？迨其亏累日多，无以弥偿，而受贿中饱、鬻爵卖官之事，乃以迭见层出矣。推其原因，个人浪费，固为自取之咎，而社会风俗之奢靡，亦殊有及于个人之影响焉。

吾人今为此言，非以委过于社会，而以轻个人之责也。盖冀社会中之各个人人，对此罪恶之事实，皆当反躬自课，引以为戒。庶几积小己之忏悔而为大群之忏悔，而造成善良清洁之社会力，以贯注于一群之精神，使人人不得不弃旧恶，就新善，涤秽暗，复光明。此即儒家日新之德，耶教复活之义，佛门忏悔之功矣！

（1917年4月21日《甲寅》日刊）

简易生活之必要

斯武英有言曰："除道义外，一切事物皆嫌过多。"盖今世之生活，泰半倚于过度。衣食之享用过度也，戚友之酬应过度也，物质之消耗过度也，精神之劳役过度也。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鲜不气竭声嘶，疲于奔命。实力不足以达者，则觅捷径以达之，正轨不足以济者，则走曲线以济之。于是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以丛滋矣。

今欲有以救之，舍提倡简易之生活，别无善途。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消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质，克以应与已缘接而生之要求之负担，绰有余裕。而后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怍也。

今之人独不知此。一介书生，跻身荣显，遂而高车驷马，锦衣玉食，奢靡成风，夸耀井里。其家族戚友，亦皆群起而欲沾其余润，分其余荣，得之则赞颂不置，不得则怨声载道。夫以素无修养之人，骤然投身于恶浊政海之中，操持不坚，已足为浮名虚利所歆动，而沦溺于罪恶之陷阱，益以无情之社会，不义之戚族，横相要索，重其负担。禄俸之数，所得几何？若者用于必需之生活，若者用于适当之交际，已虞其不能敷衍，今又重以意外之烦累，扰以意外之要求。应用不足，贪念斯起，洁白廉正之精神

与虚荣夸张之欲望交战于胸中，而不获胜，遂为所囚缚以献于法网之中。其事可丑，其情亦可怜矣。推原其故，则皆不安于简易生活之一念有以误之也。试思吾人之躯干，块然五尺耳，一榻之域足以安息之而有余，安用此华楼广厦也？吾人之口腹，所求者瞬间一饱耳，箪食瓢饮足以飨应之而有余，安用此甘旨珍错也？吾人之家族，纯实之爱即足以慰安之，安用此无谓之虚荣也？吾人之戚友，淡泊之情即足以结纳之，安用此不当之酬赠也？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社会不情之依赖、不义之要求减少一分，即个人过度之负担、失当之应酬减少一分，亦即虚伪之过失、贪婪之罪恶减少一分。此种生活，即简易之生活也。此种社会，即简易生活之社会也。苟能变今日繁华之社会、奢靡之风俗而致之简易，则社会所生之罪恶，必不若今日之多且重。然则简易生活者，实罪恶社会之福音也。

余既于本报示忏悔之义，而忏悔之义，即当以实行简易生活为其第一步。吾人而欲自拔于罪恶也，尚其于此加之意焉。

（1917年4月22日《甲寅》日刊）

致李泰棻

革痴吾兄雅鉴：

国变日别后，仓黄出京，未及走辞为歉！南来栖迟沪渎，百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不至漂泊旅馆，暇惟以读书自遣，尚足告慰耳。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即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大抵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弱，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据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抵拒者，盖无闻焉矣。前不自禁，偶为《太平洋》作文一首，既而思之，又自深悔，以今日人心之沈溺于利欲，逆耳之言，庸何能入？且以吾侪年少性率，修养未善，诚信中孚，未足格物，有所论列，徒召恶感，不足诲人也，诚不如缄默自守，徐俟劫尽之期，听其自忏之为愈也。阅《太平洋》知阁下与剑农之争，据理均有独到，所有稍涉感情者，惟有"苟非……如劳乃宣"一语，但此乃剑农行文之际，偶一失检，断非有意隐风吾兄，剑农敦厚朴实，醇乎儒者，至堪钦佩，幸勿以此区区有所介意也。至于书契文诠其义，本从时代事物之迁移，而日有变革，即如 government 一语，古义原诠为治人，今则有 Self-government 之用，正与原诠相背。又如 Democracy，在希腊时代，Aristotle 则用以诠暴民政治，而以 Polity 诠善良之民主政治，同时 Polybros 氏又以 Democracy 当亚氏之 Polity，是知语言之意义，既因时代而有变易，即于同一时代之同一语言，又因用之之人而诠释各异。且有适居其

反者焉。吾人用字释辞，正不必顾虑及兹也。以弟愚见，共和一语，在吾国今日既屡遭误解，民主一语，在常俗用之，亦与共和相混，仿佛皆专指国体之形式也者。为正名之计，莫如以共和一语，专被之于不立君之国体（此处用“民主”亦可），而别以民治主义，译 Democracy 以示吾民非仅以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国体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义之实现与发达，俾其他贤人政治有限民主诸说，皆不得托共和之名，而蒙马虎皮以乱国而惑世，此则今日正名之事切要而不可缓者矣。质之高明，以为何如？海上无何机会，行严先生已赴日本，尊著与商馆交涉事，或可磋商，容日致函行严，如何再复，匆匆不尽欲白。

弟

钊顿首

（1917 年 7 月）

“今”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

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缥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

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蕲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

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新的！旧的！

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

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一粒微尘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质。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就是此都会里最美的市场中所陈设的；一个人的指爪上的一粒炭灰，就是由此都会里最大机械场的烟突中所飞落的。既同在一个生活之中，刹刹尘尘都含有全体的质性，都着有全体的颜色。

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的

响，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更夫是旧的，巡警是新的。更用更夫，何用巡警？既用巡警，何用更夫？

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甚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

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

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其余类此者尚多。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为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不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的过处了。

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

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念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很觉不安。推一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反说回来，也是一样。新的嫌旧的妨阻，旧的嫌新的危险。照这样层级论，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叠叠的矛盾。人生的径路，若是为重重叠叠的矛盾现象所塞，怎能急起直追，逐宇宙的文化前进呢？仔细想来，全是我们创造的能力缺乏的原故。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路，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却这些笨拙迂腐的器具，来坐迅速捷便的电车，马路上自然绰有余裕，不像那样拥挤了。即于寥寥的汽车、马车、自转车等依旧通行，因为与电车纵的距离不甚相远，横的距离又不像从前那样逼近，也就都有容头过身的道路了，也就没有互相嫌恶的感情了，也就没有那样容易冲突的机会了。

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驼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调和誊言

宇宙间有二种相反之质力焉，一切自然，无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

有生之伦，如吾人体，一切重要官能，皆有二种相反之神经，交相为用，以为控制。例如心脏，有加速之神经纤维以促之，同时又有抑止之神经纤维以迟之，交作互制，应体质之需要，以轨范其活动。又如两肱之筋肉，一张一弛，交相动作，以成其用。惟股亦然，全身筋肉，罔不若是。有一种筋肉导之向左，又有一种筋肉导之向右，以牵制之而保持其平衡。

生理如是，心理亦然。有苦即有乐，有本分即有欲望。

无生之界，大至星球天体，小至一微尘粒，皆赖引拒二力，交相为用，以保其存在之位置。

人类社会，繁矣赜矣。挈其纲领，亦有二种倾向，相反而实相成，以为演进之原。譬如马之两缰，部勒人群，使轨于进化之途。以年龄言，则有青年与老人；以精神言，则有进步与保守。他如思想也，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则有个人主义，有传袭主义即有实验主义，有惰性即有强力。

社会之演进，历史之成立，人间永远生活之流转无极，皆是二力鼓荡之结果。吾人目有所见，皆是二力交错之现象；耳有所闻，皆是二力交错之声音。

欲使社会为有秩序之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

之机会。即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勿使徒为时间的交互动作。欧洲中世黑暗时代，保守主义与传袭主义之势力过重，其结果则沦于腐败。法兰西革命时代，则进步主义，趋于极端，不能制止，其结果又归于爆发。是皆不能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之结果，以致反动相寻，不能并立于空间，则求代兴于时间。至是乃不免猛烈之震动，而平流以进之秩序，遂无可望。国人对于异派势力，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例如倡内阁制时，不闻总统制之声；而倡总统制时，则又不闻内阁制之声矣。谋统一之日，不许有人主张联邦；而建联邦之日，又不许持统一之论矣。

吾人为避二力之迭兴，主张二力之对立，为免时间的取代，主张空间的调和。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3册）

新纪元

新纪元来！新纪元来！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我们今日欢祝这新纪元，不是像那小儿女们喜欢过年，喜欢那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贴，恭喜的套话照旧说，新衣新裳照旧穿戴。那样陈陈相因的生活，就过了百千万亿年，也是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这样的新纪元，才有祝贺的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

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的，人口的增加没有限制，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一定的大小，若不能自节生殖，不是酿成疾疫，就是惹起战争。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所以强大的国家都要靠着兵力，扩张领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执着人种的偏见，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学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以足用了。从前的战争靠着单纯腕力，所以皇家、贵族、军阀、地主、资本家，可以拿他们的不正势力，驱使几个好身手的武士，作他们的瓜牙，造出一个特别阶级，压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没法子可以制裁他们，只有受他们的蹂躏。从今以后，因为现代的战争要靠着工业知识，所以那些皇家贵族等等，一旦争斗起来，非仰赖劳工阶级不可。从前欺凌他们侮辱他们，现在都来谄媚他们。夺去他们的工具，把武器授与他们。他们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劳工阶级有了自卫的方法，那些少数掠夺劳工剩余的强盗，都该匿迹销声了。从前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下，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本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

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从前尚有几个皇帝、军阀残存在世界上，偷着作鬼祟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们作鬼的契约，常备兵是他们作鬼的保障。他们总是戴着一副鬼脸，你猜我忌的阴谋怎么吞并、虐待那些小的民族。虽然也曾组织过什么平和会议，什么仲裁裁判，但在那里边，仍旧去规定些杀人灭国的事情。从今以后，人心渐渐觉醒。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美国威总统，也主张国际大同盟。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象，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

一九一九年元旦

（1919 年 1 月 5 日《每周评论》第 3 号）

北京的“华严”

北京有个净业湖，是梁巨川氏自杀的地方。不几天又有一位吴梓箴，也在那里自杀。我听得这般事情，就联想起那日本日光山上的“华严”泷。明治三十六年，有一位京都帝国大学生叫藤村操的，因为人生不可解，起了哲学上的怀疑，跑到瀑边，在树上题了“岸头之感”几个字，就投入那瀑的冷净的怀中了。从此日本青年，因为这件事的暗示模仿，你投入浅间山的喷火口，他死在富士山巅，他们的理由，都是厌世悲观，那投入“华严”的，更是不计其数了。把个“华严”做成一个唯一的死所，人都叫他为“死之瀑”。这净业湖中的自杀者，若是联续不绝，净业湖也要成了“死之湖”，就是北京的“华严”了。我们把两处的自杀者比较起来，有的是青年，有的是老人，有的是为人生问题而死的，有的是为古人传说而死的。其间虽大不同，我说这种人对于他自己的生命，都比那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

（1919 年 1 月 19 日《每周评论》第 5 号）

新自杀季节

据社会统计学家说，每年五、六、七、八月是自杀季节。自杀的现象，多发生在这四个月中。近来生活难的结果，年关也成了一种自杀季节。北京这个地方，到了冬天，那些因不耐冻饿自杀的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碰着一位新闻记者先生偶然大发慈悲，登出一二，大家也是不加批评、不加注意的。有人说自杀是壮烈的行为，他们又有什么壮烈？有人说自杀是罪恶的行为，他们又有什么罪恶？以我看来，社会上发生了自杀的现象，总是社会制度有些缺陷。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为免自己或他人的迷惑麻烦，有处决自己生命的自由。

（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号）

青年与农村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俄国今日的情形，纵然纷乱到什么地步，他们这回革命，总算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总算是为新世纪开一新纪元。我们要晓得，这种新机的酝酿，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也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他们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着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时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一经政府侦知他们，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罗网。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就是俄罗斯的农村。

我们中国今日的情况，虽然与当年的俄罗斯大不相同，可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

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

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里边，有的是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的是厚拥田畴的地主，有的是专作农工的佃户，有的是专待雇佣的工人。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来，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地主总是苛待佃户与工人，佃户与工人不但不知互助、没有同情，有时也作自己同行的奸细，去结那地主的欢心。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就是在吹风落雨、灯前月下的时候，有点闲暇，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从前的村落都有个寺院庙堂，他们也不会利用这些东西，作他们大家聚合的会堂，白白的看着他颓零在荒烟蔓草的里面。村落中也有比较开明一点，大家立个青苗会，在庙堂中觅个会所，也不过听那些会头们、绅董们一手处理，有了费用，就向老百姓们要；用去以后，全没什么报销。世界潮流已竟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在那里，还只是向人家要什么真主，还只是听官绅们宰割蹂躏，作人家的良民，你说可怜不可怜呢？推究这个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

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

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的结果，扩张选举的声音逐渐增高起来。战后各立宪国，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从前更加充实的地步，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我们中国将来的选举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趋势，无论所行的是限制选举，抑是普通选举，那选民的生活本据，大多数都在农村。若想扩清选举，使这种新制度不作高等流氓们藏污纳垢的巢穴，发财作官的捷径，非开发农村不可，非使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不可。入民国，名义上也算行过几次选举，可是弄得污七八糟，几乎把这个制度糟蹋的没有一点本来面目了。根本的原因，就在农村中没有真是农民伴侣的青年，告知他们那选举的道理，备他们选出的人物。那些运动选举的人都是来自都市，不是在都市中当过几天流氓，就是在都市中作过几天强盗，练习了许多的诡诈手段，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却来骗他乡里的父老。这些人都靠着选举入了议院，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那些老百姓的生活上的疾苦，那能改善？生活上的幸福，那能获享？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只要农村里有了现代青年的足迹，作现代文明的导线，那些农民们自然不会放弃他们的选举权，不会滥用他们的选举权，不会受那都市中流氓的欺、地方上绅董的骗，每人投的清清楚楚的一票，必能集中到一个勤苦工作、满腹和劳工阶级表同情的人身上。他来到议院，才能替老百姓说话，也就是老百姓说话，他的话才能有无限的权威；万一有种非礼的压迫无端相加，老百姓才能作他们的后援。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有

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一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

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只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你们在都市上天天向那虚伪凉薄的社会求点恩惠，万一那点恩惠天幸到手，究竟是幸福，还是苦痛？尚是一个疑问。曾何如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

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1919年2月20—23日《晨报》）

死　　动

日本的浪人会，专去逆着世界大势作那拥护国体的运动。彼邦酷评家说他们是“死动”，不是活动。我想这种“死动”，几乎遍中国都是。不是拜倒在偶像之前鬼混，就是倒行逆施往死路走。人家的社会，还有大部分“人的活动”，几个顽冥的“死动”，不至永远成了黑暗的鬼世界。像我们的社会，“人的活动”，很是稀少。起初还是“死动”，后来恐怕就剩下了一个“死”，连“动”也不会“动”了。

（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号）

光明与黑暗

听说北京有位美术家，每日早晨，登城眺望，到了晌午以后，就闭户不出了。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早晨看见的，不是担菜进城的劳动者，便是携书入校的小学生。就是那推粪的工人，也有一种清白的趣味，可以掩住那粪溺的污秽。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他们的生活，都是人的生活。他们大概都是生产者，都能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到了午间，那些不生产只消费的恶魔们，强盗们，一个个都出现了。你驾着呜呜的汽车，他带着凶赳赳的侍卫，就把人世界变成鬼世界了。这也是光明与黑暗两界的区分。

（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号）

新旧思潮之激战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我们且看今日的日本，新的方面，有“黎明会”一班人士种种的结合，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攻击之列。他们天天宣传，天天游说，这儿一个演说会，那儿一个讨论会，这里立一个杂志，那里创一所日刊。公共结合以外，他们还有自己本着他专究的学理、择选的问题，今天一个小册子，明天一个小册子，散布传播，飞如蝴蝶。他们虽然定了一个公同进行的方向，都向着黎明的曙光去走，可是各人取那条路，还是各人的自由，不必从同，且不能从同，不可从同。那反对一方面，也是堂堂鼓、正正旗来相对应。“桐花会”、“黑龙会”这一班人的思想虽旧，他们也知道走正路，也知道本着自己所信的道理、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正当势力，和新的对抗。就是那个“浪

人会”的行动，在日本社会已为舆论所不直，他们对于新派的激战，也不过开一个演说会，请反对党的魁领莅会辩论而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新的旧的，都是死气沉沉。偶有一二稍稍激昂的议论、稍稍新颖的道理，因为靡有旗鼓相当的对立，也是单调靡有精采，比人家那如火如荼的新潮，那风起潮涌的新人运动，尚不知相差几千万里？那些旧人见了，尚且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他们总不会堂皇正大的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

我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那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

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那里去了！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要有一种觉悟。

（1919 年 3 月 9 日《每周评论》第 12 号）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以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够达到，也是偶然的机会。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究竟没有很大的价值。

我今就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稍有陈说，望我亲爱的青年垂听！

第一，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近来常听人说："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我想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譬如天时，一年有一个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木枯黄，气象凋落，死寂，冷静，都是他的特色。可是那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不是就从这个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么？一天有一个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种的尘嚣嘈杂，都有个一时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是从这寂寞的暗夜发见出来的么？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这样讲来，这寂

寞日子，实在是有滋味、有趣意的日子，不是忍苦受罪的日子，我们实在乐得过，不是耐得过。况且耐得过的日子，必不长久。一个人若对于一种日子总觉得是耐得过，他的心中，必是认这寂寞日子，是一种苦境，是一种烦恼，那就很容易把他抛弃，去寻快乐日子过。因为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勉强矜持的心，是靠不住的。譬如孀妇不再嫁，若是本着他自由的意思，那便是他的乐境，那种寂寞日子，他必乐得过到底。若是全因为受传说偶像的拘束，风俗名教的迫胁，才不去嫁，那真是人间莫大的苦境，那种寂寞日子，他虽天天耐得过，天天总有耐不得跟着。乐得过的是一种趣味，耐得过的是一种矜持。青年呵！我们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可带着丝毫勉强矜持的意思，必须知道那里有一种真趣味，一种真光明，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

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本来苦乐两境，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那个苦？那个乐？全靠各人的主观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标准的。我从前曾发过一种谬想，以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乐，受苦是人生本分，我们青年应该练忍苦的本领。后来觉得大错。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背着自然去做，不是勉强，就是虚伪。这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但是，求乐虽是人性的自然，苦境总缘着这乐境发生，总来缠绕，这又当怎样摆脱呢？关于此点，我却有一个新见解，可是妥当与否，我自己还未敢自信。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

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这一点一般人却是多不注意。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而在无事的时间，一切不正当的欲望，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疲敝陈惰的血分，周满于身心，一切悲苦烦恼，相因而至，于是要想个消遣的法子。这消遣的法子，除去劳动，便靡有正当的法则。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堕落在这里的人，都是不知道尊重劳动，不知道劳动中有无限的快乐，所以才误入迷途了。青年呵！你们要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作尊劳主义。这样讲来，社会上的人，若都本着这尊劳主义去达他们人生的目的，世间不就靡有什么苦痛了吗？你为何又说要我们青年在苦痛方面活动呢？此问甚是。但是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少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大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

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

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人生的努力，总向光明的方面走，这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但是世间果然到了光明的机运，无一处不是光明？我们在这光明中享尽人生之乐，岂不是一大幸事？无如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去援救他们，却自找一点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乐，偷去清洁，那种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种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旧时代的青年讲修养的，犹且有“先忧后乐”的话，新时代的青年，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地步，能算尽了责任的人么？俄国某诗人训告他们青年说：“毁了你的巢居，离开你的父母，你要独立自营，保信你心的清白与自然，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你到那里去活动。”这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宝训，真是现代青年的警钟。我们睁开眼看！那些残杀同胞的兵士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残暴的事情么？杀人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杀人野兽么？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丑贱的事情么？卖笑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迫他们去作辱身的贱业么？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作罪恶的事么？他们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恶么？他们所受的刑

罚，果真适当他们的罪恶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陷于罪恶或是受了冤枉么？再看巷里街头老幼男女的乞丐们，冻馁的战抖在一堆，一种求爷叫奶的声音，最是可怜，一种秽垢惰丧的神气，最是伤心，他们果真愿作这可耻的态度丝毫不觉羞耻么？他们堕落到这个样子，果真都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废材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不得不如此么？由此类推，社会上一切陷于罪恶、堕落、秽污、黑暗的人，都不必全是他们本身的罪过。谁都是爹娘生的，谁都有不灭的人性，我们不可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远远的躲避他们。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潜藏着许多恶魔毒菌，但是防疫的医生，虽有被传染的危险，也是不能不在恶疫中奋斗。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1919 年 3 月 14—16 日《晨报》）

现在与将来

近来常听人说："中国人所以堕落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他们只有'现在主义'，靡有'将来观念'"。因此，就拿"时间只有过去与将来，绝靡有现在"的话，来劝告他们，也是希望他们抛了"现在主义"，存点"将来观念"的意思。但是我对于这话，却有几个疑问：（一）堕落的生活中的现在，在人生观果然算得现在么？（二）就他们的生活而论，果然靡有他们的将来观念么？（三）时间果然靡有现在么？我要就这几点说几句话。

现今一般堕落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东西。所以从人生上讲，他们不但靡有将来，并且靡有现在。他们的现在，不是他们的人生，是他们发舒兽欲的机会。他们有了工夫，就去嫖，去赌，去拨弄是非，奔走权要，想出神法鬼法，去弄几个丧良心的金钱，拿来满足他们的兽欲。像这样的活动，在宇宙自然的大生命中，在人类全体的大生命中，在他自己一个人的全生命中，有丝毫算得是人生的现在么？依我看来，这种的生活，简直是把人生的活动，完全灭尽。他们的知能躯体，全听兽欲的冲动的支配。若说他们有现在，也是兽欲的现在，不是人生的现在。这种的生活，不配叫什么主义。

这种堕落的生活，固然在真正人生上，不但靡有将来，并靡有现在；而在他们的兽欲生活中，却是不但有他们的现在，并且有他们的将来。试看那强盗军阀，那个不是忙着搜括地皮，扣侵军饷，拿到他家，盖上些比城墙还

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万世之业？那卖国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至少也可以做下半世的过活？就是那最时髦的政客，成日价营营苟苟，忙个不了，今天靠着某军阀，明天靠着某元老，也是总想作回大官，发回大财，又那个不是为他将来的物质生活作预备呢？这样看来，他们虽然靡有真正人生的将来，他们却有他们那种生活的将来；他们固然有他们那种生活的现在，却靡有真正人生的现在。

至于时间是否有现在？是哲学上一大问题。有人说只有过去与未来，靡有现在；有人说过去与未来都是现在。如今我们且不去判断他们的是非，但是我却确信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在、大生命中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一线相贯，不可分析，不可断灭。我们不能画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我们要想完成这自然的大生命，应该先实现自己的人生。我们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应该把我们生命中过去与将来间的关系、时间全用在人生方面的活动，不用在兽欲方面的冲动。

（1919 年 3 月 28 日《晨报》）

真正的解放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1919 年 7 月 13 日《每周评论》第 30 号）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民国建了八年了，《新生活》出了八期了。用《新生活》的第八期祝民国八年的国庆，两数相合，这样奇巧，足见“新生活”的运命，便是民国的运命，民国的纪元，便是“新生活”的纪元。

民国的国庆日，也叫双十节。凑巧《新生活》的封面上印着一个连环式的双十字。我们就拿这个连环式的双十字，祝我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年年岁岁，循环递嬗，永世相承，以至于无穷。

在《新生活》连环式的双十字上，有四大精神，就是博爱、自由、平等、牺牲。这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建立民国的基础。

我们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们相信我能爱人，人必爱我，故爱人即所以爱我。

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国，爱世界的人类，都是这一个“爱”。爱力愈大，所爱愈博。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断断不可把这个“爱”字关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总该知道爱世界人类的全体比爱一部分人更要紧，总该知道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

人间共同生活的关系既是以爱为基础，那么人类相互之间，自然要各尊重各的个性。各自的个性，不受外界的侵害、束缚、压制、剥夺，便是自由。真实的自由，都是建立在“爱”字上的。

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在“爱”的水平线上，人人都立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悬异的关系。

这样说来，自由、平等的生活，都是以爱为基础的生活。

实行这个“爱”字，必须有牺牲的精神。爱人道，便该为人道牺牲。爱真理，便该为真理牺牲。爱自由，便该为自由牺牲。爱平等，便该为平等牺牲。爱共和，便该为共和牺牲。爱的方法便是牺牲，牺牲的精神便是爱。

有一种美景物、美境域在我们眼前，我们不可把他拿来作我们的牺牲。因为牺牲了他，决不是爱了他。我们当真爱他，应该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他的美善，才真能为我们所享受，所获得。爱的法则，即是牺牲的法则。

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民国，究竟从何处来的？是由先烈们博爱的精神创造来的，是用先烈们为自由平等而牺牲的血培植成的。我们纪念双十节，应该纪念《新生活》上的连环双十字。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是不断的创造。《新生活》上的双十字，是无尽的循环。愿民国的双十节和这双十字一样循环无尽！愿今年双十节看《新生活》的人，都永远抱着《新生活》封面连环双十字上的四大精神：博爱、自由、平等、牺牲——去不断的创造新生活！

（1919年10月12日《新生活》第8期）

时代的落伍者

时代是最惨酷的东西，时代的落伍者是最可怜的人。时代的进行像电光一样的快，人间的思想总是在过去和现在上恋着。这个中间，就发生了许多的落伍者。他们的生活与时代不相应，就发生了许多的怨恨。怨恨时代，怨恨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学、艺术及至人身。唉！他们实在是悲哀、苦痛、可怜呵！

（1919 年 10 月 26 日《新生活》第 10 期）

应考的遗传性

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是甚么残酷的制度，把我的民族性弄成这样的不自然！

（1919年10月26日《新生活》第10期）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惹得主张调和的人天天忙，天天担忧，天天夹在新旧之间，受些闲气，结果还是两不讨好。我劝主张调和的人歇歇罢！那进行不息的时代，才有调和的真本领呢！戊戌前后的康有为，人都嫌他太新，可是时代变了，能把他弄旧。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请他走开。

主张调和的人，自问若没有这么大的本领，请把这件功业让给时代罢！

（1919 年 11 月 2 日《新生活》第 11 期）

人与禽兽

人类的妄自尊大，真是讨厌，动不动拿禽兽来形容他的高超。这种非科学的态度、口吻，实在不对。以我所知，禽兽里比人类德性优良的很多，人类比不上这些优良禽兽的更多。现在我们作伪的黑幕，已竟揭穿了。不要再拿那些良善的生物，形容我们自己的优越，欺骗同类了！

（1919 年 11 月 2 日《新生活》第 11 期）

时间浪费者

中国人都是时间浪费者，都是生命牺牲者。若叫中国人牺牲他的生命，他是万万不肯的。可是他天天都在牺牲，终身都在牺牲，却一点也不爱惜。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我们每日生活的时间，平均总是自己浪费了一半，别人为我浪费了一半。在我自己浪费时间的时候，还要浪费些别人的时间。这样核算起来，全社会浪费的时间该有多少？全民族的生命牺牲的该有多少？唉！中国人的生命，真贱啊！

(1919年11月2日《新生活》第11期)

死

胆小的人总是怕死，卑劣无聊的人总是盼反对他的人死，咒反对他的人死，阴贼阴狠的人总是想法把反对他的人置于死地。死是什么东西？死是这样可怕的么？死是这样有用的么？罗素说过："你可以杀一个艺术家或思想家，但你不能得他的艺术或思想。你可以因为一个人爱他的同类把他置于死地，但你不能由这样的行为得到造成他的愉快的爱。"死不是那样可怕的啊！置人于死，于你不是那样有用啊！造谣咒人死，更是卑劣无聊之极啊！

（1919年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牺　牲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19 年 11 月 9 日《新生活》第 12 期）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自林德扬君自杀，一时论坛对此问题颇有所讨论。因此，我也把我近来对于青年自杀的意见写出来和大家商榷。

我于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有几个要点要预先声明。

第一，自杀的情形因各个事件而有不同，我们不能够泛就自杀而下笼统的判断。我们应该分别自杀的种类，个别的论断他的是非。

第二，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第三，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于不直接妨害社会，迷惑他人的范围内，有自己处决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权。

第四，我们只能批评自杀者的人生观，说他是或非，指导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进路的趋向，不能责备自杀者的个人，说他道德不道德，罪恶不罪恶；惟因自杀直接予人以迷惑，予社会以妨害的，又当别论。

把这四点认定，才可论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本来自杀是人类生活特有的现象，人类以外的动物，不发生自杀的现象，因为自杀是智慧的结果。野蛮人多有不了解自杀是怎样一回事，牙岗人和安德曼岛的土人，看见白人有在他们部落内自杀的，他们一定想是被别人杀的，嘲着要大索犯人。你若向中部澳洲的土人说自杀的事，他一定说你是说笑话，万不相信。可是这也有例外，那康甲卡人和赫士人又有胡乱自杀的倾向：媳妇因为婆母

不吃他做的饭，也自杀；老年人因为身子衰息，也自杀；小姑娘脸上一发赤就得严加监视，直到伊全然忘记了伊害羞的事而后已。加冷人晚间饮酒的时候，夫妻有三言两语的不合，明朝夫或妻必有一人在树枝上自缢。这或者是因为这些人种生理上、心理上，或他们所住的地方地理上、气候上有特别的原因。大体看来，智慧多的人容易自杀，自杀的现象多盛行于教育阶级、智识阶级中。那有关于自杀的名著的意大利人摩塞里，曾于意国发见自杀最多者为从事科学文学的人，百万人中有六百十四人，其次就是从事国防的四百零四人，从事教育的三百五十五人，从事行政的三百二十四人，商人二百七十七人，司法官二百十八人，医师二百零一人，从事工业的八十人，从事原料制造的二十五人。法国亦然，奴婢八十三人，商人及运送业者九十八人，原料制造者百十一人，工业家百五十九人，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的五百十人。其余统计家所得的结果，虽也有与此不同的，但自杀在生活状态简单者最少，与生活状态复杂的程度递加，几乎是一个普通的原则。

文明进步的结果，生活状态愈趋于复杂。人类的生活，去原始的自然生活、劳动生活日远，而偏于耗用脑智精神，因而过劳；又因生活上的欲望增高，内容扩大，往往招来失望和灾难；所以自杀的激增是十九世纪内各国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说自杀是十九世纪的时代病，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是“自杀时代”！

意大利人摩塞里著有《自杀论》。他说：十九世纪间，欧洲各国的泰半，不但自杀的数都是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略同。法国由千八百二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五十年间，一年自杀的平均数，由人口百万中五十四人升到百五十四人。普国由千八百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七年，由七十人二分升到百七十三人五分。日尔曼和奥大利增加更甚。

惟有英国和挪威不见增加：英国每百万人中平均在六十五人左右，挪威由八十人降到七十人，这是一个例外。

日本近年自杀者的增加，尤为可惊。据他们警视厅的调查，就在他所管的地方，东京市十五区与六郡八岛的自杀者，明治四十三年一一一二人，四十四年一一五七人；大正元年一二六八人，二年一三一二人，三年一三八九人；——合计自杀既遂者和未遂者——全国合计起来，明治四十四年一万零七百五十三人，大正元年一万一千百二十八人。

中国全国的自杀统计，虽然未必精确，然亦可以看出增加的趋势。各省的统计表，我还未搜集完全，暂且不论。但据内务部的《内务统计》京师人口之部和京师警察厅的《京师警务一览图表》里面所载北京内外城自杀的统计：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计八十人。光绪三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计九十人。宣统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计九十三人。宣统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计六十一人。宣统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计九十人。民国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计八十六人。民国二年，男女合计八十三人。民国三年，五十四人。民国四年，男六十八，女四十二，合计一百一十人。民国五年，自杀已遂者，男五十五，女三十，合计八十五人；未遂者，男四十，女五十七，合计九十七人。民国六年，自杀已遂者，男九十三，女三十三，合计一百二十六人；未遂者，男四十六，女三十八，合计八十四人。亦足以证明自杀者增加的趋势。

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

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近来生活困难的结果，年关也成了生活上的生死关头，也成了一种“自杀季节”，不过这是由人事的关系发生的，不是由自然的影响发生的。这“自杀时代”诱引人逼迫人上自杀的途径去，也和“自杀季节”的诱引与逼迫一样。因为十九世纪末年的世界，已经充满了颓废的气氛，物质文明渐渐走入死境，所以牵着人也到死路上去。各人生活上塞满了烦闷，苦恼，疲倦，颓废，失望，怀疑。青年的神经锐敏，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有许多的青年，作了“自杀时代”的牺牲。

自杀的原因不一，所以自杀者的类别也不同：有因犯了罪恶愧悔而自杀的，有因穷饿所迫而自杀的，有因失恋而自杀的，有因殉情而自杀的，有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有因考试落第而自杀的，有因社会政治不良而自杀的，有因职务上不能如意执行而自杀的，有因神经失常而自杀的，有因避病苦而自杀的，有因哲学上对于人生起了烦闷怀疑而自杀的，有因坚持自己的主义信仰保全自己的人格名誉而自杀的，有因宗教上的迷信而自杀的，有因外界自然的诱引，或受他人的暗示（模仿）而偶然自杀的。这些样的自杀，个别的原因虽然不同，而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在是他们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社会制度若是没有经济上的不平，不会发生因穷饿而自杀的人。社会制度若是不迫人犯罪，不会发生因愧悔而自杀的人。若是婚姻制度没有弊病，不会发生因失恋殉情而自杀的人。若是家庭制度有解放个性的精神，不会发生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人。若是学校制度、教育制度没有缺陷，不会发生考试落第、或因课业过劳患神经病而自杀的青年。若是政治制度明良，不会有因愤世，或因不能自由执行职务而自杀的人。就是病苦的人，也与日常生活的安与不安，很有关

系。就是那些因哲学上对于人生起了怀疑与夫那些为主义、信仰、人格、名誉、甘愿牺牲而自杀的人，也多发生在黑暗社会里，或黑暗势力的下面。千八百五十年顷的俄罗斯专制的黑暗势力，把人民的生活趣味，完全遮断。社会一切现象，都呈出死气。那时的文学家，只有讴歌“死”、描写“死”的庄严、“死”的美善。那时的青年，只有“死”、只有自杀是他们的天国。就有不自杀的，也没有什么生趣了，这就是一个显例。至于模仿的自杀，也多发生于自杀流行的社会。为自然诱引的自杀，也多发生于怀有隐痛的人。看那日本的青年，自从叫藤村操的一位青年，因哲学上的怀疑投入华严泷以后，投华严泷自杀而死的年以数十计。警察设种种方法防阻自杀的人，终不奏效。这一个景致绝美的瀑，几乎成了“死之瀑”，成了日本人的唯一死所。其他投入浅间山喷火口，或在富士山巅自杀的青年，尚在接踵而起。请问这些青年，全是模仿藤村操的么？都是为湖光山色所诱引的么？他们自杀的原因，模仿、诱引而外，果然没有生活上的苦痛么？我想往那里去的人，去时虽然未必有自杀的决心，但是在那里自杀的人，生活上未必没有可以供他自杀的隐痛，不过加上一层模仿与诱引，更容易促他实行就是了。这样看来，与其说自杀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不如说自杀流行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与其责难自杀的人，不如补救促起自杀流行的社会缺陷。志希君论林德扬君的自杀标题曰：《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盖含有沉痛的意义！

各宗教对于自杀的是非观，亦有不同的地方。回教以自杀为逆神的命令，比杀人的罪更重，故教中悬为厉禁。耶教十戒中，有禁杀一条，不但禁止杀人，并且禁止自杀。儒教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匹夫匹妇，自经沟渎”的话，大概也是反对自杀。佛教于一定的

事情，许人自杀，但通常都以为自杀者，死后受惨苦，是前世的罪孽。惟波罗门教因有死后灵魂可以祟敌的信仰，故认因为复仇而自杀为勇敢行为。

哲学家对于自杀的意见，也不一样。康德以自杀为轻蔑存于人中的人道。菲西的以欲保生命，欲生是吾人的义务。海格尔以人能左右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为绝大的矛盾，所以自杀是一种罪恶。陶马士·穆阿主张人若罹不治的病，很以为苦的，得牧师或长官的同意可以自杀。但牧师或长官须照自杀志愿者的志愿与病状，务求合于他的希望。美国某州已采取此说，公认罹不治难医的病的，可以自杀。柏拉图说，不可非难因苦运命或难堪的耻辱而自杀的人。耶比邱拉士说待死与自杀孰宜，不可不加以考究。这是很有含蓄的话。

关于自杀的道德观，又因国因民族而有差异，在东洋牺牲个性的消极的厌世的静的文明，多可认自杀。有时认自杀为无上的道德。中国之旌表节烈，日本以切腹为武士道的要素，都是例证。在西洋保存个性的积极的乐天的动的文明，多否认自杀。以自杀者为犯了罪恶，认他是杀人罪的被害者，同进又是加害者。英国以前不许自杀者葬普通的坟墓。

中国自潘宗礼、杨笃生、陈星台相继蹈海而后，各处青年厌世自裁的，渐渐有了。民国二三年顷，湘中少年有因外交失败而自杀者，我当时适在日本，曾致书《甲寅》，与章行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以为少年不应自杀，应该留此身以为奋斗之用。行严先生复书颇有几句沉痛的话，他说：“吾国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习而已。自杀之风果昌，尚能矫起一二”；“匹夫沟渎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训，古今几多冯道、吴广之辈，依此以藏其身”；“无自杀之决心者，未必即能立效命之宏愿。往者曾涤生

败于靖港，愤投湘江，吾家价人负之以起。负之以起，非涤生所及料也，尔后成功，即卜于此”；“今吾国之所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有真厌世者，一方由极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还其故我，与浊世生死辞，极廉顽立懦之致。”如今思之，他的话实含有至理。中国社会，到了今日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中国若有血气、有理想、有精神的青年，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没有趣味的生活，当然不满意、失望、悲观。将来青年的理想，日高一日，这种不满意、失望、悲观，也必日多一日；青年厌世自杀的风，恐怕也日盛一日。我们对于这种自杀而死的不幸青年，当然要流几点同情的热泪，因为他们实在不是醉生梦死的青年。然而对于他们的自杀，终不能不抱一点遗憾，因为他们只知厌倦卑污的生活，不知创造高尚的生活，他们只知道向死里逃避旧生活，不知道向死里寻找新生活。我希望活泼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我们应该拿出那日本人情死的精神，与我们的新生活相抱合，任他是车轮，是白刃，是华严泷的水，是喷火山的火，我们也要前进，与我们理想的新生活握手。我们断断不可只为厌世，为生苦而不怕死，应该为造世为求乐而不怕死。

由此说来，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我们应该认定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冲出这个关头，再进一步，接近我们的新生命。诸君须知创造今日的新俄罗斯的，是由千八百五十年顷自杀的血泡中闯出去的青年。创造将来的新中国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杀的血泡里闯出去的青年。我悯吊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

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1919 年 12 月 1 日《新潮》第 2 卷第 2 号）

史　观

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

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即偶有重视王者、圣人、英雄、豪杰而崇之以为具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神德

者，亦皆认他们为聪睿天亶，崧生岳降，仰托神灵的庇佑以临治斯民。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康德之流已既想望凯蒲拉儿（Kepler）、奈端（Newton）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而期其发见一种历史的法则，如引力法则者然。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厥后德国“西南学派”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

自康德以还，名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见者，既已实繁有徒，于是历史观亦衍类多端：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将此种种依四种的分类法括而纳之：曰，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曰，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曰，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曰，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者，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昌盛而日趋衰落；或曰，社会的演展乃如循于一环，周而复始；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野僿而日跻开明。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者，则曰，史之进展必有动因。至于动因何在，则又言人人殊：或曰，在个人，如英雄、王者是；或曰，在社会，如知识、经济是；或

曰，在精神，如圣神、德化、理念是；或曰，在物质，如地理、人种、经济是；或曰，在神权，如天命、神意是；或曰，在人生，如社会的生产方法，或社会的知识程度是。

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例如火的发明，衣裳的发明，农业及农器的发明，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代，经社会上的几多人，于有意无意中发见、应用的结果积累而成者。旧史观则归功于半神人的燧人氏、神农氏等。若由新史观以为解释，则必搜其迹寻其因于社会全体的进化，而断定此半神人为荒诞的虚构。又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思想的社会背景。所以历

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淌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而与史观以俱代。依据人生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社会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精神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进步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退落的或循环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譬如奈端，据以发明引力法则的苹果落地的事实，奈端之前，奈端之后，目睹苹果落地者，何止千百万人，而皆莫喻引力之理，今从史实，亦何足异？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

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

（1920 年）

今与古

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

有一派人，对于现在的一切现象都不满足，觉得现今的境象，都是黑暗、堕落、恶浊、卑污，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风俗、诗歌、文学等等，全是今不如古。他们往往发伤时的概叹，动怀古的幽情，说些“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话，遐想无怀、葛天、黄、农、虞、夏的黄金时代的景象，把终生的情感心神，都用在过去的怀思。这一派人可以叫作怀古派。

又有一派人，对于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以为过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现在，古人的劳绩，都遗赠于后人。无限的古代，都以现今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今为胚胎。人类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加，一切今的，都胜于古的，优于古的，即如诗歌艺术，今人所作，亦并不劣于古人，所谓无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这一派人可以叫作崇今派。

崇今派与怀古派间，往往发生激烈的论战。欧洲当十七世纪顷，关于今古优劣的比较，亦曾引起文学上的战争，此争绵亘约百年间，在法如是，在英亦如是。

今古的激战，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众热烈的兴趣。长于此等论战的人，又将其范围推广至于知识。许多人以今古的争论，为文学史上的枝节问题。首先以此等论争，为有更广的关系，而唤起人们的注意者，厥为孔德（August Comte）。

今古的争论，在思想上实有相当的意义，这是对于文艺复兴的衡轭一部分的反抗。崇今派立于攻击者的地位，想令批评主义由死人的权威解放出来。他们争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今的人犹能与显烈的古人抗衡否，抑或在智力上实劣于古人？这还包含着更大的问题，就是：自然已否竭尽其力？他是否久已不能再生脑力与元气等于他曾经产生的人们了？人性是否已经疲竭，抑或他的势力是否永存而不尽？

崇今派的战士，主张自然的势力永远存在，直接反对人类退落说，此说所以不能见信于人。崇今派的贡献独多，知识上的进步说获有一个最初的明确论证，实为今古的争论所唤起的结果。

今古的激战，虽自十七世纪初叶开幕，而在十六世纪末叶，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战士，首先跃起作崇今派的先驱。其人为谁？即鲍丹（Jean Bodin）是。

鲍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Theory of Golden Age）。主张黄金时代说者，大抵以为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化美俗良，德福并茂，真是人间的天国；后来日渐堕落，由金时代降而为银时代，而铜，而铁；这就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此说盛行于欧土

中世神学者流，鲍丹独起而否认之。鲍丹认自然永是均一，拟想自然能在一时代产出黄金时代说所指的那个人那个境遇，在别一时代便不能产生他们，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鲍丹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一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由人的意思造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教界，时时刻刻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ci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了！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他们昧然指为金为银的时代的人，全去禽兽未远，由那个状态慢慢的演进，才有今日的人类生活、社会秩序。古人的发明，固然值得我们的赞誉，但今人亦有今人的新发明，其功绩与古人的一样伟大而重要。有了航海南针的发明，才能成就周航地球、世界通商的事业，由是而世界一家了。他如地理学天文学上的进步、火药的发明、毛织业并其他实业的发展，都在与全世界以极大的影响；即单就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而论，已足以抗颜古人而无愧。

继鲍丹而起者则有倍根（Francis Bacon）。倍根对于古人表相当的尊敬，并且熟于古人的著作；但他认古人的权威，于科学进步上，是一致命的障碍，故亦努力于解除古人权威的衡轭。他以为真理不是于任何时会的好机会中可以寻得的，真理的达到，全视经验与他们的经验所受限

制之如何；在他们的时代，时间与世界的知识均极有限而贫乏，他们没有千年的历史足当那个名称，不过是些传说与口碑罢了。除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境界与国家，他们全不熟悉。在所有他们的系统与科学的想象中，难有一个单纯的经验，有助益人类的倾向的。他们的理论，是立在意见上的，从而科学在最近两千年间，静止的停留；而立在自然与经验上的机械的艺术，则渐长而增高。

倍根指出 Antiquity 一语迷误的义解，他说我们称为古代而那样常与以崇敬者，乃为世界的少年时期，真值得称为古代的是世界的老年与增加的年代，就是我们现在生于其中的年代。论世界的年龄，我们实是古人，那些希腊人、罗马人比我们年少的多，如同我们看重一个老年人，因为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比一个青年人的大。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盼望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得到比由古代所得者更多的东西；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知识的储藏为无量数的考察与经验所增积，时间是伟大的发明者，真理是时间的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

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三大发明，是古人所不知道的。这些发明变更了全世界的情形，先文学，次战争，最后航海，引起了无数的变迁，影响及于人事，没有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再大的。或者航海及未知地的发见，与倍根以感印者，比与鲍丹者多。

倍根认地球通路的开辟与知识的增长，为同时代的产物。此等事业，在今世大部分业已成就，挽近的学术，并不劣于从前两个学术上的时代——希腊人的时代、罗马人的时代。希腊、罗马及现在是历史上三大时代，希腊、罗马为世界上文教法度最昌明的国家，但在那些时代，自然哲学亦未有何进步。在希腊是道德的、政治的空想吸收了人们的精神；在罗马是沉思与努力都耗用在道德的哲学

上，最大的智力，都贡献于市民的事务。在第三期，西欧民族的精力，又都为神学的研究占去了。古初实在有些最有用的发明，到了冥想与理论的科学的开始，这等有用的事业就停止了。在过去的人类史上，许多事物的进步是迟缓的，不定的，偶然的，人如能觉察过去的发明的错误而求所以免除之，现在很有确固的进步的希望。

倍根认循环说为知识发展上最大的障碍，每致人们失所信赖与希望。进步之不确定与不继续，全因偏见与错误妨人致力于正轨。进步的艰难，不是起于人力所不逮的事物，而基于人类的误解，此误解耗费时间于不当的目的。妨阻过去的过失，即是创辟将来的希望。

但他的新时代将来的进展是否无限，他于此未加研考。

今古论战的舞台虽在法兰西，而此问题实为一个意大利人所提起。此人为谁？就是那首著名的描绘当时叙事诗人讽刺诗（La Secchia rapita）的作者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他喜于暴露他的时代的偏见，而倡言新学说，他因为攻击Petrarch、Homer、Aristotle诸人，在意大利招了很大的诽谤。最早的古今人功绩的比较发见于《Miscellaneous Thoughts》，这是他在一六二〇年刊行的。他说此问题是当时流行的争论事件。他对此争论，于理论的、空想的、实用的各方面，立一透彻的比较，与以公平的裁断。

有一派人，主张艺术依经验与长久的工夫能致完善，所以现代必有此利益。塔桑尼对于此说首先加以批评，他说此理由不甚坚固，因为同一的艺术与学问，不永是不间断的为最高智慧所追求，而有时传入劣者手中，所以渐趋退落，甚且至于消灭。例如罗马帝国衰亡时的意大利，当时有很多世纪，觉艺术降在平凡以下了。换句话说，只有

假定没有联续的断裂，此说当可承认。

他作出一种比较，以明他不是任何一方的拥护者；他许古人以星星点点的优越，同时今人在全体上远胜于古人；他所考察的范围，比那些自限于文学艺术的争论者广，文化的物质方面，甚至于服装，均在他所考察的范围内。

他所著的《Thoughts》一书被译成法文，此书恐已为白衣士罗伯（Boisrobert）所及知。白氏是一位剧学家，以曾参与创立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为人所知。忆一六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此学院既成，他即刻当着那些集众讲出一段议论，猛烈的恶口的攻击 Homer，这一段议论在法兰西煽起了争论，并且引起特别的注意。Homer 自经塔桑尼攻击以后，成了崇今派集矢的特别鹄的。他们以为，假如他们不信任 Homer 的主张能够贯彻，他们便可以得到胜利。

当文艺复兴的时期，希腊人、罗马人的权威在思想界极其优越。为便于促进自由的发展，此权威非大加削弱不可。倍根及其他诸人，已竟开始了此种伟大的运动，以期廓清摧陷此等虐力。但是笛卡儿（Descartes）的影响愈益严重，愈益坚决，他的态度愈趋于不易调和的程度，他没有一点像倍根的对于古典文学的尊敬，他颇以忘却幼年时曾经学过的希腊文自夸，他的著作的感化力，乃在对于过去严格的完全的打断，并一个完全不借重于古人的组织观念的传统。他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发明的基础上，期望将来知识上的进展，从而他认知这个智力的进展，将有很远的效果及于人类的境遇。他最初名他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以“一个可以提高人性到完全最高度的普遍科学的设计”。他视道德的物质的改进，为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倚赖。

根据世界现今是较为高龄、较为成熟的见地，是认对古人独立的态度，已竟成了很流行的观念。倍根、笛卡儿并许多受笛派影响的人们都是这样。

巴士库儿（Pascal）是一位科学家而改信笛派的理想者，表示的尤其明显。他说，当那么多的世纪间，人类的全联续，应看作一个单独的人而不断的生存，不断的学问；在他的生活的每一阶段，此普遍的人，为他在从前的阶段曾经获得的知识所惠利，而他现在是在老年时期了。

对于责笛氏以对古代思想家不敬的人们，他曾为答辩，说他拒否他们的权威，便是还他们以模仿的敬礼，便是按照他们的精神，做比那些一味奴隶的随从他们的人们好得多。巴氏又说：待遇我们的古人，比他们所示以待其先辈者益加隆敬，待遇他们以一种他们值得受自我们的不可信的隆敬上，因他们未曾对那些在他们上享有同样利益的人们与以那样的看待。天下宁有比此还不公平的事么？

巴氏亦承认我们应该感念古人，因为我们在知识的增长上能优于他们。他们已达于一定的点，使我们能以最少的努力跻于最高的程位。所以我们自知我们立在较高的平面上，少艰难亦少荣誉。

最优越的崇今派，便是那些同化于笛派理想的人们。白衣士罗伯的议论出世后好些年，圣骚林（Desmarets de Saint Sorlin）又起来作崇今派的战士。那时他已成了一个梦想派的基督教徒，这也是他痛恨古人的一个理由。他和白衣士罗伯同是劣下的诗人。他说基督教的历史贡给些文辞，比那些曾为 Homer 及 Sophocles（希腊悲剧诗人）所论的，很可以感动一个诗人。他有几首诗是战胜 Homer 的示威运动。约在同时，在英兰亦有一首叙事诗响应圣骚林的争论。

圣骚林已略知此问题含有更广的范围。他说：古代不

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有学问，那样的富裕，那样的堂皇，如同现代一样；现代实是成熟的老年，正如他是世界的秋，得有所有过去世纪的果实与战利品，并有力以判断先辈的发明经验与错误而利用之；古代的世界，是个只有少许的花的春。固然，“自然”在一切时代都产生完全的事业，但他（自然）关于人的创造却不是这样，这必须要改正；那些生于最近时的人们，在幸福与知识上，必超过以前的人。他的话里含有两个要点。一为自然力永在的断言，一为现代比古代有益，正如老年之于幼稚一样的观念。这是倍根诸人所曾经论过的。

圣骚林拥护今人的挑战引起了白衣卢（Boileau）拥护古人的迎敌。圣骚林濒死之前，很郑重的以为今人战的责任托之于一位青年，此位青年名叫帕劳耳（Charles Perrault），即此可以看出今古的争论如何激烈了。

路易十四王朝时的法兰西，一般的气压很于崇今派有利。人们觉着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与罗马帝国最初的皇帝奥加士大（Augustas）的时代比美的，没有什么人发出“我生不辰”的叹声。他们的文学的艺术家，若Corneille、若Racine、若Moliére合于他们的嗜性那样的强烈，所以除了第一位，他们不愿给他们以别的等位，他们不耐听那希腊人、罗马人进到不能达到的优越的断言。Molière说：“古人毕竟是古人，我们是现今的人。”这可以表示当时一般的感情了。

一六八七年帕劳耳以《路易大王的时代》的名称，印行他的诗歌。现代的启蒙，优于古代，是他的论旨。

帕氏对于古人取比圣骚林更为有礼的态度，而其批评论尤巧。他说，希腊罗马的天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很好，或者可以使我们祖先崇为神圣，但在现今，柏拉图宁觉可厌了；而那不能模仿的Homer，设若生于路易大王的

朝代，当能作更好的叙事诗。在帕氏诗中，有确认自然的永远势力在每一时代产生同等才能的人的语句。

《路易大王的时代》，是一个简短的信仰宣言。帕氏接续着又发表一篇澈底的著作，就是《古人与今人的比较》，是在一六八八——一六九六年间以四部分出现的，艺术、雄辩、诗歌、科学及他们的实际的应用，都详加讨论了。他以二人对话的形式发表这个讨论，这对话的人们，一为热心拥护现代的战士，他作崇今的论战；一为拥护古代的献身者，他是一个明知难以否认他的反对者的议论，犹且顽强的固执他自己的见解。

帕氏认知识与时间经验以俱展，完全不是必须伴随古代的；最近的来者承袭了他们先辈的基业，而加上他们自己的新获得。

这后人较善、来者胜今的前提，似与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不相容：在知识上、艺术上，我们优于黑暗时代的人们，这固当承认，但你能说第十世纪的人们是优于希腊人与罗马人们么？塔桑尼已经涉及此问题，帕氏答此问题曰："一定不能"，因为联续中常有断裂的原故；科学与艺术同于河流，他的进路的一部潜流于地下，忽而开发奔流，向前跳跃，其丰沃与在地下跳跃一样。譬如长期的战争，可以迫制人民们蔑视学问，把所有他们的元气都掷于自保的益觉迫切的必要，一个无知的时期可以延续，但随着平和与福祚，知识与发明，将重行开始为进一步的发展。

他不主张今人在才能上或脑力上有何优越，在《路易大王的时代》中，他确认自然不朽的原则，自然犹且产生像他曾生过的人们一样伟大的人，但他不能产生更伟大的人，非洲沙漠的狮子，他的狞猛，在我们今日并与在亚历山大大王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时代，最善的人在气力

上是平等的，但他们的功业与作品是不平等的，若与以同等的势便的情形，最近的是最好的，因为科学与艺术，都靠知识的积聚，知识必然的与时俱增。

但此论能用之于诗歌与文学的艺术么？诗歌与文学的艺术界，是交战者（帕氏亦包在内）最有兴味的范域。此可证明现代能产生些诗家文学家，其优越不亚于古昔先师，但此能证他们的事业一定超于古人么？此驳论逼得帕氏不得脱逃，而帕氏答复则颇巧妙：娱人心情是诗歌与雄辩的职分，而欲有以娱之，必先有以知之，是否洞察人心的奥秘比洞察自然的奥秘较为容易么？或者洞察人心的奥秘费时较少么？关于人心的情感与念望常作出些新发见，只以 Corneille 的悲剧而论，你在那里可以寻得比古代书籍的更微妙更细致的关于野心仇怨与嫉妒的映绘。在他的“比较论”的结尾，他宣言今人的普通的优越的时候，他为维持平和起见，论到诗歌与雄辩，暂作一个保留。

帕氏的讨论，陷于缺乏体现完全的进步的观念，他不止专注意知识上的进步，但他不注意将来；对于将来，没有什么兴味；他受最近的过去知识上的发展感印甚深，故他几不能悬想再有更益向前的进步。他说：“试读英法的报章而一察那些王国的学院的出版，将使你信最近二十年或三十年内，在自然科学界作出的发明，比遍有学问的古代的全期都多，我自己想很幸的知道我们所享的幸福，考查所有过去的时代，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切事物的生长与进步；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种事物没有受过一个新的增加与光荣的；我们的时代，在些种类上曾达到完全的绝顶，从有些年间以后，进步率很迟，想到差不多没有很多的事物可以使我们妒羡将来的时代是很可喜的。”

对于将来的冷淡，即是关于将来的怀疑，是上述语句的注释，而与世界已达于他的衰老时期的观念相合，故吾

言帕氏的知识进步的观念，尚不完全。

于法兰西以外，英国亦忽然起了今古的论战。

一个神学家名叫黑克威尔（George Hakewill）刊行了一本六百页的书，以诘责当时普通的错误——宇宙衰朽的错误。他并他那呼吸在十六世纪气压下的书，全为人所忘却，他虽刊行了三版，而除些神学家外，难能引起多人的注意。著者的目的，在证明在世界的政府里，上帝的权威与天命。这与当时流行的见解不相容，当时流行的见解，就是物质的宇宙、天体、原子，均渐趋于衰朽，并那人于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各方面，正在退落的见解。他的议论多获益于读鲍丹、倍根诸人的书，可见他们的思想已经激动神学家的精神了。

一个今古间的比较起于衰朽说的拒驳，与自然力确固的问题起于今古间的比较，一样是自然的结果。黑氏反对过分的推奖古代，正为此说可以助世界衰朽说张目。他所讨论的范围，比法国争论者的较广；他所争论的范围，不止含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并及物质与道德。他求所以证明精神上物质上没有衰朽，并那现代基督教国的道德，大优于异教时代的那些国家，基于基督教有社会的进步，在艺术上知识上亦有发展。

黑氏亦如塔桑尼研考一切艺术与科学，断定今人在诗歌上与古人相等，其他诸事，亦都能超越古人。

他认退落说可以腐痹人的元气，世界普遍衰朽论，销沉了人的希望，钝滞了人的努力的锐利。他的言外的意思，是改良世界的努力，为我们对于后人所该尽的义务。

他说："于是我们不要为世界定命的衰朽的虚影所阻拦，以使我们既不后顾那些可敬的先辈的楷模，又不向前预为后人谋。如我们先辈有价值的预为我们谋者，使我们的子若孙，亦以预为之谋者颂祝吾辈。如何的世代将以延

续于我们，尚未确定，亦如未来的世代之在前世之于那些先辈一样。”

黑氏想他生在世界的末年，但他不能延长多久，是一未决的问题；但他有一个考虑可以慰安他自己并读者，就是世界的终结，尚未临近。

自然不衰朽，人类不退落，固可确认了，但那世界的终结，不依自然法，并那人类文化的发长，任在何顷，均可为神的命令所斩断的学说，其足以销沉人的希望，钝滞人的努力的锐利的影响，亦并不小。

黑氏持论的意义，在把阻碍进步学说的退落说，弄成一个特别研究的问题。他的书揭明此说与关于今古争论间的密切关系，不能说他与鲍丹、倍根诸子关于文明进步的理论有所增益。他所企图的历史的普通综合法，全与他们的相等。他说明知识艺术的历史与此外一切事务，如同纵览一种循环的进步；他说他们都有一个发生、滋长、繁荣、废落与萎谢，于是经过一个时期后，又有一个复苏与再兴；以此进步的方法，学问的光明，由一民族传到别一民族，由东洋而希腊，由希腊而罗马，既已为蛮人所不见者千有余岁，而又为 Petrarch 及其当代人所复活。黑氏所陈循环进步的观念，颇与倍根所指摘的循环说相近。

倍根及十七世纪的思想家，自限其过去进步的观察于知的范围内，而黑氏对于古代的仪容道德，不惮与以攻击，能预见这社会的进步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要来到十八世纪阵头的。这是黑说值得我们注意的点。

黑氏的书出世以后，我们又得到格兰威尔（Glanvill）所著的《加的过度》（《Plus ultra》），又称《亚里士多德时代后知识的发展》。此书于一六六八年出版，宗旨在拥护成立未久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该会在当时颇受攻击，谓为有害于宗教及真实学问的兴趣。格氏愤古典

派对于皇家学会的压迫，乃起而树拥护的旗帜。他说他对于无名的罗盘针的发明者的感佩，比对于一千个亚历山大与恺撒、一万个亚里士多德的感佩还深且多。在这几句话里，可以看见他的精神了。

他说皇家学会的职分，就是企图人类的设计，置在自然的最深底蕴那样低，达到宇宙最上层那样高，扩张到广大世界的一切变化，目的在普遍人类的惠利。那样一种事业，只能以不能知觉的度数，慢慢的进行。这是一个累代的人均与有关的事业，我们自己的时代，只能希望作一点点，以移去些无用的片屑，预备些材料，安排些东西，以备建筑。我们定须寻求与搜集，观察与考验，为将来的时代预储一个积聚。

神学的考虑，曾经重压过黑氏的思想，而格氏则显然未为所困惑。看了二人的不同，便可以看出这四十年间世界进行的经路了。

斯普拉特（Sprat）是一个牧师，他于格氏的书出世以前不久，出版一本《皇家学会史》。他认科学可以扩张于世界，此事全靠西方文化扩张其地域，基督教国的文化亦可扩到其他文化国及半开化国，他希望将来的改宗者，可以有青出于蓝的优越，希腊人胜过他们东方的先师，现代欧人从罗马人承受了光明，而幸福繁昌，倍于古人所遗留于他们的。

皇家学会建立于一六六〇年，科学院建立于一六六六年，使物质的科学，在伦敦与巴黎很流行。各阶级，都为此流行的情感所激起，若骑士，若圆颅党，若牧师，若清教徒，都联合起来，若神学家，若法律家，若政治家，若贵族，若世爵，都夸扬倍根哲学的胜利，倍根播的种子，终竟成熟了。那些建立与赞美皇家学会的人们，对倍根有完全的信用。考雷（Cowley）上皇家学会的赞歌，可以名

为赞扬倍根的赞歌，亦可以说是人类的精神，由权威的束制解放的圣歌。

我们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我们不要学着唱那怀古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歌，应该朗诵着耶马孙的名言：“你若爱千古，你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

（1920 年）

又是一年

时光似箭，糊里糊涂的又是一年！我们身当这无终无始大自然的冲流的断续关头，觉得杂着些悲哀、恐惧和欢喜。我们看许多的朋友们，因为走的步数稍微慢了一点，就赶不上进步的潮流，成了过去的人了。过去的人，看着现在和将来，都和他的生活不合；现在和将来，也没有一点的幸福和希望给他，所能给他的只是些悲哀、烦闷和苦痛。我们眼望着他们落后，受些悲哀、烦闷和苦痛，也觉得十分悲痛，十分伤感。我们实在怜惜他们，精神上已成了过去的人啊！我们自己呢？也是危险的很。时间总是在我们前面走，总不停留，我们的惰性总是想不跟着他走，一不小心，也和我们所悲痛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作了时代的落伍者，岂不可怜！岂不可怕！一年是一段生活的结束，我们应该有一回总计算。一时一刻，也不该令他零下去，我们的生活，才能和大生命联结上。不零下去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创造新生活。我今天只有欢天喜地的祝福诸位又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1920年1月4日《新生活》第20期）

忏悔的人

最可敬的是忏悔的人，因为他是从罪恶里逃出来的，所以他对于罪恶的本体和自己堕落的生活，都有一层深严而且透彻的认识。以后任是罪恶怎样来诱惑他，他绝不会再上当了。我们对于忏悔的人，十分尊敬。我们觉得忏悔的文字，十分沉痛、严肃，有光华，有声响，实在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福音。

（1920年1月4日《新生活》第20期）

哭冯国璋

冯国璋死了！我对于他的死，十分哀痛！冯氏一生的成绩，遗留在世界上的，除去汉阳的焦土，新华宫的残梦，和些累赘子孙的金钱，还有甚么！冯氏的人生，也是一幅很洁白的画幅，怎么糟蹋到这样！而且就是这样结局了！回头看来，我们总觉得他是空空的掷掉了一生，我们总觉得他的身后，只剩了空虚和寂寞。什么丧礼咧，国葬咧，大人先生的哀吊咧，全国公私机关的下旗咧，那里和冯国璋的真人生有丝毫的关系！我真不禁为冯国璋痛哭！更为别的冯国璋痛哭！

（1920 年 1 月 4 日《新生活》第 20 期）

山穷水尽的青年

如今各处的青年运动，已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没有可走的路了。像我这种爱力不厚的人，只是替青年灰心！可是青年兄弟们，还是一点不懈，在无路的地方寻路。他们的爱力固然很厚，但是我要问大家一句："那全是他们的责任么?"

（1920年2月8日《新生活》第25期）

精神解放！

现在是解放时代了！解放的声音，天天传入我们的耳鼓。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人类活泼泼的生活，受惯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自然渐成一种猜忌、嫉妒、仇视、怨恨的心理。这种病的心理，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把愉快、幸福的光华完全排出，完全消灭。这种生活，我们岂能长此忍受！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

（1920年2月8日《新生活》第25期）

自由与秩序

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此问题为圆满的解决者，不足称为社会的学说。

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扩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代表后说。

但是，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不是事实的本身相反，是为人所观察的方面不同。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

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这种的个人，还有什么个人的意义！

试想一社会若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出死气奄奄的气象。他所包蓄的份子，既一一的失其活动之用而日就枯亡与陈腐，更安有所谓秩序者！

由此看来，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

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

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1921年1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

今与古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今与古》。今是现在，古是过去的时代。我们现在把今与古来对讲，是要考查现在的人与古来的人有什么不同之点？现在的人与古来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生活很是重要，所以来大略说一说。有人在文章上发表他的意思，常说："世道人心，今不如昔"；"人心不古"；"现在的风俗道德人心，不如古来的风俗道德人心"。讲这些话的人，大半都是"前辈""长者"。他不满意于青年，也不满意现在的一般人，于是发为感叹，而动其怀古的思想。但是我们想想，是不是今人真不如古人？是不是发这样感想的人错误？这是个很有趣味的问题。我们先考究他们所以怀古的原因：

(1) 发此种感想的人，对于现在的人心，风俗，政治，道德，都不满意，感觉苦痛，因而厌倦现在，认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这种厌倦现在的感想，并不是坏的感想，因为有了这种感想，对于各种事务，才都希望改进。有了希望改进的思想，才能向前进步，才能创造将来。若是不满意现在，而欲退回，把现在的世界回到百年千年以至万年前的世界，这不光是观念错误，并且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是伤时之人厌恶现在，而触动他怀旧之心的一个原因。

(2) 人大半是羡慕古人之心太盛，如古人在当时不过是一斤八两的分量，到现在人看来就有了千斤万斤的分量，这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

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例如火在人类史上有极大的关系，因自有火的发明，而人类生活遂发生很大的变动；又如农业，也是人类史上一个很大的发明。不过火同农业的发明，是社会的进化，并不是所谓神农、燧人一二人的功德。而旧史却不认为是社会的进步，而认为是少数神圣的发明，这是年代距离太远，传闻失实所致。又如黄帝，古代有无其人，尚不敢必，但是世人尊敬他的心，比他本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分量，高的多多。又如某校请一位本国教员，并不见得学生怎样信仰，怎样欢迎，要请一位有与本国教员同等学问的外国教员，就非常的尊敬欢迎，就是出洋留学的，也觉得比不出洋留学的好些。谚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是普通的心理。推想起来，这又是因为受了空间距离太远的影响。过分的崇敬古人，其理亦与此同。我们的子孙对于我们，或现在一般的人，所发生的尊崇心，是我们想不到的高厚，也未可知。

（3）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世运每由昌明时代，转为衰落时代，甚而至于澌灭。因而许多人以为今不如昔，就发生怀古的思想，那里知道衰落之后，还有将来的昌明哩！

（4）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之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故崇拜祖先的礼俗，亦是使人发生怀古思想的一个原因。

（5）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艺术乃是有创造天才的人所造成的：艺术不分新旧，反有历时愈久，而愈

见其好者，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

怀古的思想，多发生于老年人之脑际，青年人正与相反。一派以为今不如古，总打算恢复三代以上的文物制度，一派以为古不如今，因此在学术史上就发生了争论。在十七世纪初期文艺复兴后，法兰西、意大利就有今古之争，于文艺（诗歌文学）上，此争尤烈。崇古派则崇拜荷马，崇今派则攻击荷马。这种争论，大众以为不过是文学上的枝叶问题。自孔德出，才以为这种争论，不光是在文学上如此，各种知识，都不能免，才把这种争论的关系，看得很大。这种争论，起于意大利，传至法兰西、英吉利，前后凡百余年。

在历史学上进化、退化的问题亦成争论。崇古派主张黄金时代说，以为人类初有历史的时期，叫做黄金时代，以后逐渐退落，而为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云云者以此。崇今派以为古代没有黄金时代，古时的人，几同禽兽，没有什么好的可说。现在是由那种状态慢慢的进化而来的，如有黄金时代，亦必在将来，现在或是银的时代，过去的时代，不过是铁时代、铜时代罢了。其说正与崇古派相反。布丹说："崇古派说古来是黄金时代，全然错误；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还不如他们所说的铁时代的现在；假使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和现在比一比，那个时代，反倒是铁，现在反倒是金亦未可知"。中国唐、虞时代，今人犹称羡不置，一般崇古的人，总是怀想黄、农、虞、夏、文、武、周、孔之盛世。但此是伪造，亦与西洋所谓黄金时代相同。他们已经打破黄金时代之说，我们必须把中国伪造的黄金时代说打破，才能创造将来，力图进步。这全靠我们的努力。这个责任我们都要负着。在中国古书里面，亦可以寻出许多今古的比论，如"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也。”其语气在古代，似有新的意味，且近似进化说。《书经》上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又是人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的意思。

中国人怀古的思想，比西洋人怀古的思想还要盛。因为西洋科学早已发明。科学是在自然界中找出一定的法则，有如何的因，便有如何的果。他们能用科学方法证其因果，又能就古来的，而发明古来所未有的。这样，古人的发明，都有明了的法则，都遗留给后人，而今人却能于古人的发明以外，用科学方法有所新发明。中国科学不发达，古人遗留下的多是艺术的，创造全靠个人特有的天才，非他人所能及。故中国人崇古的思想，格外的发达，中国人对于古人格外仰慕，对于古人的艺术格外爱恋。

怀古思想发生之原因，及中外怀古思想不同之点，既如上述。现在我发表我对于这种思想的批评。

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我们看古是旧，将来看今也是古。刚才说的话，移时便成过去；便是现在，也是一个假定的名词。古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在今人生活之中包藏着，我们不要想他。例如现在的衣服，其形式材料，及制造的方法，极其精致，古来次第发明的痕迹，都已包藏在内。像古人所取以蔽体御寒的树叶兽皮，我们又何必去怀想他！

黄金时代说是错误的，因为人与自然有关系，如太阳光、空气等等。人离开自然，就不能生活。古时的自然产生孔子那样的伟人，现在的自然亦可以产生孔子那样的伟人。同一的太阳光，同一的空气，在古能生的人，在今又何尝不能生？古代生的人，如何能说是万世师表！崇古派所认为黄金时代产生之人，现在也可以产生出来，我们不

必去怀古。怀古的思想，固可打破，但我们不能不以现在为阶梯，而向前追求，决不能认现在为天国。当时时有不满意现在的思想，厌倦现在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再求所以改进之方。如现在中国国势糟到此等地步，我们须要改造，不要学张勋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他们是想过去的，我们只是想将来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要知道历史是循环不断的，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1922 年 1 月 8 日《晨报副刊》）

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

我今对于我们北大同学，发起这个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刚才胡先生说新闻事业，是要研究“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不希望诸位替人家做那“充篇幅”的事情。我现在更希望诸位对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点也特别注意。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现在我们北大同学从事新闻事业的，如此之多，将来必能“改造”、“提高”新闻界。因为大学是一个最高的学府，所研究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故由大学出身的人，必有比较的多方面的知识，或有与多方面的知识界接近的机会，希望诸位同学出其所学，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新闻记者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胡先生说，新闻宜注意活的问题，不应单讲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等死的学说。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他变成活的。譬如平日登些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人便全不注意，若当接到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那一天，把他的历史，他的学说，写出来贡献在社会上，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

注意了。又如但丁的历史和他的文学，在平日登出来，充充篇幅，实在于一般看报的人，没有多大的意味，若在去年，有为他作六百年纪念的事实那一天登出，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兴味来。又如今天高师为达尔文一百十三周年诞生纪念，开博物展览会，并讲演会，北京的报馆，若有在今日把达尔文的历史、肖像和他的学说的概要登出来的，岂不是格外有趣吗？又如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自治团，在平时写出来，人并不十分注意，若在去年三月十八、九日恰恰是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把这一段历史记载出来，登在报上，岂不是绝好的材料吗？可见死的材料，若是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若作平日充满篇幅之用，因为他与现实的生活不相关联，于阅者亦丝毫不发生兴趣。照这样子做去，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例如新疆、甘肃发生地震，我们便去访问地质学家。太阳忽然现出红光，我们便去访问天文学家。某种政治问题发生，我们便去访问政治学家。请他就此事实为学理上的说明。此外如有各国学者来华，亦当随时访问，叩其意见，以转为介绍于社会。这是新闻界对社会灌输知识的职分与方法，这点诸位要注意的。

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但是现在新闻界，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这是旧习惯未退尽的一个最大的表现，也就是新闻界

的一个大缺点。这一点也希望诸位同学注意。

我们北大同学，在新闻界的人，发生这样一个团体，是一件很有关系的事。胡先生说，不希望主张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发挥个性固然不错。但是有了这个团体，总可以借此情谊，立在同一的、知识的水平线上，常有机会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遇有国民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总可以定一大目标，共同进行，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民的宣传的责任。

敬祝北大新闻同志会的进展无涯！

（1922 年 2 月 14 日《晨报》）

失恋与结婚自由

自从三月十九日《晨报》的社会新闻登出《两个恋爱的惨剧》的新闻一条，引起梁任公先生慷慨的义愤；又因梁先生的投书，引起了沈女士谢绝多管闲事的、强有力者的仗义的信，并引起了褚保衡先生对梁先生的辩证；又因褚先生的辩证，又引起了沈女士的自白，并对褚先生的质问。原来沈女士的婚姻问题，在原投稿中不过是一个枝叶，现在却成争论的正传了。我今亦欲就这社会的事实下一个批判。

（一）我不敢武断着说原投稿者“是一个极下贱的人”，“是最可恶的人”，是居心“造不道德的谣言毁坏一个妇人的名誉”的人，是“社会上横行无忌的坏人”，是“害群之马”，是“站在黑暗方面含沙射人的败类”。我可以推断他或者他是一位替那失恋者抱不平的人，是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这一条投稿的错处，在把女子方面爱情移转的原动力都归到“经济”、“势力”和“虚荣”上去，这未免太抹煞了女子方面新发生的爱情的力量和其他关系，蔑视女子方面的人格的意味未免太重了。至于那个投稿遇见男子便把姓名隐起，女子便大书特书，实在令人不能不疑这“是欺负女子的恶习遗传下来的毒”。但我推断这是因为投稿者的心理太痛心于女子的凉薄与负心的原故，他应该把男女的姓名俱隐，或是俱揭。

（二）梁先生为“弱女子”鸣不平的热心我很感佩，但嫌过度了一点，所以对于投搞者的责备亦嫌失当了一

点。这或者也是梁先生爱朋友的感情作用，亦未可知。我想这等事实可以公布，尤其在现在正是男女社交公开渐有希望的时代，应该让一般男男女女知道这爱的力量的伟大，可以使人喜悦，可以使人得神经病，乃至于可以使人死，应该慎重着些，不可太儿戏了。应该让人知道爱情是有变动的，在爱情变动的潮流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悲剧，这种悲剧，在男女社交公开的生活中，婚姻自由的制度下，是应有的现象，是习见的事实。应该让人知，爱情一有转移，婚姻关系可以自由解除与缔结。不过关于这类事实的纪述与批评，总要公平与精细才是。

（三）沈女士辞谢了“强有力者”替“弱”“女子”的抱不平，申明“如今的女子是二十世纪的女子，不像欧洲中世纪女子，欲仰仗当时强有力者的武士来庇护”，很可以替今日中国的女界生色，沈女士的解除婚约与再除婚约，都是光明磊落的作为。即使郑君因为此事得了神经病，亦算是社会上一件遗憾万千的事罢了。

（四）褚先生对于梁先生的辩证，和对于沈女士的答复，措辞很是得体，他的重要目的，在证明郑君实在是因为失恋得了神经病。褚先生与郑君是朋友，当然对于他的朋友——失恋的朋友表满腔的同情。但我希望褚先生亦不要因为对于朋友的同情，把女子方面的婚姻自由看过了。

总结几句话，失恋的人是遗在灰凉世界中的一个人。我们旁不相干人对他也都表满腔的同情，况是他的朋友。但那致他失恋的女子，对他既是没有爱情了，当然有和别的有爱情的人订婚、结婚的自由。这与名誉丝毫无损。我们不可因为对于失恋者的同情，便厚责于女子方面。我们若承认女子有婚姻的自由权，若承认女子方面因爱情移转而解除婚约，并与女子方面的名誉无损，当然不必为之辩解，说是诬蔑与造谣。女子自身亦尽可赤裸裸的告白的恋

爱不存、婚姻自解的理由，不必以此为耻辱。至于那失恋的人，亦要达观些。要知恋既不存了，那以前的痕迹都是些幻梦与泡影。为恋爱而牺牲而殉死是可以的，为幻梦与泡影而牺牲而殉死太不值得了。失恋的人啊！世间还有很多可以爱你的人等着你呢！

我望多情男女郑重着些，失恋的人自少。

（1922年4月1日《晨报》）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常听人说，某派宗教，颇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等观察，适与我的观察相反。

先说宗教与自由。

宗教是以信仰的形式示命人类行为的社会运动，宗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绝对的体认，故宗教必信仰神。既信仰神，那么心灵上必受神定的天经地义的束缚，断无思想自由存在的余地。盖人类不容异己的意念，实从根性而发生，至于所重视的事物，其不容异己的意念更甚。所以笃信的教士，无论他属何宗派，恶异喜同的感情，几乎都是一样。欧洲宗教改革的发端，实因反抗罗马公教的压制而起，但其党同伐异的情形，新宗与旧宗相差无几。后来门户纷争的结果，只有分立，没有全胜，于是弱小宗派，乃揭崇信自由的旗帜以求自存。这样看来，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不能存在。必到人人都从真实的知识，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才有思想自由之可言。我们的非宗教运动，就是要申明这个道理，使人们知道宗教实足为思想自由的障蔽。要想依自己心灵的活动，求得真知而确信，非先从脱离宗教的范围作起不可。那么我们非宗教者，实在是为拥护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为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

次说宗教与平等。

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原来宗教的成立，多是由于消极的条件：（一）强力的缺陷。原人的生

活，处处受自然力的支配，而不能支配自然，故常感自然力的伟大，而觉自己的力量缺乏，起先看见雷霆、地震、火山、洪水、暴风、天变、地异、日蚀、月蚀、猛兽、毒蛇等自然界的变象而发生恐怖，后来对于自然界的常态，亦生敬畏。这时有能对于这些变象有几分先知预见者，或自称能有几分先知预见者，或能对于这些变象有几分抵抗力者，又或在这变异时境中能泰然自若而有几分应付变异的成功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有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仰。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一。（二）身体的缺陷。人体的健康，常生变动，有时忽罹疾病，原人不知罹病的原由，辄归于神的降灾。这时有能对于病苦之将至为豫告者，或于救济病苦有几分的成功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畏。古者巫医并称，如今宗教与医尚有密切的关系，便是明证。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二。（三）生命的缺陷。人生的修短无常，病痛之极，乃至于死。原人对死，亦生恐怖，而常忧惧。故有能预告其死者，或对于死与一种慰安者，——如死后生活的保障亦是一种对于死的慰安——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故宗教必谈死后，必说来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三。（四）品性的缺陷。罪恶的自觉，自原人时代亦既存在，惟关于简单明了的事为然，特别是关于性的关系，尤为原人所重视。此时有能功之为罪恶的改悛者，有称为有能赦免罪恶的全权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优者强者，而为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宗教家至今尤重独身生活，即源于此，而忏悔一端，犹为今之宗教所注重，亦以此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四。（五）运命的缺陷。人之处世，祸福无端，原人于此，往往疑有主宰，操人运命而能与祸福者。此时有能豫告祸至者，或能为祷告

以免祸祈福者，均成为优者，而为一般人所敬畏。故宗教不能离于祸福观，而祈祷至今犹为宗教上的一种仪式，亦以此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五。就是祖先崇拜的起源，虽由于“与自由有密切关系”的积极的条件，但其生前，实为家庭的长上，而于教养及其他生活上为优者。由此类推，伟人崇拜，英雄崇拜，国君崇拜，都现出优劣不平等的关系，这样看来，宗教本质全系不平等关系的表现，而欲依此以实现平等的理想，恐怕很难了。

再次说宗教与博爱。

宗教的教义，多有以神为介而阐导博爱的精神的。但我很怀疑，没有自由平等作基础的博爱，而能达到博爱的目的么？即如基督教义中所含的无抵抗主义，如“人批我左颊，我更以右颊承之”，“人夺我外衣，我更以内衣与之”，“贫贱的人有福了”，“富者之入天国，难于骆驼之度针孔”等语，其结果是不是容许资产阶级在现世享尽他们僭越的掠夺的幸福，而以空幻其妙的天国慰安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苦痛？是不是暗示无产阶级以安分守己的命示，使之不必与资产阶级争抗？是不是以此欺骗无产阶级而正足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资产阶级是不是听到这等福音便抛弃他们现世的幸福而预备入天国？这是大大的疑问。

（1922 年 6 月《非宗教论文集》）

演化与进步（内容简述）

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的历史观，系进步的历史观，我们做人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人类是有进步的，即就文艺论，也不是今下于古的。所以无论如何，应当上前进去，用了我们底全力，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不要悲观，应当乐观。

（1923年4月1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时

今逢《晨报》第五周年纪念日，吾乃就“时”的观念发生种种感想。“晨”为日之始，新鲜的朝气，清明的曙光，都随“晨”的时光以俱至。“晨”出吾人于长夜漫漫的暗域，“晨”导吾人于生活迈进的前途。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一朝最好是清晨。周为岁之满，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逝者未逝，都已流入现今的中间，盈者未盈，正是生长未来的开始。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为“晨”为“周”，都是这大自然大实在流露出来的一体。

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

时是什么东西？吾曾以之问于玄学，问于认识论，问于心理学，问于数学，问于物理学，问于天文学，都只能与吾以一部分的解答，不能说出他的真实的全体。有的物理学者说，他与“以太”有关。但是“以太”云者究为何物？仙乎神乎，百般捉摸，不能得其正体。近来物理学者努力的结果，已知“以太”云者，本无是物。欧洲有一种学问，名为Chronology，译成国语曰编年学，曰纪年学，曰年代学，亦曰时学。我欲以时为何物，问之Chronology，但这不过是研究时的计算，并未涉及时的根本问题。心理学家又来告我，时是心造，因境而异。同一时

间，欢娱则每恨其短，痛苦则每厌其长；怀人则一日三秋，乐生则百年旦夕。地质学家从旁窃笑，谓史学者把几千几万年间的经过，分成上古、中古、近古诸期，其间盛衰兴亡，纷纭热闹，杳乎久矣，而在地质学上看去，这不抵一朝暮间的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吾侪尽自懵着头过这朝菌、蟪蛄的生活罢了。时的问题不能研究，且亦不必研究。说来说去，言人人殊，时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

哲家者流，究时之义，竭虑殚思，不能得其象迹，乃有拟于空间以为说法者。谓时如一线，引而弥长，既被引者，平列诸点，有去来今。但以此喻说明时的递嬗，亦不合理。因此一线，既已引者，悉属过去，未曾引者，当在未来，现今之点，列于何所？我们知道，三世代迁，惟今为重，凡诸过去，悉纳于今，有今为基，无限未来，乃胎于此。如兹说法，消泯了现今，亦即无异丧失了人生的奥秘。凡诸过去，将于何托？凡诸未来，于何承接？此种说法，不能使人满足。我乃沉思，更得一义：既引的线，确属过去，未引的线，确在未来。然此线之行，实由过去，趋向未来，必有力焉，引之始现。此力之动，即为引的行为，引的行为，即为今点所在。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苟一刹那，不有行为，不为动作，此一刹那的今，即归于乌有，此一刹那的生，即等于丧失。本乎此理，以观历史，以观人生，有二要义，务须记取：时的引线，与空间异。引线于空间，可以直往，亦可以逆返，我们可从北京来到上海，又可由上海返于北京。至于时间，则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我们能从昨日来到今日，不能再由今日返于昨日。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

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你不能旁观，你不可回顾，因为你便是引线前进的主动。你一旁观，你一回顾，便误了你在那一刹那在此不准退只准进、不准停只准行的大自然大实在中的行程，便遗在后面作了时代的落伍者。于是另有一义，随之而起。凡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人物，都是一趟过的。无论是悲剧，是壮剧，是喜剧，是惨剧，是英雄末路，是儿女长情，都是只演一次的。无论是英雄，是圣贤，是暴君，是流寇，是绝代的佳人，是盖世的才子，在历史的旅途上，亦只是过一回的。垓下的歌声只能听得一次，马嵬坡前的眼泪只是流过一回，乃至屈子的骚怨，少陵的悲愤，或寄于文辞，或寓于诗赋，百千万世的后人，只能传诵他们，吟咏他们，不能照原样再作他们。就是我们糊里糊涂一天一天的过去的生活，亦都为一往而不可复返。看到此处，真令人惊心动魄了。人生既是这样可以珍重的东西，那么朝朝都有晨光，年年都有周岁，光阴似箭，一去不还，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欢天喜地的行动着，创造着过去。凡是遇在这一进不退一往不返的、只能见一面的、只能遇一遭的时的旅途上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弟兄，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握着手，欢天喜地的亲爱着、互助着，共赴人生的大路。我们不要迟疑审顾的误了好时光，更不要此猜彼忌的留下恶痕迹。机会不可复得，因缘永难再遇。我们在这万劫长流中，大家珍重，向前迈进，走此一遭，必能达到黄金世界的境域。

在空间论前后，前在我们的面前，后在我们的背后。在时间论前后，却恰与此相反。一说前日，便是指那过去的一日；一说后日，便是指那未来的一日。这样说来，后日却在我们的面前，前日反在我们的背后。日常云用，毫不觉异，此果何故？我尝细思，这等言语，很可以表示我

们时的观念的错误，历史观的错误，人生观的错误。寻常设想，总以为时的首脑在于古初，时的进行的方向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吾人只是立在一旁，屹然不动，回过身来，向着过去方面看，这太古的机关车带着这些未来连续不断的时的列车，滔滔滚滚的，似水东流，直向荒古方面奔去，所以误认过去的一日转在吾前，未来的一日反在吾后了。这种时的观念所产生的历史观、人生观，是逆退的，是静止的，是背乎大自然大实在进展的方面的，是回顾过去的，是丧失未来的。要知时的首脑，不在古初，乃在现在，不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乃是向广漠无涯的未来奔驰。吾人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这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作他的主动力，向前迈进他的行程，增辟他的径路的，不是笼着手，背着身，立在旁观的地位，自处于时的动转以外的。我们要改变这误谬的时的观念，改变这随着他产生的误谬的历史观、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逆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

在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本来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于今日，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虽以论坛权威如章行严、梁任公两先生者，亦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章先生则一面说，从前衣服既由宽大而趋于瘦小，今则复由瘦小而返于宽大，以证史相的反复循环；一面又说唐碑不如魏碑，魏碑不如汉碑，以证人文的愈趋愈下，似为一种循环的而又退落的历史观。梁先生则虽犹回顾其《新民丛报》时代的进步的历史观而不忍遽弃，但细味其为文，行间字里，几全为悲观的论调所掩蔽，全为退落的历史观张目，而于进步的历史观深致其怀疑。我本崇今论者，深惧此等论坛权威将为怀

古论者推波而助澜，用特揭出“时”的问题以与贤者相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复归于进步论者之林，与我们携手提撕，共到进步的大路上去。这是区区此文的微意。总之，我认时是有进无退的，时是一往不返的，循环云者，退落云者，绝非时的本相。即让一步，承认时的进路是循环的，这个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逆退的，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我们今人设若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安见不及古人？安见不能超越古人？即让一步，承认古人有非今人所能及的，有非今人所能胜的，他也只是在历史上过一趟的，演一回的，不能因为今人的崇拜与怀思再来一次。我们只有随着这有进无退的时的流转，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要知此一趟的经过，此一回的演行，乃永久存在，永久传流，贯注于人类生活中，经万劫而不朽！”

十二，十一，一。

（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妙手文章

更名龟年小启

启者：鲰生本性，最患同人，浊世失名，未尝还我。落花时节，悟沦落之前身；过眼云烟，迷英雄之本色。青衫诗客，谁是少陵？白发宫人，莫话天宝。渺知音之不作，羌盛世其难期。暴君歇而暴民兴，天祸殷而人祸极。嗟虖！江天一碧，依然崔九堂前；尘世几更，犹是岐王宅里。江南莫望江北，今龟何如古龟。而今而后，化猿化鹤，尚不可知，则呼马呼牛，亦惟漫应而已！

（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覆景学钤君

景君足下：

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已。梨洲所谓海外一二遗老孤臣，心悬落日，血溅鲸波，其魂魄不肯荡为冷风野马者，先生殆其人欤？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前岁军兴，戎马倥偬，延及一载，士夫方务鼎焕新猷，弗遑及他。神州光复，未有祭告，以慰英魂；而樱花三岛间，乃于去夏举行舜水二百五十年纪念祭典。倾闻之下，欣痛交集。时披阅东报，见其关于先生轶事遗闻之记述，辄为译辑，惟所得无多，载记亦嫌漫无统秩。今足下驰函下问，自当罄其所知，陆续载之本报，以供众览。阐幽存轶之责，非所敢辞焉。但先生遗著及事迹，存于祖国者绝少，有之亦多半散零，其存于日本者，有《舜水文集》、《舜水行实》（安积澹泊著）、文恭遗事等，惜未悉其藏售何所，近有稻叶君山所辑之《朱舜水全集》，装为一册，后藤新平男爵为之序，价日币三圆，邮金四十钱，可向日本东京神田小川町一丈会堂指购也。至其他关系品，泰半藏于水户彰考馆。东邦人士，珍若拱璧，恐不易搜求。他日同志有之蓬瀛者，不妨因介绍造访该馆，乞一参观。若以舜水学社名义，与彼知名之士婉商，其私家藏蕴之著，倘外无传本，则照录之，其事迹、手札、图像、模型、器物等，则拍以写真，归而用铜版或玻璃版拓出，以

广流传，当不至遭彼之拒。而先哲遗风手泽之片影，赖此得以再见于祖国，不犹胜于淹沦异域，俾其后人不及瞻瞩遗徽也。

挽近士风偷惰，志节荡然，满清所以苟延末运将三百年者，则人心之颓丧为之也。舜水学社之创立，诸君子殆于此存有深意。钊不敏，窃愿从以自勉也。希即将社章及印刷品邮示，敝社同人，当不乏闻风兴起者矣。至杭州大会所议决者，如归葬故国，设立专祠，纂辑先生著作行世，皆所以慰先生之英灵，扬先生之光烈者。呜呼！中原恢复，还我河山，先生制棺时，盖已豫知夫满清终有败亡日，而追遵遗命，谋所以迎骸骨以归，慰英灵于地下者，讵非神州士夫之责耶？尚望足下于京师集会时，有以亟倡之也！尊处关于舜水遗著，有何善本，亦冀见教。其有先生遗像、手迹等之以铜版拓于东报者，已专函寄上。钊向居校，承询并及。诸务冗烦，覆书甚迟，宥之。余不白。

本报记者李钊

（1913年5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2期）

文　豪

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盖文之入人者深，而人之读其文者，展卷吟哦，辄神凝目炫于其文境。潜移默化，观感旋殊，虽旷世异域，有千秋万里之遥，而如置身其间，俨然其时其境也者。文字感化之伟，充其量可以化魔于道，化俗于雅，化厉于和，化凄切为幽闲，化狞恶为壮伟。三寸毛锥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阨运之中。则夫文豪者，诚人类之福星也矣。

长天一碧，万木葱森，人影在山，樵歌出谷，科学家视之，僵石枯木之类耳；而一经文豪之点缀，则觉清风习习，透人肌骨焉。枫叶萧萧，江滨渔火，钟声夜半，月落乌啼，科学家视之，声光变动之象耳；而一经文豪之绚绘，则幽深潇洒，万念俱息焉。尽文豪之眼界灵机，悠悠宇宙之间，形色万殊，无不可为发舒性灵，感触兴趣之资。造物者降生万物，而不能使其所生之物，各自直觉其生机之大本，局部自限，缺陷靡穷；文豪本其直觉，发为文章，俾人天物我之实相，稍能映露万一，以通消息于其间，而补造物者之缺陷，斯其有功于造物者不小也。

嗟嗟！古今文豪，其身世何多在怨悲凄苦、飘零沦落之中也。征之东西，如出一辙。文王锢居羑里，寂寞铁窗，乃演《周易》。左邱失明，乃传《春秋》。屈灵均忠爱缠绵，而蔽伤于谗，憔悴行吟，卒沈湘水，而《离骚》、《楚辞》，诗亡而后，此其继音。马迁身被宫刑，填胸愤慨，《史记》之作，模式来兹。乃至少陵忧国，血泪挥干。

白也无家，佯狂弃世。放翁有种族之痛，渔洋有故国之思。他如金圣叹、李温陵之流，千古奇才，竟罹惨祸，杀其身而不足，更毁其书。中土文豪，大抵有身世悲凉，家国陵夷之痛者。而环稽西乘，唐德系出名族，中年飘泊，流寓天涯，神曲之作，为意大利文学之警钟。杰尔邦德士少年投笔，荷戈从军，雷邦特之战，伤中左腕，展转归途，虏于海寇，五载穷岛，困苦作奴，僧侣救之，始返故国，潜心著作，致西班牙文学得济于英、德之林。“汉伯德曼”目击社会，悲惨痛心，阶级制度之不良，发愤著书，有十九世纪沙翁之目。伊普逊以贫商之子，生于北欧，寂寞荒寒，贫且不能自给，童年供使，药屋愉闲，辄事文学，大学卒业后，伤祖国文学之不振，闭户著书，对兹缺陷社会，不惮口诛笔伐，文章声价，重于全欧。士多林贝尔西幼时，无力求学，艰苦卓绝，著书自活，为文伤时厌世，颇极深酷凄切之致，瑞典奄无生气之文学，至是始有新机。托尔斯泰生暴俄专制之下，扬博爱赤帜，为真理人道与百万貔貅、巨家阀阅、教魔、权威相搏战，宣告破门，杀身之祸，几于不免，而百折不挠，著书益力，充栋汗牛，风行一世。高尔基身自髫龄，备历惨苦，故其文沈痛，写社会下层之黑暗，几于声泪俱下。凡此者类皆艰苦备尝，而巨帙宏篇，独能照耀千古者也；是岂文章憎命，才华有以使之然欤？抑遭时不遇，荡析流离，余兹历劫之身，乃得优游以事文学，故其言之深长足以动人欤？嗟嗟！江山故宅，文藻空存，册籍千秋，声华不朽。吾侪生兹末世，不见古人之面影，不闻古人之欬声，徒对陈编，怅维遗迹，叹文豪之遭遇，不禁掩卷失声也矣。而于彼古人，虽躯尽骨灰，一点灵光，尚能消然与天地终古，亦安庸吾辈之欷歔慨感为者！文豪之幸不幸，夫岂在瞬息百年之遭遇也哉！

吾尝论文豪与世运之关系，其见重于社会，不在盛世，而在衰世。盖当承平之世，物阜民康，群德日进，饮食各适其宜，作息各得其所，凡属圆颅方趾之伦，均得优游歌舞于熙皞和乐之天，击壤鼓腹之歌，曲巷流俗之谚，何莫非盛世元音，粉饰泰平，文章祝颂，岂必俟夫文豪者。若夫世衰道微，国风不作，举世滔滔，相率而趋于罪恶之途，百物丧尽，民不聊生，天地有晦冥之象，群象无生人之趣，倘无文豪者应运而出，奋生花之笔，歌离黍之章，则蚩蚩者不平之诉，呼吁何从，而精神上乏优美高尚之感化，忏悔之念，亦无自而发。人心来复之机既塞，惟日与禽兽暴掠强夺，相残杀以自活，其类将绝灭于天地之间也久矣。文豪之于衰世也，顾不重哉！顾不重哉！

抑吾闻之，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盖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昔人尝有“诗以穷而益工”之语矣。夫喜怒哀乐，同为心理之变象，胡以一时感性之殊，发为文章，遂有声韵工拙之别。盖尝考之，其因缘有二：一世界观，一同情心也。吾人幻身于兹，假现世界，形躯虽间物我，精神则源于一。故优美高尚之文章，每为世人所同好。作者执笔之际，愁思郁结，哀感万端，悄然有厌卷浊世之思，精神之所倾注，恍然若见。彼真实世界之光影，不自知其流露于声气之间。人天物我，息息相见以神，故能得宇宙之真趣，而令读之者，有优美之感。若彼欢愉之词，大抵囿于兹世，纷纭人事，幻妄尘缘，乌从窥宇宙之美，又乌能深动乎人者，此愁苦之辞易动世界观者一也。人之生也，一切苦恼，环集厥躬，匆匆百年，黄粱梦冷，无强弱，无智愚，无贫富，无贵贱，无男女，生老病死，苦海沉沦，必至末日，忏悔始有解脱之期。芸芸有众，夫谁无隐痛者，平居特未尝以示人耳。一旦读愁苦之词，哀怨之什，觉满腔热泪，洒泄无从者，作者已先我

而淋漓痛切出之，安能与作者无同情之感者？骚人之怨，秋士之悲，幽恨缠绵，有展转不忍释手者矣！此愁苦之文之易动同情心者二也。

嗟嗟！世之衰也！怨气郁结，人怀厌世之悲观，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使更以愁怨之声，凄怆之语，痛其心脾，断其希望，则求一瞑而自绝者，将接踵以闻也。暴俄肆虐；民遭荼毒，一时文豪哲士，痛人生之困苦颠连，字里行间，每含厌世之彩色。凶生讃死，厌倦人间，如苏罗古夫、阿尔慈巴塞夫、载切夫等，各以诡幻慑人灵魂之笔墨论“死”，致一般青年厌世、自裁者日益加多。虽文学本质，在写现代生活之思想，社会黑暗，固无与于作者，而社会之乐有文豪，固将期以救世也。徒为厌世之文，不布忏悔之旨，致社会蒙自杀流行之影响，责又岂容辞乎？

嗟呼！嗟呼！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宜知所慎择，勿蹈俄人之覆辙，度人度世，其在兹矣。

（1913年11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介绍哲人尼杰

尼杰之名，久已喧噪于世，而能理解其说者殆鲜。此皆由于宗教之徒，愿谨之士，牖于偷安之习，伪善之说，浸染既深，罔自解脱，一闻尼杰之名，辄以危险思想目之，而利其堙没弗彰，斯实最可痛惜者也。

尼氏为近代思想大家，欲稔其为人及其学说，非兹短幅所能尽，兹揭其要以饷读者。

尼杰者，乃欲于其自己要求与确信之上，建设真实生活之人也。对于弱而求强，缺而求完，悲惨而严肃深刻之生活，奋往突进，以蕲人性之解放与向上，有虽犯百战而莫辞之勇，内对一己为自我与生活，为锐敏之省察，外对当时社会之实状，为深刻之批判，以根究人性之弱点与文明之缺陷，而以匡救其弱点与缺陷为自己之天职。彼固爱自己、爱社会、爱文明，而又酷爱生命者也。

尼氏思潮凡三变，最初受叔本华、洼古聂之影响，以人生全为美而存在；次则因包尔雷之说而重视智力；又次则括美与智，而以意志与创造为中心要素，以立主我思想之基础，极力攻击十九稘凡俗主义、物质主义之文明。以谓人生之真意义，皆隐于宗教、道德、博爱、人道是等美名之下，戴虚伪之假面，以求调和，求苟安，如堕疾病丑恶之窟中，无能振拔。而倡言超人哲学，鼓吹英雄主义，赞美力之享乐，高唱人格之权威，宣传战争之福音，而欲导现代文明于新理想主义之域。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最拘形式，重因袭，囚锢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

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此则记者介绍其人之微意，幸勿泛漠置之也。

（1916年8月22日《晨钟报》）

《自然律与衡平律》识

吾国治法学者，类皆传译东籍。抑知东人之说，亦由西方稗贩而来者。展转之间，讹谬数见，求能读皙文而通者，凤毛麟角矣。继兹而犹不克自辟学域，尚龂龂以和化为荣，或虽守西籍而不克致用，汉土因有之学，非将终无以自显，不亦羞神州之士而为学术痛耶！吾友夏子竞民，青年锐志，奋学不懈。去岁初秋航海来江户，余亦与泽民、凝修相继至。残冬风雪，海外相逢，感朋友之私，则相与欣喜；谈祖国政俗之衰，则相与唏嘘感慨。至若居诸共勉，昕夕相聚以励于学，则尤觉吾道不孤，未意零丁异域，而犹有曩者寒窗铁砚之乐也。未几，学会以书来征文，夏子语余曰："衡平律之于英法，当为事英法者所重视。顾吾国习英法者既寡，而为华英对照译述之以惠初学者，亦阒焉无闻。盖其通者，则以学士自矜，异轻是区区者，而不屑为。下焉者，则又病未能，诚缺憾也。"今一为之，实吾《言治》，意在为初学者之一助焉。吁！夏子之心苦矣。读者其勿忽诸。钊识于东京。

（1913年11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游碣石山杂记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世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翁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古诗有云"而今再过经行处，树老花残僧白头"，重寄感旧之思。予以重来五峰，青山依旧，森树丛茂，不减当年，守祠人仍为前度刘郎，健幹一如曩昔，而同游者则易为子默，且仅一人。回首旧游，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乱离身世，而予尚得汗漫到此，不胜今昔之感也已！

五峰在昌黎城北十二里，仙人顶迤东，群山矗立，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五峰环峙，势若列屏，自东向北

西历数：曰望海，曰锦绣，曰平斗，最高曰飞来，曰挂月。昌黎祠在山腹，建自有明崇祯年间，本圆通寺旧址。积石叠起，扩其地基，敷筑庭宇，盛植花木，于虚无缥渺间，万树森森，拥空中楼阁。凭垣一眺，东南天海一碧，茫无涯际，俯视人寰，炊烟树影，渺然微矣。

圆通寺规模故小，明季关东边患起，蓟、榆一带，为辽左咽喉，京畿屏障，昌黎尤为榆关内之要隘。军务重镇之驻邑城者，游踪时来五峰。今昌黎祠内有二配像，复有四牌位：（一）署钦差巡抚山永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朱，（二）署钦命督师总率关辽兼制昌、蓟、通、保、登、津等处军务兵部尚书范，（三）署钦差分守宣化府兵备道山西布政司参议朱，（四）署知昌黎县事蒋。心窃疑之，追摩挲断碣，知是祠也，乃朱、范等因昌黎二字而建，以五峰名胜，必因人始彰，故借文公为名山生色，而四子之配享，则邑人士所建之生祠也。出祠沿西山坡南行，至挂月峰下，有一洞，石门半掩，苍苔满地，白云出入其中，额曰范公洞。有石刻像，是即祠中配享之范志完也。相传卒于山中，故邑人造像以志之。余闻之乡先生，满清之入关也，首攻昌黎，邑人悉数入城坚守之，围七日不破。虏急于据燕京，遂西行，弃之去。全邑民命，获以保全。朱、范诸人，既握兵柄，自必与于此役。然则疆臣重镇，虽不能摧败强敌，捍卫疆土，而当亡国之际，尚能死守孤城，厥功亦不可没。故谓数子皆明末遗老，鼎革后隐居于此，信有由也。顾吾以为数子者，或握兵符，或膺疆寄，或职亲民，果于戎马倥偬之际，卧薪尝胆之秋，尚忍荒嬉林泉，流连风景，则明之亡，庸岂无故，而数子者，又乌容辞荒职误国之咎。若至事不可为，满人已僭窃中土，始相率隐避，空山歌哭，借保明室衣冠，则数子者，殆亦不失为明季之伤心人也。后之游者，得毋兴故明

河山之慨乎！

范氏名志完，中州人，予于祠壁见刻其游水岩长歌一首，颇足记此山景物之一般，兹录于左：

游水岩歌并序

辛巳春日，予以北平谒孤竹而还，道经昌黎，瞻文公祠。次日，同郡丞冯诗吾、蒋魁宇，访胜水岩。过中庵仙人台。东迤则为龙潭、瀑布泉。又东则为西五峰。层峦叠嶂，迥出尘寰，俯而视之，昌邑瀚海，较若列眉。诸峰环峙，若拱若卫。遂据此山之胜，因弄笔记之。

春朝访胜水岩边，桃李迎风色正妍。偶延二客来翩翩，掀髯相谈意更玄。叠嶂堆里步蹁跹，行行且止共盘旋。山中老树下记年，松子森森似毯圆。中峰再上半云烟，层峦相对两峰联。老僧引路视龙潭，上有仙岩下有川。石花层层密似竿，古松斜挂如画悬。龙潭迤东瀑布泉，银碗盛来不用盘。把酒峰前杯胪传，椿头萩芽味正鲜。遥望五峰境如仙，二客乘马我腾颠。须臾相会五峰前，景色幽然别有天。诸峰错落如珠𤩽，三泉涓涓清且涟。松风鸟韵奏管弦，石洞幽幽可参禅。昌邑城市灿如廛，瀚海汪洋列画船。登高览胜忆先贤，一僧孤立高峰巅。我欲往从解尘缘，佛骨一表法凛然。

文公案前置有枯松，枝作龙形。盖闻祠后故有三泉，今仅存其东西二者，中泉正与祠宇相值，巍石壁立，有小

泉突出石隙，可一尺。龙倜题壁诗云："五峰清不断，引入白云中。春后山涯雪，秋空海上风。三钩菩提井（祠后有泉三口），一尺大夫松（石线迸松长仅尺许，寺僧云已数十年矣）。怪石排如笔，森严拱巨公。"而范氏诗中亦有"三泉涓涓清且涟"之句，则松与泉已久供诗人吟咏之资。泉水自石罅流贯入口，浸润松根，收天然灌溉之利。厥后泉忽涸而松亦随枯，工人伐木，辄加彫斲成龙形，置案上，为存一故迹也。

挂月峰东南角，层峦高耸，片石突起，作龟形，故名龟石。石上有印月痕，如弓弯然。相传每岁阴历八月十五夜，月华团圞，如挂龟石上，此挂月之所由名也。

自文公祠东绕，出望海峰，下坡沿岭东走，为东五峰。山村四五家，果树环绕，不见屋瓦。山犬不惯见人，辄狺狺狂吠。逐白云出，时值秋梨正熟，与园主话片刻，竟由树摘数十枚赠焉，坚不受价。此种人惟于山陬间尚能遇之，久居都市者乌肯为此。予等坐石上濯足毕，乃踉跄灵故路。途次摘采山花，兼拾松子，不知夕阳已下西岭。倦游归去，长歌采薇，悄然有慕古之思矣。

水岩寺亦碣石胜境之一，在五峰西南五里许。予与子默唱三往，古寺荒凉，了无奇迹。惟正殿阶栏有二石柱，八角棱形，镌唐经文，摩挲久之，苔浸雨蚀，已模糊不克尽识。末署保宁元年，盖辽代物也。寺东院有得月亭，每值夏季，游人麇集，地近城市，人迹甚杂，俗嚣侵染，其幽雅迥不若五峰远甚也。

自邑城入山，东西二馒首山，犄角相持，如天然门户。东馒首山后为桃源山，旧为崔氏有。崔故昌邑望族，累代书香，名流辈出，崔子玉及其哲嗣伯振，均以能文著于时。广修文公祠记勒碑铭壁，文字俱奇健不群，即子玉作也。录如左：

碣石苍苍，溟海茫茫，佳气孕灵，宜有磊落奇伟任大任者，崛起于其乡。孤竹子清风其杳如耶？相与二三同志，俯仰今古，涔涔下岘山之泪。客有指顾五峰，称道唐贤韩文公者，公家世邑乘有书。明季朱、范两公，购置圆通禅院，建公祠。今春晓山贤裔，以妥神之余，大启尔宇，为谒山祠者游憩地。当夫山雨过檐，海月度岭，披云兀坐，手公遗文一编，朗诵数过，觉涛声万里，沸沸松岩间。时而壮公微言阐道，正论格君，使有唐三百年来天下，如乍闻雷霆而复见日月。时复悲公磨蝎之运，遭际屯蹇而卒，气数不易乐道之胸，谗谤益昭永世之名。不禁酹酒阶前，拜手稽首，望我公翩然来下大荒也。同治十三年春崔树宝。

斯文虽寥寥短幅，足见其胸中蕴积，有奇气，匪俗士所能道其只字。更于壁间见一绝句，题为《桃源山访崔子玉》，诗云："寂寞遥天带晚霞，云深何处是君家。渔人未识桃源路，不问樵夫问落花。"知其相与过从者，亦为一时隐逸清高之士。名山得名士足迹往还其间，草木云烟，当时亦颇不寂寞。厥后伯振亦尝设馆山中，吾友刘允之，即出其门。高蹈前修，杳不可复睹，伯振闻亦于近岁以病死。桃源山松梨故宅，近复展转以归他氏有。家山沦落，名士漂零，吾辈游人过其侧者，犹徘徊不忍去。而允之年来牢骚避世，执教鞭于碣阳成美学馆。课余之暇，时或于荒凉云树间，追寻陈迹，故山函丈，形影依稀，纵有松风泉石，亦岂足以塞允之之悲也！

桃源山今主为浙江陈氏，现在燕京，供职督府。闻以束钱四万串购得之。于梨园中构一居宅，颇幽雅。惟以移

借道路，与山中人涉讼，恐不得久居此。信乎尘海深山，清浊异趣之扞格不相容也。余居山中，每入城，过陈家山（陈氏改为陈家山），辄羡叹不置。盖吾侪野人，久怀厌倦风尘之思，曩尝与同志抱买山之愿，而苦于无钱。噫！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斯则吾与青山之缘遇何如？且当于吾与黄金之缘遇何如卜之矣！

碣石山中，猛兽绝少，惟傍晚则有狼狐等小兽出没。曩者亦尝有虎豹藏匿其间。数十年前，樵夫尚于平斗峰上得一死豹，近以人迹日多，兽类避去。故独行深山中，了无顾忌云。

余自山中访允之，再往始遇。盖余以京友函招，须西上，且当旋里一行，故匆匆立谈片刻，仅为子默介绍，恐其独处山中嫌寂寞也。迨自家返昌黎，复与子默、允之等入山一次，居成美学馆二日，备受杜瀛州夫妇之优遇。宗教家之诚恳与世，其爱綦宏，感且不绝于余之心矣。惟此荏苒十日间，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山中十日，游兴未尽，其中庵龙潭、瀑布泉、仙人顶、石佛洞等处，则期以后日焉。

（1913 年 11 月 1 日《言治》月刊第 1 年第 6 期）

我的自传

一八九〇年，我出生在离北戴河大约百里的海滨。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

第二年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学校里学习启蒙科学。这是我学英语的开端。在那儿我度过两载光阴。然后我到天津进入北洋法政学校，有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

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恰好在这时，我的朋友要我到东京来与他们一起继续我们的学业。现在我们正愉快地生活在这里。从这个时候起，我要靠书本和墨水台来充实我全部生活中的流年岁月。

（1915 年）

编者按：该文系作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的英文作文，由黄真、姚维斗译成汉语。

介绍哲人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者，近代之伟人也，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也。彼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唱导博爱主义，传布博爱之福音于天下，扶弱摧强，知劳动之所以为神圣。身为贵族，而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挥额上之汗，以从事劳作，此其德行之美为何如耶？

氏之言曰：人之性质，本由灵性与兽性相合而成，然皆为兽性所蔽，故灵性失其光明，徒求满其物欲。人之往往自蹈于可怖之罪恶中、忧闷中，而沉于暗惨之坟墓者，以此矣。人若了悟，当弃可卑之物欲，使兽性服从灵性，离自己之利害，增进他人之安宁幸福，人始得入于灵界，享永远美丽之心灵的生活。夫人之真相为无限发现之爱，爱者实崇高无对之理，体既通于神明，先天内容之动机，天真自然之情也。即一切道德之渊源，自他融合之，胸中之光明也。沮碍此爱发现之物及物欲之满足，皆为罪恶博爱之牺牲者，即死于肉而生于灵者。故人当有不惮为博爱而死之觉悟也。

嗟呼！托氏生平著作，充栋汗牛，一经杀青，传译殆遍，自谓倾终身之生活于墨汁瓶中，此其抱负可谓豪矣！为文字字皆含血泪，为人道驰驱，为同胞奋斗，为农民呼吁，彼其眼中无权威，无富贵，无俄罗斯之皇帝，而欲以貔貅之威屈之，千万之富动之，使之稍变其主义，彼惟悍然答曰："否"而已。

托氏人格之崇高，气魄之雄厚，足为兹世青年之泰

斗，暇当布其全传，摭其学说，以饷吾最亲爱纯洁之学子。兹先以数语，介绍于此云。

（1916年8月20日《晨钟报》）

别　泪

华氏，神京世族也。府第齐云，建筑极其壮丽，流衍日久，别为三支：甲支专好结交官僚豪霸子弟，因之浸染恶习甚深；乙支习与游侠者游，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丙支则多文弱书生，尚清谈，喜批评是非，文人墨客，常近接之。三支中甲乙二支，势力相埒而不相睦，而以丙支之势力为最微。于是群相与谋，咸谓非亲近甲支，不足以自存。

一日，过丙支之门，院落沉沉，碧梧荫蔽，牖户恍闻有少女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自繁叶丛枝中送出。微闻曰："吾爱乎，行且与君子暂别矣！妾有满腹离愁，不知从何说起，妾今谨托于临别赠言之义，有所渎陈，愿君子勿拒，幸一垂听。明知此日已不足以回君子之心，异日者，倘有忏悔之机，万一忆及妾临别之语，于愿足矣。……"以下喁喁细语，似互相应答者。少顷，又闻少女曰："君子昔时，不曾一失足与彼辈为伍乎，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此事君子至今犹引为遗憾万千，君子不尝向妾自白矣乎！曾几何时，此伤心之痛史，君子遽欲从人以促其再演，妾固知非君子之初心，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君子明达，奈何见不及兹耶？今兹絮絮之谭，在君子今日，或不一顾，然妾固逆料君子，终有思及妾言之一日也。妾今行矣，但祝君子此后之行动，勿过于随波逐流，不断崖绝壁之前，稍一自持，天不绝

人，沉沉堕落之深渊，君子或能自崖而返，妾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徙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今与君子别矣！珍重珍重！”少女言已，匆匆出门，与少年握手后，犹以泪眼频顾少年，始掉头去。

少女何人乎？盖华族丙支中一少年名迪穆者之未婚妻桐子也。桐子幼孤，与华家为姑表亲，因寄居华家，迪穆颇善视之，桐子亦以身许。嗣以迪穆仍欲亲近甲支，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深以为不可，惟以云英未嫁之身，未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且即干预之，恐亦无效，遂决然去而之他，业看护妇。临别对于迪穆之谏言，声泪俱下。厥后迪穆不至从甲支之败子，同为异姓之豪强所误，陷于可怜之境者，未始非桐子濒行之言，时回旋于其脑海中有以致之。而迪穆后日，于艰难困苦中，与桐子相遇，竟得其援助，相逢话旧，盖不胜今昔之感矣！

（1916年9月4日《晨钟报》）

《甲寅》之新生命

大易之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因之宇宙间，循此律以为生存者，其运命之嬗蜕，亦遂莫不由固定而趋于流动，由简单而趋于频繁，由迟滞而趋于迅捷，由恒久而趋于短促，此即向上之机，进化之象也。

《甲寅》者，亦于天演中而有其生存之资能者也。故亦不能外此大法，而不从此大机轴以为回旋；故亦不能不择其适于生存之道，以顺应厥环境，环境而之画也。《甲寅》不能自封于浑环境而之杂也，《甲寅》不能自守于一环境而日趋于流动也，《甲寅》不能自拘于固定环境而日趋于频繁也，《甲寅》不能自止于简单环境而日趋于迅捷也，《甲寅》不能自胶于迟滞环境而日趋于短促也，《甲寅》不能自废于恒久。今日之世界进化，其蜕演之度，可谓流动矣，频繁矣，迅捷矣，短促矣。《甲寅》于此而欲有以自贡以求助，进其功能则自所自尽之努力，亦宜千百万倍于畴昔也。

今《甲寅》蜕化而为周刊矣，是一周一《甲寅》也，是《甲寅》一周而有一新生命也。今《甲寅》蜕化而为日刊矣，是一日一《甲寅》也，是《甲寅》一日而有一新生命也。此《甲寅》之努力也，此《甲寅》之进化也，由是更进而谋以其自身之努力，奋发我国民使之努力，以其自身之进化，开导我国民使之进化，此又《甲寅》之唯一责

任。所愿自勉，以与我国民共勉者矣！

（1917年1月28日《甲寅》日刊）

可怜之人力车夫

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圆，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

夫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然以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京中人力车夫之所由日多者，乃概为救死问题，其他人道、经济之说，皆救死以后之事也。

吾人既一时无善策，以拯此惨苦社会于风沙牛马之中，则不能不望以警察之力干涉车主（指出赁人力车者）之设备。俾奔走劳瘁之车夫，稍受涓埃之保护，或足以聊慰其不平之情乎？

北京浊尘漫天，马渤牛溲都含其中，车马杂踏之通衢，飞腾四起，车夫哮喘以行其间，最易吸入肺中。苟有精确之观查，年中车夫之殟卧而死者，必以患肺病者居多。应令车主每车备一避尘口囊，警察告以理由，令车夫于行路时使着之，一也；冬时备一双手囊，二也；夏时备雨衣雨帽各一具，置车箱中备用，三也。此等事，若由警察督饬车主为之，所费不多，而车夫之受其惠者厚矣。惟关心社会者图之！

（1917年2月10日《甲寅》日刊）

北美之风云儿

——罗斯福请愿出征

北美合众国前总统罗斯福君，世界之风云儿也。其与当代唯一之怪杰维廉二世相见时，辄相视而笑，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之概。

美、西之役，罗氏尝充义勇军，纵其健儿之身手，以驰驱于龙骧虎斗之战场，而无所于怯；欧战之顷，亦尝挺身于演坛之上，虽遭刺客之狙击，血溅十步之外，尤必终其说而后已；迨夫解政之后，猎于非洲之深山中，与猛兽相搏而卒能擒之，此其所谓拔山盖世之雄矣。

今也，美、德绝交，战衅之开方在旦夕，罗氏果奋其雄飞迈进之素志，霹雳一声，为愿率其四子从军之请，全美之人闻之，其感愤兴起为何如者！

大地之上，铁血横飞，苟欲图存，宁容鼾睡？嗟我邦人，闻罗之风者，可以兴矣。

（1917年2月18日《甲寅》日刊）

哭沈汉卿君

沈君观，原名冠英，字汉卿，直隶滦县人，留学日本高等师范，研究文学。顷有友自东京寄书称：君已于月之十一日，弃浊世而溘然长逝矣！吾接此耗，不啻天外飞来，不知是真是梦，而此陈述噩耗之书，固俨然陈于吾之目前，而绝无丝毫之伪妄，其乍疑为梦幻者，不过惊哀之极，转欲避其实境，以求自解之念，转瞬之顷，已足确证吾最高洁诚笃之良友，真于此世与吾侪生死辞矣。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数日前，君自热海归东京，尚有书寄余。盖余前曾函告君，谓将介君入神州学会，并望君广结同志，大昌讲学之风，君覆书称甚表同情。该书系四号自东京发者，而今展读回环，墨痕宛在，而寄书之人，已成隔世矣。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君寄此书，其中尚有附寄某某二君书各一通。其一则陈述其友某君已得半官费留学日本，不久可抵东京，并有某君可以同往，从此益将不孤。辞意颇极欣喜，惟中有绝痛之语曰："弟近日视食息都为多事"，"视提笔作字如肩担大粪"云云。其一则系某君由日归国时，有书笥托运输业运来吾国，此物竟至失迷，属君一为寻觅，君故报告此事，谓"数旬不得要领，又不值得起诉"，遂云"大地之上，任人读之可也。"细味所云，似厌离浊世之神趣，已流露于不知不识之间。曾几何时，吾之慌惰，手持此书，尚未为之转达，而书中痛语，竟成凶谶矣。呜呼！云天万

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吾几上所陈之报，阁中所列之书，或尚未启封，或尚未开卷，皆君自海外购以寄余者。其在平时，吾之志薄力弱，不得尽读之，中心所愧恧者，不过辜负良友之厚意而已。今也，物在人亡，此种品物乃长为吾思吾良友之纪念，增吾痛惨之材料，吾真不忍读之，吾又安忍不读之。吾即深抑其痛而强读之，亦安能尽其一行乎哉！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三月以前，君在东京闻《甲寅》杂志将赓续出版，乃驰书告余，谓渴望《甲寅》出世，如大旱之于云霓，且述其近来颇思参悟佛理，愿《甲寅》辟一余栏，请都中佛学宗家，于焉说法。即最近函中，亦复殷殷问吾索《甲寅》日刊以慰渴怀。吾之慌惰，未及为之寄呈日刊，而杂志又以事不能即出。曾几何时，吾哭君之文，即登载于君所渴望之《甲寅》日刊中，而君竟以不见《甲寅》而遗憾终天矣！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有君在东，吾之友往东京者，吾辄托君为照拂一切。数月前，某君抵东之日，正君卧病之时，而吾不知也。君既以病，不克往东京驿迎某君，乃转托他友为之，嗣更来书道歉，其殷情有若此者！曾几何时，前日托君迎导之人，即今日送君灵柩之人，一棺累然，重洋远涉，狂涛落日，归魂何依！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暴袁既殒，共和重光，君乃于去岁暑中一省故里，吾侪行李之寄留东京者，君皆一一为之照料，运归吾国，既而家居月余，遂来北京，吾是时适在《晨钟》报社，留君居社中者数日，吾以《晨钟》创刊，事颇纷忙，未暇共君畅谈胸臆，寻游胜迹，君遂匆匆旋里。旋里未久，又复东渡矣。谁知此一别也，竟成诀别，海枯石烂，遽相见期，

追思往事，黯然魂消矣！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吾于去岁四五月顷，再往上海，君及沈君芸生，送吾于横滨舟中，更购罐头鲜果多类馈余，江干握手，珍重而别。余在上海，尚时时得君由东京所寄之手书并书报杂志等，而今闭目以思，一一历溯，其人其事，如在眼前。而遽闻兹噩耗，且传此噩耗者非他，即为去岁与君携手送余于横滨舟中之芸生君。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先是，吾于去年岁首，即往上海一次，兼周而归东京，乃与君及他友数辈，构居于高田村之月印精舍，屋外为芜园，君常散步其中，屋后有古刹祠宇，凭假山而建，假山之前有池，池畔植梅花、樱花多株，开轩尽在目中，此即吾与君促膝谈心、临窗眺望之所也。而今江户樱花，又将绽矣。试回思去年今日之月印精舍之景象，生者既各风流云散，而死者且于兹世永无相逢之期矣！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君于去年考入高等师范文科前，曾与吾同寓早稻田青年会中，或高咏诗歌，或共作球戏，相处甚欢，尝以愿研究文学就商于余，余则以文学为不祥之物，浸淫于其趣中者，辄穷愁万状，不复能与俗世处矣，研此与否，惟自择之为言。君则以我良心上喜欢如此，虽与俗世迕，骚罪万千，吾苟自以为快乐，其快乐乃无穷，遂决习文学。居东二年，学费常有不给，盖已艰苦备尝矣。去年始获考取官费，方谓君从兹可以遂十年读书之志，异日所造，必能于吾国文学界呈一异彩矣。何图志未遂而幽郁以夭厥身，文学界又丧一有望之青年。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君自少年，即慷慨重节义。辛亥之役，滦州起义时，

君适在该处第三师范读书，颇与吾乡少年谋所以赞助义师。及袁氏帝制自为，君在东辄激昂悲愤，对于称表劝进之人，尤所痛疾。而今觍颜寡耻之夫，犹复洋洋自得，扬眉吐气于光天化日之下，而笃诚爱国之子如君者，反不得终其天年，此真所谓天道宁论者也！呜呼！云天万里，东望扶桑，吾安得不肝肠痛断耶？

吾国有为之青年，本甚孤弱，而尤以吾直为甚。直省之内，尤以吾永为甚。统计吾永留东者，不过二三人，今复丧此良材，斯固不仅为一乡之痛。而吾直笃学之士之殒于异域者，胡次朴先生之后，兹其第二。近又闻赵君瑾卿亦以劳瘁卒，郑君天章复以穷愁死矣！吾乡少年中之具有血气者，无之则已，有则皆以夭亡，而庸暗懦弱若吾侪者，乃反在不生不死之天，既哭吾友，又痛吾直，更悲吾乡，吾真不知云何以叩彼苍而问之。如使真有彼苍而能问之，吾直欲问吾直人，果曾作何罪孽，而一而再以夺我良士，竟如兹其酷也！

君固素好悲观之一青年，居恒不苟言笑，盖其沉忧抑郁者深矣。此次罹疾，竟以不起，真因所在，吾今尚未悉其详，但就好作悲观之一事，已足为其致疾之一因，可以断言。吾侪青年，固当引君为鉴，而以自作其气，力求超脱乎欲世之烦累，勿复蹈其覆辙。然而君之所以致疾者其悲观，而所以造成君之悲观因而忧伤顑颔以死者，则又此罪恶之社会也。吾望吾青年，出其奋发活泼之精神，与兹罪恶之社会宣战，使之日进于光明。君九泉有灵，庶或可以瞑目乎！

吾初识君于天津，而未尝深谈，迨后君之东京，余迎之于东京驿头，汽车一声，乃此仆仆风尘中之青年与余缔交之纪元。由今忆之，真有不堪回首者矣！君家世犹未深悉，此则余所愧怍于亡友者。君性纯孝，但观其居东时，

接曾祖母讣音，辄泣涕竟日，足以征之。今君之噩耗，一旦传于里门，父老遗族，泪眼相望，东问海天，以迓君之英魂，其惨苦凄怆之情，又当何如者！此则可以逆知矣。余今于肝肠痛断之中为此文以哭吾友，点滴俱下，拉杂书之，直不知是墨是泪！报幅所限，权即终结于此。吾之文有时尽，而吾之痛固无穷期也。呜呼！

（1917年2月21日—24日《甲寅》日刊）

蔷薇缘欤？蔷薇恨欤？

伊萨般若，美国加州（California）孟脱雷地方之一西班牙种美女也。夏曼将军由墨西哥取加州时，女方十七八岁。夏曼将军一日率兵至海上一渔村，得与少女伊萨般若相遇，儿女英雄，约成眷属。将军遂结其胸前所佩颜色浓艳之蔷薇一朵赠之少女，而此花乃为一支山吹花，可知此际之夏曼将军盖已英雄心绪乱如丝矣。少女受之，不忍见此花之枯萎，乃取沃土培之，逢春辄呈灿烂之观，今犹以夏曼蔷薇见知于人间也。嗟呼！新花枝胜旧花枝，自是无心念别离，夏曼将军一去，楚水湘云，杳不知其音耗，而此多情重义之女，则海枯石烂，此盟无渝，五十年后，尚信将军之必还而无疑。去今三年前，忧伤之余，已长辞此夏曼蔷薇之荫，而于他界寻未了之因缘矣！绵绵此恨，宁有穷耶？至今过其宅者，尚见此有花无实之夏曼蔷薇，掩映于半朽之柴扉中，徒留此薄幸负心之纪念，令人长怜薄命少女之孤魂，而不禁兴“去年今日，人面桃花”之感也。

（1917年2月28日《甲寅》日刊）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少年为人生之最好时光，新春为一年之绝好季节。故少年当与新春为良友，饱尝其甘美，饫饮其温和。而新春实为少年黄金难买之至宝，宜惜分惜寸以爱怜之，不可轻轻泛泛听其虚掷以去。盖新春者，少年之灵魂；少年者，新春之化身也。

都会为罪恶之渊薮，少年为光明之泉源。故少年而居都会，易生厌倦之思。都会而有少年，易播罪恶之习。当兹春光妩媚，飘然展其新绿之姿，托于自然万象以显著其容态。都会少年，正宜拨其积日累月所生厌倦之郁感，罪恶之习染，而白暴其活泼锐新之性灵，坦然以与自然之美相接近，相神交，藉慰长年困乏的、沉滞的、抑郁的、局促的生活之苦。

都会少年而欲事此者，则新春旅行尚矣。夫旅行之事，最有裨益，最有趣味。自近世交通机关之发达，物质文明之积重，都会生活之困惫，人事职业之繁杂，日增其度，而旅行之必要与利益亦与之俱加。为其足以舒劳人精神上之疲乏也，助学子智识上之实验也，亲接自然灵淑之气象也，湛深人类爱美之感情也。彼欧美少年之旅行，足迹所至，动辄遍于寰球。日本少年，亦常相结队漫游于吾国。是欧美之少年以世界为其室家也，日本之少年以东亚为其室家也，独吾国之少年，尚复醉梦沉沉，以室家为世界，甚且并室家堂奥中陈列之物犹不知其颜色形态，以与欧美日本之少年相比较，其精神上、知识上之贫苦为如何

者？矧当桃李争妍、风月宜人之际，以活泼之少年不思冒跋涉之劳，以探自然之美，致使名山草木，绿野烟云，徒令无知之鸟兽享其美丽幽清之趣，岂不大可惜哉？

就北京附近而寻足供旅行之名所，若西山，途程最近。次若津浦路线之济南，就近可登泰山。京张路线之居庸关，京奉路线之山海关，中途可登碣石山（即昌黎山）、莲峰山（即北戴河），皆为铁路经行之地，路程不过一二日即可抵达。就中以昌黎县之碣石山，余知之最稔，其中胜境颇多，登五峰绝顶，茫茫渤海，一览无既。逢春则梨杏桃李之华，灿烂满山；入秋则果实累累，香馥扑鼻；余如松风泉石，皆足涤人尘襟。距京约以一日乘汽车可达昌黎，山在城北八里许。余频年浪迹都会，每岁归里，辄过昌黎，入山一憩，久溷于机械诈伪之人世中，骤与此不知不识纯洁优静之草木泉石为邻为友，其快愉清醒正如乍释重荷，刚出泥途，有非居都会者所能梦见者矣！

连日出步街衢，浊尘腾飞之中，顿见点点新绿，绚缀枯寂若死之北京，因忆碣石山中，梨花春雨，正如结少年伴侣，披蓁攀石，拨雾荡云，以舒积郁，以涤俗烦，以接自然，以领美趣。惜以人事草草，身羁京华，如斯美景竟不可即，徒叹无福，为之奈何？然而山川名物，宁独碣石？燕市少年，正逢春假，自然之美，我虽不能即，而甚愿人能即之。泉林之春，我虽不能亲，而甚乐人能亲之。故特作斯篇，以引起都会少年新春旅行之兴趣，而为少年与新春之介绍，并为少年与自然之介绍。我爱少年，我爱新春，我爱自然；我尤爱我少年以新春旅行记，为少年与新春与自然缔结神交之盟书。行矣，都会少年！行矣，新春旅行之少年！

（1917年4月7日《甲寅》日刊）

旅行日记

昨晚八时三十五分，由北京乘京奉通车出发，幸乘客不甚拥挤，余因得二三尺地以容身。车中灯光暗澹，众客多沈沈睡去，余则手一第三卷第二号《新青年》杂志以消旅闷，时亦在似睡非睡之间，但觉车轮轧轧之声与验票者之怪声狂吼，常触耳鼓，最为可厌。盖余尝见日本车中验票者之一团和气，每入一车必鞠躬道歉，倘遇有睡熟之客，亦必低声附耳向之索票，惟恐有所惊扰于人，如吾国“票来！票来！”之声浪，含有最可憎恶之趣味者，殆绝无有此。虽小事而足与旅客以不快之感者至多，彼其气焰纯与仗官势之恶差悍役相类，绝不似营业者之照应顾客也！夜半，车抵天津，有新登车者互相争嘲，此种现象亦足令人伤心。同胞相与之际，毫无一种爱敬逊让之情礼以相维系，长此相凌，将何以国？余未尝游过欧美，彼邦人士相与之际，视此何若，余不敢知。睹此，又令人想起日本人之在电车，少壮者见老幼者，或携重物者来，必起而让之座，以与吾因争座，每致互相怒骂，互相扭打者相较，吾人宁不愧死？尝闻张溥泉先生言，彼往欧美最喜看者是其社会。所谓社会者，非指素相认识之朋友，素相亲爱之家族而言，乃谓素不相识之人，于萍水相逢之际，各有一定之情谊，相当之礼让，真正之社会关系，恒于此处见之，吾国则无有是。今观乎此，益觉其言之可思也！

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军失败之地，白亚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

均于此地就义焉。余推窗北望，但见邱山起伏，晓雾迷濛，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正驰想间，曙光一线，滦州城已映入余之眼帘，更联类忆及辛亥之役，张绍曾将军拥一师劲旅，虎踞此处，与吴绶卿、蓝天蔚二将军谋取燕京，震摇根本，煌煌一电，足寒清廷之胆，而十九信条之颁布，遂为逊位诏之先声，此其遥助义军之声势者，不少也。惜乎机事不密，绶卿既遭人暗杀，张君亦被迫去职，蓝君又不得不去兴京，此蓬蓬勃勃之北方民军之势力乃大受挫折，卒以三营之众为最后之牺牲，最后之纪念，此诚吾人今日思之犹有余痛者也！使吴、张、蓝三君之计画实现，则民国何至有癸丑之役，何至有西南之役，又何至有今日之局面也？厥后，蓝君竟未一握兵权，张君虽曾任绥远将军，时袁氏称帝之阴谋已见端倪，张君一日语人云："有某在，彼何敢称帝？"为袁侦所悉，旋即解职矣！由是观之，张君之志，不可谓不大，其气亦不可谓不勇，惜于深沈二字，尚欠工夫。国家多难，老成相继凋谢，求足备干城之选者能有几辈？如张、蓝其人者正宜厚自修养，为国自爱耳！

抵昌黎，下车投大德增客栈。便饭毕，已八时顷，倩店伙为雇骡车一辆，驱之入碣石山。桃杏梨花均已落尽，惟有苹果海红之花残余数株，点缀于万绿丛中，似专待此迟至之看花人者。先至隐仙庵，道士出为导引，遍览其祠观神堂等。庭前有牡丹数丛，桃梅一株，颇茁盛。由隐仙庵至五峰山下，车不能进，乃舍车攀石磴寻樵径而上，至山腹约半时许，一路松风飒飒作响，与唤啭铿锵之山鸟相应和，恰如山中之自然的军乐，所以慰安游人攀登之疲

倦，并助奋其进行之勇气者也。比至韩文公祠，汗已浃背，守祠人刘翁克顺年已六九，不相见者三年于兹矣，渠尚能相识。彼于去岁续娶一老媪为之作伴，故久居空山亦不寂寞。翁媪为余用松枝烹茶，并煮米粥一盂，菜蔬则盐渍椿芽与酱腌鸡子而已，食之颇有清趣。余由东面登望海峰，以天气不甚清明，但见东南一带，茫茫无际，天水莫辨也。二时许，下山驱车返大德增栈时，投宿之客纷至沓来，大概皆吾乡人之赴关外者，盖此时正归里商人赴东之季节也。间亦有女眷至，余询店伙，以彼女眷等何往者？则答以将往关东。今年乐亭一县，女眷之往东者不下数百人，其故以东省钱毛汇至家中损失过巨，商人遂纷纷迁其眷属至东云。余闻之颇喜，盖东省商人以吾永七为最多，永七之中尤以昌、乐、临、抚人为众，是等县人之向来往东经商者皆不携眷，所以终不能植深厚之根据于东省，今则渐渐觉悟矣。国人多一个定居东省者，即日本人少一个侵入东省者，斯不独一乡之幸也。明晨南归，尚有陆路八十里，余容续陈。

（1917年5月9、10、11日《甲寅》日刊）

乐亭通信

抵里以来，纷于亲朋之访问，未遑执笔为吾报作通讯。兹以少暇，辄择乡间村落中之清新空气，足以舒都市之苦倦者，约略述之。倩邮筒运输于北京，化无用为有用，以羡余补不足，此亦变地利用之经济也。

吾友容君伯挺，尝为余言，真正之舆论在乡间，不在都会。以余之所经验者证之，诚为不谬。民国创建，吾侪以为数千年帝制，由兹推倒，不能复萌矣。而乡间父老独以为未安，谓不久将有皇帝出现，真主出现也。无何，袁氏果称皇帝。时余辈归乡辄告农村盼皇帝、盼真主之父老曰："尔等之皇帝、真主今真出现矣，将施其惠泽及于尔等矣。"彼等惊相问，究为谁某？应曰："袁世凯"。则复愀然蹙额，交口怨詈，而其望穿秋水之皇帝及对于皇帝之迷信，至是乃多灰冷失望矣。于是乡间舆论遂一转其盼皇帝、盼真主之心理，而归于詈袁氏，骂袁氏，万口同音，谓袁氏皇帝之迷梦必不能显诸事实也。无何，袁氏果自毙。此次外交问题，乡间亦颇注意，相见必询以"加入有何好处？"吾人于此，殊苦无相当之语以答之。而其对于黎大总统之爱戴，则又有口皆碑，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不惟不可漠视，且校都市中人，共和则群趋共和，帝制则群趋帝制，徒为一时势力之气焰所驱役，以致丧其识察之真知直觉者，真实确正万分矣。

由是言之，则知选举总统，当归其权于国民总选举，

不当界之国会议员，为其议员在都城行此，不如国民在乡间行此，于人物之择别，校为确当，于意思之表示，校为自由也。

乡间初夏，四野麦陇青青，遥望村落，人家烟树，俱于沈寂清静之中，呈出乡间生活之自然趣味。闲尝漫步其间，觉田园之一草一木，鸡犬之一吠一鸣，童叟之一簑一笠，无在不与都市异趣。语其特征，则是等景物声色，均为于应和掩映之间，询绘点缀，以成乡间沈静之姿之资料而已。

吾乡久旱，麦苗均渐枯槁，农家待雨孔急，争在庙宇神前作祈雨祷，仍无验兆。月余以来，麦粉腾贵，粮价陡涨，农父相见，辄为唏嘘，谓今岁麦已丧其有秋，长此旱魃，大秋收获，亦将无望。农民惟一之希望，乃在以汗血滴滴之辛劳，易一丰年耳。倘丰作一失，则生计之苦，殊难谋救济之途。以此思忧，忧可知矣。

永郡南部昌、滦、乐、临一带，皆滨渤海，鱼盐之利颇厚，惜民间无集重资经营之者。盐自袁氏督直时，收归官办，层层剥削，民怨沸腾，永七之民，困于盐祸者有年，居民每有集众抗官毁局之风潮，迁安、乐亭屡见不一。近闻归盐商包办矣，其积弊病民，恐官商无择也。渔业则绝无振作之象，惟见乡间挑贩呼卖鱼虾而已，厚利坐弃，滋可惜也。

乐亭史香崖先生，学识渊博，藏书最富，闻有《图书集成》一部。先生殁后，此物辗转易人，现储于邑城某当铺中，渐有散佚，似此巨制，应由公家团体购置保存，补其零失，以备文献之征考。否则宏编巨制，沦为断简残篇矣。惟关心图籍者，留意焉。

直隶政团分为二派，一为公民协会（闻已更名公民俱进会），由旧国民派及旧民主系、旧政友系联合而成；一

为政治研究会，由除去旧民主系、旧政友系之旧进步派组织而成。近以为明年议员改选之准备，纷纷在各县设立分会。乐邑则仅有公民俱进会已告成立，入会者颇为踊跃，举定刘某为正会长，崔某、刘某副之。鄙陬之区，对于组织政团如兹其勇，谁谓吾民无宪政上之进步也哉！

（1917 年 5 月 28、29 日《甲寅》日刊）

雪地冰天两少年

黄沙迷目，白草萦足，雪地冰天中，一少年武装作远行。时方隆冬，朔天凛冽，少年须眉尽冰雪，项间围以狼皮，里犹带血未尽乾，似中途猎获即用刺刀剥下者。

少年方昂头阔步迈往直前，若有预定之路程期于必达者。猛抬头，见一团落日将西沈，前路高山峻岭，横无去处，少年徘徊于此者约二十分钟许。

途望山下，有一处松林森列，其中山石夹隙处，斜庇作檐势，荆棘丛之。少年行至其处，出自来火，一面焚，一面拔刺刀剪其根干，忽自火光中跃出巨兽，狂吼怒奔，向少年猛扑，少年急移身避之，幸怀中手枪尚实弹，连击数粒，巨兽仆，细视之乃一黑熊。

天已黑暗无光，狂风四起。少年剥熊皮铺地，脱行囊，出天幕列之，食乾糇少许，饮保温器中水，然后抱枪实弹卧。

少年行至此，已历数月之久。糇且尽，身已疲，而壮志不稍屈。微一合目，旋即似睡不睡，默念此广漠之山川，至今人迹绝少，荒原大野，徒供兽蹄鸟迹之纵横，岂不可惜，想西人之发见美洲新大陆，不知冒几多难险，哥仑布始能告厥成功。今吾人若欲经营此广漠之土地，虽经披榛棘，驱虎豹，越国辽远，以为筚路褴褛之开拓。然以视彼之重洋万里，泛孤舟于海天茫茫之中，而寻世未前闻之新世界者，其难易险夷，已不可以道里计矣。又念迩来生计之困，使一般少年多集中都市，日向恶浊之政治潮流中求生活。无论求之而得者，百不得其二三；就令求即得之，而政局之翻云覆

雨,朝得之而夕旋失者,亦复比比皆是。且即其所得者,而细揣其滋味,酸辛痛苦,始已备尝。此种生涯,亦复为稍有志气之男儿所不屑。曾何如出关越塞,抱罗滨孙飘流孤岛自辟生活径路之决心,将来所成,必不止个人之生计蒙其福利已也。念念相缘,百感俱集,不觉无限心事皆在此一个天幕中。正寻思间,忽闻弹声数响,少年急起,抱枪出天幕,枪声,群狼怒嗥声,弃马悲鸣声,一时毕集于少年之耳鼓。少年尾之以观其动静,忽悲鸣之马寂然无声,忽群狼之怒嗥又作,忽对面之弹声愈急。少年逆知是必旅人为群狼所困,不得已而先弃其马,群狼得马势稍缓,马尽更欲噬人矣。少年乃急实弹向群狼猛击,死泰半,狠势稍退。斯时对面呼曰:"吾友盍协力以殄此当路之豺狼?"少年应声曰:"诺。"斯时枪声如联珠不绝,狼势大杀,皆远逸。少年于黑暗中握其手而慰之曰:"勿怖! 我当助君。"其人曰:"谢君厚意,微子吾几遭所噬。"少年曰:"子何来? 请至吾天幕中告我以究竟。"其人曰:"善"。乃与少年相携入天幕。

少年曰:"子饥乎? 予行囊中尚余乾餱少许,尽之勿惜也。"其人曰:"吾尚携有乳并,吾引火烤而食之。子第尝保温器中水尚温否?"少年曰:"尚温,子试饮之。"于是且食且谈,谓少年曰:"予此行可谓长途旅行,予自蜀西入藏,经新疆至此。或以步行,时或乘马。适才为狼所噬之马,乃藏中土人赠予者。日行数百里,今日贪行未早息,至为群狼所迹。此健步之马,竟为最后之牺牲,惜哉!"言次慨叹不已。继问少年曰:"子何来? 亦有以告我呼?"少年曰:"予年来颇思只身作万里游,以为荷枪刃,裹餱粮,走人迹罕到榛莽塞途荒寒寂寞之山岭间,固男儿丈夫事。遂步行出万里长城,越大兴安山脉,沿戈壁沙漠,经库伦,西至札萨克,而后抵此。途次曾数遇马贼与猛兽,予皆奋斗退之。即此天幕之所在,适亦为黑熊所盘踞。"少年言已,笑形于色,觉冒险远

行之趣味，今日思之既足以自豪，而于雪地冰天豺狼当道之绝域，无意中得遇一知己，尤足以自慰也。

二人在天幕中，披地图，大约已至阿尔泰附近，盖距科布多不远矣。少年慨然曰："方今世界多故，欧洲全境罹于兵火，俄以摧败之余，人民复欲睹平和之曙光，以改革内政为急务，单独议和之说，已现诸事实。此后西北一带，将生重要之形势。且吾国今日，南北搆衅，日寻干戈，内争不休，其结果并内部而不能保，何论边疆？狡焉思逞之邻邦，终必负之以去。吾侪少年，宜抱西北发展之志，及早经营之。内部治平则保障西北以固吾圉，内部纷争则建立一新邦而备联邦之分子。此真中华少年飞跃之好舞台，吾侪盍即为之前驱?"后至之少年曰："善！予抱此志者久矣。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镕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达此之程叙，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而与异民族相抵抗。吾子既有志于此，盍即先由联络蒙、回入手，以诚笃之精神感之，然后徐谋教育之推行，实业之发达。坐言起行，请自吾辈始。"少年跃起曰："壮哉！吾友。起！起！起！行！行！行！"

二少年乃拔天幕，肩行囊，且行且谈，直向科布多。时天方初晓，旭日东升，皎耀之光线，恰与昆仑山巅洁白之雪相映。若以代表少年之精神而预示其未来无限之希望，前途无量之成功。

伟哉！雪地冰天两少年！壮哉！雪地冰天两少年！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3册)

致若愚、慕韩

若愚、慕韩两兄：

我到山中已将旬余，未能修函来告，实以交通不便之故（此间离城十里许，信到京只须一二日，惟此十里许之交通甚缓）。

我所居的地方名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椅，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兄等盍来此一游乎？夜间八时由京登车，次晨天明即到，车票三等票现金四元余即足到此，生活费甚简，弟可作主。东行二三站，即是北戴河、山海关，大可一游。

弟钊白

（1919年8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致郁宪章

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磴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羡煞也。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诗肃天问函中，馀不白。此致宪章兄

弟钊顿首

（1919 年初秋）

什么是新文学

现在大家都讲新文学，都作新文学了。我要问大家："什么是新文学？"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

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

现在的新文学作品中，合于我们这种要求的，固然也有，但是终占少数。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夹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充塞满幅。长此相嘘以气，必致中乾，种种运动，终于一空，适以为挑起反动的引子。此是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吾辈应速为一大反省！

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在没有深厚

美腴的土壤的地方培植的花木，偶然一现，虽是一阵热闹，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萎！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自北京寄

（1920年1月4日《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

五峰游记

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

我们那晚八时顷，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到滦州车站。此地是辛亥年，张绍曾将军督率第二十镇停军不发，拿十九信条要胁清廷的地方。后来到底有一标在此起义，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

车站在滦州城北五里许，紧靠着横山。横山东北下临滦河的地方，有一个行宫，地势很险，风景却佳。而今作了我们老百姓旅行游览的地方。

由横山往北，四十里可达卢龙。山路崎岖，水路两岸万山重叠，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而景致绝美。由横山往南，滦河曲折南流入海，以陆路计约有百数十里。

我们在此雇了一只小舟，顺流而南。两岸都是平原，遍地的禾苗，都很茂盛，但已觉受旱。禾苗的种类，以高粱为多，因为滦河一带，主要的食粮，就是高粱。谷黍豆类也有。滦水每年泛滥，河身移徙无定，居民都以为苦。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虽有时受害，而大体看来，却很富厚，因为他的破坏中，却带来了很多的新生活种子、原料。房屋老了，经他一番破坏，新的便可产生。土质乏了，经他一回滩淤，肥的就会出现。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新生活创造者。可惜人都是苟安，但看见他的破坏，看不见他的建设，却很冤枉了他。

河里小舟飘着。一片斜阳射在水面，一种金色的浅光，衬着那岸上的绿野。景色真是好看。

天到黄昏，我们还未上岸。从舟人摇橹的声中，隐约透出了远村的犬吠，知道要到我们上岸的村落了。

到了家乡，才知道境内很不安静。正有“绑票”的土匪，在各村骚扰。还有“花会”照旧开设。

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是由陆路来的，约有八十里。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毙。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是碣石山的一部，离车站十余里，在昌黎城北。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车不能行了，只好步行上山。一路石径崎岖，曲折的很，两旁松林密布，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筑在山上，大概窗前都有果园。泉水从石上流着，潺潺作响。当日恰遇着微雨，山景格外的新鲜。走了约四里许，才到五峰的韩公祠。

五峰有个胜境，就在山腹。望海、锦绣、平斗、飞来、挂月五个山峰环抱如椅。好事的人，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祠。下临深涧，涧中树木丛森。东南可望渤海，碧波万顷，一览无尽。我们就在此借居了。

看守祠宇的，是一双老夫妇，年事都在六十岁以上，却很健康。此外一狗、一猫、两只母鸡，构成他们那山居的生活。我们在此，老夫妇很替我们操作。

祠内有两个山泉可饮。煮饭烹茶，都从那里取水，用松枝作柴，颇有一种趣味。

山中松树最多，果树有苹果、桃、杏、梨、葡萄、黑枣、胡桃等。今年果收都不佳。

来游的人却也常有，但是来到山中，不是吃喝，便是赌博，真是大杀风景。

山中没有野兽，没有盗贼，我们可以夜不闭户，高枕而眠。

久旱乡间多求雨的，都很热闹。这是中国人的群众运动。

昨日山中落雨，云气把全山包围。树里风声雨声，有波涛澎湃的样子。水自山间流下，却成了瀑布。雨后大有秋意。

(1919年8月31日、9月7日《新生活》第2、3期)

自然与人生

（一）

有一天早晨，天刚破晓，我的小女在窗外放出一群她所最爱的小鸡小鸭来。她便对他们说、笑，表示一种不知怎样爱怜他们的样子。

一个天真的小孩子，对着些无知的小动物，说些没有意味的话，倒觉得很有趣味！

她进房来，我便问她为什么那样爱那些小动物？她答道："什么东西都是小的好。小的时候，才讨人欢喜，一到大了，就不讨人欢喜了。"

不讨人欢喜的东西，自己也没有欢喜，没有趣味，只剩下悲哀和苦痛。

一切生命，都是由幼小向老大、死亡里走。

中央公园里带着枯枝的老柏对着几株含蕊欲放的花，显出他那生的悲哀，孤独的悲哀，衰老的悲哀。

（二）

迟迟的春日，占领了静寂的农村。篱下雄鸡，一声长鸣，活绘出那懒睡的春的姿容。

街头院内，更听不着别的声音，只有那算命的瞽者吹的笛子，一阵一阵的响。

"打春的瞎子，开河的鸭子。"这是我们乡土的谚语。

鸭出现了，知道春江的水暖了；瞽者的笛响了，知道乡村的春来了。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家家都有在外的人，或者在关外营商，或者在边城作客。一到春天，思人的感更深，诸姑姊妹们坐在一团，都要问起在外的人有没有信来。母亲思念儿子，妻子思念丈夫，更是恳切；倘若几个月没有书信，不知道怎样的忧虑。

那街头的笛韵，吹动了她们思人的感怀，不由的不向那吹笛的人问卜。

也有那命薄的女子，受尽了家庭痛苦，尝尽了孤零况味。满怀的哀怨，没有诉处，没有人能替她说出；只有那算命的瞽者，却能了解那些乡村女子的普遍心理，却能把她们的哀怨，随着他的歌词弦调，一一弹奏出来，一一弹入她们的心曲，令她们得个片刻的慰安。那么，乡村里吹笛游街的瞽者，不只是妇女们的运命占卜者，实在是她们的痛苦同情者，悲哀弹奏者了。

（三）

我在乡里住了几日，有一天在一邻人家里，遇见一位和蔼的少年，他已竟有二十岁左右了。

我不认识他，他倒认识我。向我叫一声“叔”，并且自己说出他的乳名。

沉了一会儿，我才想起他是谁了。他是一个孤苦零丁的孩子，他是一个可怜的孤儿。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了，那时他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孩子。

他父亲死的时候，除去欠人家的零星债务，只抛下一个可怜的寡妇，和一个可怜的孤儿。

他的母亲耐了三年的困苦，才带着他改嫁了。因为不

改嫁，就要饿死。

他的母亲照养他成人以后，他又归他本家的叔父母，不久便随他叔父到关外学习生意，如今他是第一次回家了。我问他道："你去看你的母亲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的母亲照养你一回，听说你回家了，一定盼望你去看她，你怎么不去看看她呢？"

他说："怕我叔婶知道了不大好。"

唉！亲爱的母子别了多年，如今近在咫尺，却又不能相见！是人情的凉薄呢？还是风俗习惯的残酷呢？

（四）

死！死！死！

自从稍知人事的时候，提起这个字来，就起一种恐怖心。

去年夏天在五峰避暑。下山的时候，瘟疫正在猖獗。路经四五十里，村里尽是哭声，村边都是新冢，死的现象，几乎把我包围了。

我当时在这种悲哀恐怖的境界里走，对于"死"的本质，发生很深刻的思索。

死是怎么一回事？死真是可恐怖的么？死了的人，还有什么悲哀痛苦么？这些问题，都从我脑海的底下翻浮上来。

我当时的感想是：

"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才成无始无终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直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

“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苦痛的,生也是有苦痛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

人为什么都乐生怕死呢?这都是依恋的缘故。

物理上有一种“惰性”,人性亦然。由天津往上海迁居,对于故居,总不免有些依恋,其实上海的新居,未必比天津旧居有什么苦痛。冬天早起,临行冷水浴,望见冷水总觉得有些战慄。跳入其中,沐浴顷刻,也还有一种的佳境。出浴后,更觉得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人对着死依恋生,也是一样的心理。

赤裸裸的人生,总不要有所依恋,总不要穿上惰性的衣裳。

我们行了海水浴,行了春风浴,还要时时行自然浴。

死的池,死的岭,都是联络人生与自然的途径。

匆匆又是一年了。我再过昌黎的时候,去年的新塚,已经丛了一层荒草;遥看那荒草里,仿佛又现了青青的颜色了。

东坟一个老妪,西坟一个少妇,都跪在地下哭。那种悲声,和烧纸的飞灰,似乎一样的高低上下。

啊!今日是寒食节了!

我细听他们的哭声,里边都有怨诉的话。大概都是说死者抛了生者去了,死者无知,而生者苦了。

这样看来,在死人前的哭,不是哭死者,乃是哭生者;不是吊坟里的人,乃是吊坟外的人;那山前山后的野哭,不是死亡的悲声,乃是生活的哀调。

(1920年6月20日《新生活》第38期)

《西洋大历史》序

吾友李君泰棻，著《西洋大历史》，首卷已于客岁杀青行世，次卷今又赓刊，属序于余。余不文，何敢序李君之书？

顾晚近以来，聪明俊乂之士，群向政治纷进之途，谁复以穷治学术自重者？而政局俶扰，变幻靡常，大邑名城，恒罹兵火，即有潜修之子，著作之家，亦皆转徙流亡于风尘澒洞之间，喘息未安，乱离踵接，又焉有从容以事著述之暇？以致学术销沉，图籍寥落，方之欧区，固非敢望，即视东瀛，亦愧弗逮。文化凌夷，滋可慨焉！

西史一书，本为常识所需，而当欧风东渐、汉土革新之时，尤宜资为借鉴。求之坊肆，乃无善本之可寻，即间有一二，亦皆病未详备，无足供研考。李君独能于颠沛流离中，斐然成兹制，钜以饷学者，是又安得无感哉？爰书数语，以壮其奋进之志，冀其益加奋励，自跻于世界作者之林。固知李君之成功，必不以是书自画，而是书之价值，亦不以余之一言为轻重也。

乐亭李大钊

（1921年7月《西洋大历史》增订3版）

《黄庞流血记》序

黄、庞两位先生的死，不是想作英雄而死，亦不是想作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无限的敬意！

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争斗史。最后的阶级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以下的空白怎样写法？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1922年3月23日《晨报副刊》）

《清代通史》序

愚尝谓一切历史的记录，皆不过为研究史学之资料已耳！此等编册档案以外，吾人固俨然有一延续永存之活历史在。历史学即以此活历史为所研究之对象者也。一切史书皆为纪述解释此活历史而作，故皆为此活历史所据之领域。综而别之，史学可分为普通史、特殊史二大类，而普通史与特殊史，又各有其记述之部与理论之部。记述的普通史，为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民族史、国民史、人类史等是；记述的特殊史，如经济史、伦理史、艺术史、文明史等是。

夫历史既为延续永存生动无已者，则其迁流于健行不息之时间，新陈代嬗，兴衰迭现，绝无一瞬间停歇；则吾人关于史实之搜求、纪录、解喻、说明之业，亦当精勤弗怠，追从此滚滚不尽之史潮以进，而无一瞬间停歇；俾史料少所散佚，史观益趋正确；此真史学者之盛业，而亦不容旁贷之大任也！盖历尽万劫，史乘之作陈于人间者，悉无完成，悉无终结，时间之推演愈深，即史料之产生愈益繁富，史实之解喻愈益正确；所以一切史书皆不惟重作，且必须重作。故史家之责任，一方宜勤求关于现在发生之史实，载之纪录，勿使散佚，为后世存留较为详确之史料；一方宜就过去之史实，依新史料、新史观，以为改正修补，匡其谬而足其阙。史演无已时，即史业无已时。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

也。

萧子一山，以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一书。书成，执以示愚，愚受而读之。知其书之性质，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述的国民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与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愚故乐为之序。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著为重作中国各史之先声也！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李大钊

（1923 年 12 月《清代通史》初版本）

列宁不死

列宁逝世，全人类的损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损失了一个这样重要的朋友，更使我们感伤无已！

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他曾说过："苟能成就世界革命，即使俄罗斯民族蒙莫大的牺牲，所不敢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列宁的精神气魄，何等仁勇！何等悲壮！

这样一位仁慈忠勇献身于全人类的人，在他的生前不知蒙了多少怨谤，被了多少恶名；直到死后，大家才渐渐的认清了他的为人。可见，说出真理者之遭世僇辱，自古已然，而真理之终能昭著于人间，必恒在说出真理者之为举世所谤毁以后，亦几为人类历史上的常例。

列宁为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维持他的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

（1924 年 3 月 30 日《列宁纪念册》）

挽孙中山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党员　李大钊

（1925年3月孙中山《哀思录》）

狱中自述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

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翌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

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任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又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久已不能成会。近自石曾出京，只钊一人，更无从开会起矣。钊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以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原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允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李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须与俄使接洽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于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画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密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阎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

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画，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苟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李大钊

译　文



世界观

吾人常求人生之理矣！人生之理，即世界观（worldv-iöw）也。于此世界观，虽不能尽括一切人生现象，至少亦为网罗于各人有趣意之现象之一种公分母焉。然当求此世界观时，偏执之弊，终难避免。盖吾人每为外来之各种暗唆所动即为第一难关，就令有最少数者勉强胜此障害，亦将阻于内部之暗唆，触第二暗礁以至于渝溺。吾人究不能虚心坦怀以求世界观，乃为事实之真相。无论虽何，均为个人之倾性所左右。已虽不自知，实则依其倾性各受一定方向之指导。就中最有力者，厥为吾人之气质。此气质实指导吾人世界观之深求，使吾人求适合自己气质之世界观进行不已。吾人而欲依客观的、抽象的思索作成自己之人生观者，迷妄莫甚焉。吾人固尝探求真理矣，但吾人之气质终导吾人于一种特殊之真理，以吾人于此可得熟育吾人个性中原素之适当土壤，且得辩护自己短处之具以自处也。果有绝对之真理，人类亦终弗能达，为其终不能脱于主观之制限耳。故凡求世界观者，精确言之，皆不外于已与环境之间寻一调停之道而已。……

今日吾人所有之种种理论中，其最主要者为政治上之理论，乃系不可争之事实。此即观于报纸，可依其所采之政见而为类别，足以知之。此政治上之理论，包含关于他

---

* 编者按：摘译自《政治与群众道德》

种人生现象之明瞭观念。即如保守党之报纸，关于宗教、文学及其他政治以外之问题，皆与急进党报纸异其意见，其故则政见之对抗，即世界观之对抗表现于外者。从民主主义之进步，政治逐成现代之最高原动力，如宗教之于中世纪然。今日各人之见解，纯依政治的采色而决定，即政治上之见解，同时亦为对于关乎各人利害问题之一切人生现象之见解。要之，政治上之对抗，依然为自古以来世界观之争斗，不过易一新形式耳。其对抗固犹是也。盖此种对抗，乃发于人民性最深奥之所，即前所谓气质者。易辞言之，即发于其人之倾性，而为根于其肉体的与精神的素质之全者也。……

有一端焉为吾人所当常记于心者，即此依气质而定之二种世界观，不可互为争斗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二者同为必要，同为永存。盖全因其依气质而定之故，其相争互持者殆为保持世界之进步使之平流并进耳！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

国家与个人*

每家门上有国旗，到处有凯旋门。

日清的战局终结，今日是大元帅陛下从广岛凯旋日期了。

新桥车站的附近，真成了人海。老少男女，喧哗着，骂着。笑着。人像波浪腾沸的一般。“奉迎圣驾”的旗，红、紫、白、青都在五月的空中翻扬，甚有精采。爱国忠君的精神，空气里也有了。

忽然有两三辆载草的车子，想强冲人群走过去。遇见警官的一声喝叱，就止住了。

忽听背后有叨咕的声音：“什么？畜生奴？甚么这样高兴？喂喂……的闹的讨厌！畜生奴，我们车力厮们怎么呢！”我愕然而顾，顾而又愕然。

立在我背后的，想是一个路傍推车的苦力。头发胡子乱蓬蓬的长着；老黄纸色的脸，更带着青黑色，发出怪光，颧骨高露，可怕的两支洼眼睛，惘惘然现出如饿狼一般的凶光；像是拿抹布凑缀成的单衣，遮不住胸，结绳子作带；光着脚。

群众的里边，有一个小孩子，不提防将那正在吃着的馒头落在地下。那结绳带的男子，飞也似的抢了去，就吃完了。

---

* 编者按：节译自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

小孩子怒了，众人都笑，我要哭。

更没有像饿这样可悲的！更没有像饿这样可怕的！使人吃人肉的是“饿”，使人毁城寨的也是“饿”！

忠君爱国那些话，任凭君罢！

但愿勿使陛下的赤子挨饿就是了！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

哀　音

诸君也。曾在静悄悄的夜里听见过沿门弹唱的人的音调么？我虽不是生来担不住情的人，但是没有过听那哀音而不落泪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何缘故，每听见那哀音必觉着肠子九回。古人说过，一切微妙的音乐都能使听者悲哀。诚然不错。“外讴林”的呜咽，笛声的哀怨，琴音的萧凉，就数到琵琶、钢琴以下的乐器，若是沈心澄耳听着的时候，那一样不引起吾人的哀思来呢！泣哭的人减去苦痛，可哀的乐器，把泪来慰人。暧呀，我是东西南北的人哪！在马关外夜泊的时候，也曾听见和潮声对咽歌声断过肠；在北越的旅况中，也曾听见追分的曲落过眼泪；月明风清的夜在四国海中，也曾听过欸乃的声；雪朝在南萨道上，也曾听过马士的歌。这等时候皆曾感动过我的心，然而没有像那一片街头的声音寸断我的肝肠的！

霜寒物音可闻于十里的夜，月色溶溶如水的夜，昼间的喧嚣变成静悄的都的夜，沈沈寂寂的中间，忽然挑起三弦一声，突然发响倏高倏低，后来音波次第延长往远处走，不知何时全消灭了。开窗一望，满地唯有月色。诸君试静下心去，听这一霎时的音，鸣奏者虽在无意中鸣奏，然在静听的我听了，那三条丝仿佛像缠绕亿万人心的纤维

---

* 编者按：节译自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

一样，那音的一高一低，仿佛像人的欷歔一般，仿佛合亚当以来人间的痛苦烦闷悲哀，都在此时，欲一一诉之于天。一曲人生行路难，真令我有不愿肠九回也不能了。嗳！我因此泣，不知是为甚么的泪。我是自悲呢，还是悲人的悲呢？不知，不知。但在此时感人类的烦闷、痛苦就是了。

天不令才华焕发的诗人歌尽人间的悲曲，令闾巷无名的鄙妇为人间代诉其悲于天。有言的悲不悲，我因为此哀音中有可感不可言的无数的苦、无数的血、无数的泪，所以闻之而哀。

幸恕我的谬妄。我每听见那一曲沿门弹唱的节奏，就像有罪的小孩子伏在慈母膝前哭泣，又像迷于情网的恋人追寻他的所爱飘泊四方的一样感动。每诵“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的句子，我就思想这个哀音。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

李大钊生平大事年表

1889 年 10 月 29 日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1895 年 入本村私塾，读“四书经史”，起学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

1905 年 入永平府中学，接受新学。

1907 年 夏，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校。

1913 年 3 月，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

1913 年 冬，东渡日本留学。第 2 年 9 月，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

1915 年 2 月，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6 月，编辑《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

1916 年 2 月，被推为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民彝》。

5 月，《民彝》创刊号出版，发表《民彝与政治》。

1916 年 5 月，从日本回到上海。

8 月 15 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发表《〈晨钟〉之使命》，高擅自由之晨钟，为再造青春，中华呐喊。

9 月 1 日，在《新青年》第 2 卷第 1 号上发表《青春》一文，系统论述了青春宇宙观，为再造

青春中华提供思想武器。

12月10日，在《宪法公言》第7期上发表《宪法与自由》一文，批判将孔子之道列入宪法。

1917年 1月10日，在《宪法公言》第9期上发表《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一文，指出，中国今日之社会，矛盾之社会也。

1月28日，应章士钊之聘，任《甲寅》日刊编辑。发表《〈甲寅〉之新生》，论述进化之理，鼓舞国民努力奋进。后又发表《孔子与宪法》等文，批判尊孔复古思潮。

3月，俄国发生二月革命，连续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开始倾向社会主义。

11月，到北京大学任职。

1918年 1月，应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

7月，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参与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

11月～12月，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率先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12月22日，与陈独秀、胡适等共同创办《每周评论》。

1919年 4月～5月，负责编辑《新青年》第6卷第5号，将该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协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号”。着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8月15日，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编译部译员和《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

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给胡适的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评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一文。

1920年　1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批判尊孔复古思潮。

2月，护送陈独秀出京到天津。途中两人商讨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陈由天津登轮赴上海。

3月，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

7月8日，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以后，又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课，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概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在北京大学编有《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讲义。

10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进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2月2日，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1921年　1～3月，参与社会主义论战，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

1922年　8月，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由孙氏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3年　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平民主义》一书，该

书是他以往对民主主义研究的系统总结。

6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 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史学要论》。

6月，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五大”。

1925年 1月，中共在上海举行“四大”，未到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分工驻北京。后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6年 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在《政治生活》第62～67期上发表《土地与农民》，以大量资料为根据，论述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

1926年 8月8日，在《政治生活》第80、81期合刊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高度评价农民自卫武装的意义，同时指出自发农民武装的弱点，革命者应到农村积极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 4月6日，李大钊等六七人遭反动军阀逮捕。在狱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撰写《狱中自述》，概述自己为民族独立解放奋斗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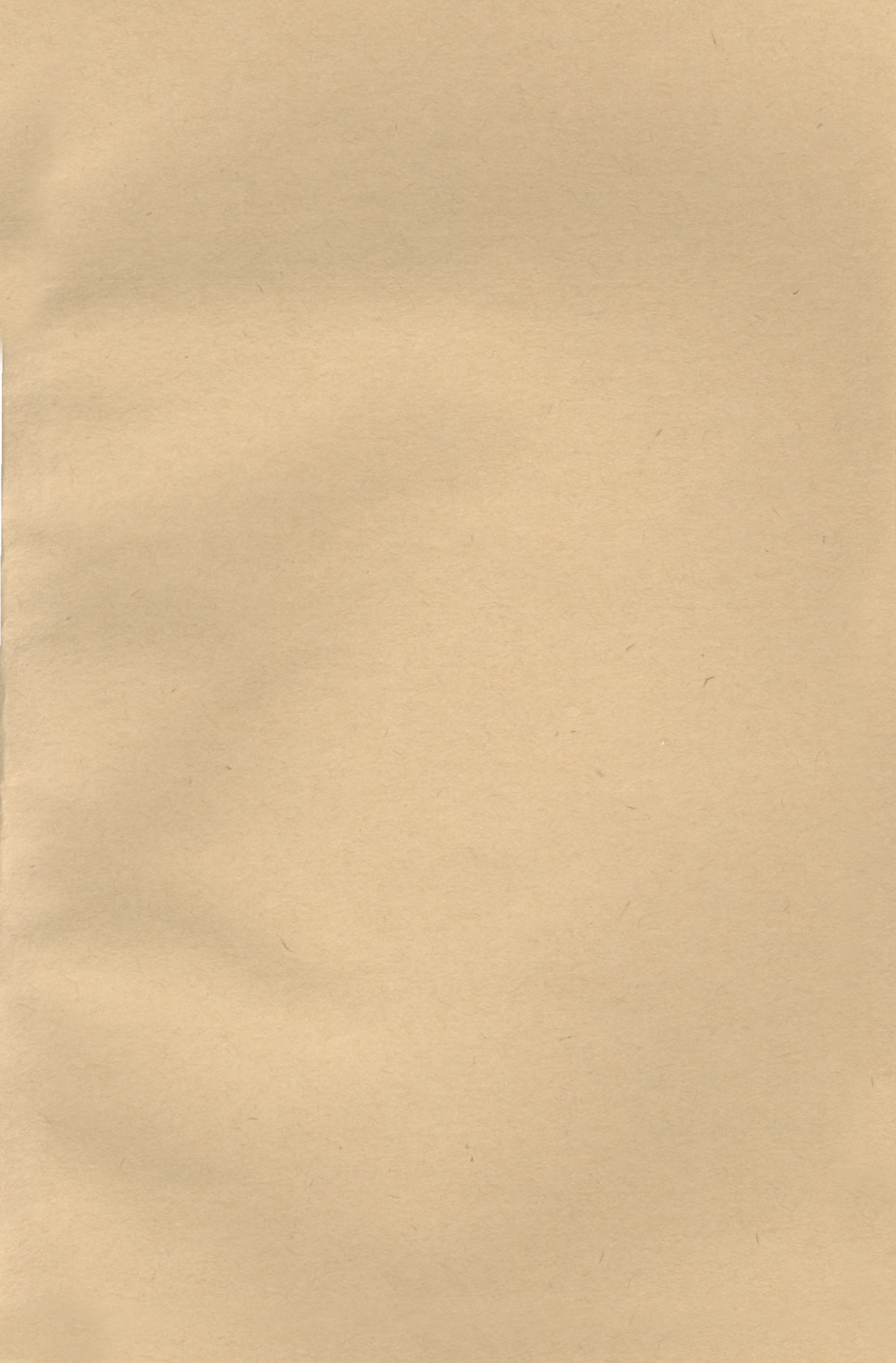
4月28日，反动当局不顾社会团体、学者名流的营救，将李大钊第20位革命者绞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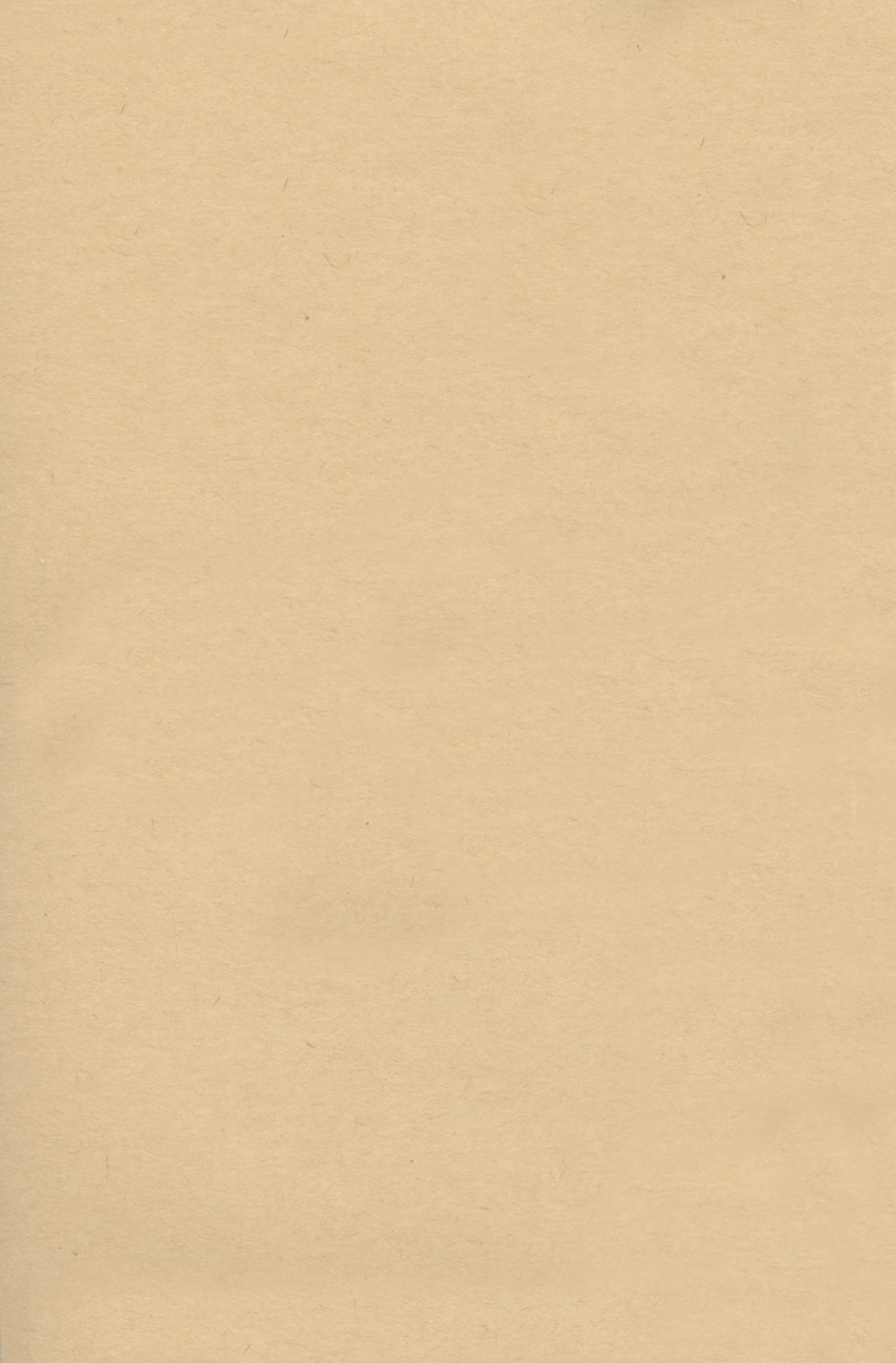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丘桑主编 .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李大钊卷)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
ISBN 7-5060-1106-9
Ⅰ.艰…
Ⅱ.丘…
Ⅲ.李大钊-文集
Ⅳ.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970 号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JIAN NAN DE GUO YUN YU XIONG JIAN DE GUO MIN
丘 桑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2 千字 印张:11.125
ISBN 7-5060-1106-9/Z·83
定价:20.70 元





策　　划　严　平
　　　　　许剑秋
主　　持　黎　松
特约编辑　夏　青
责任编辑　吴玉萍
装帧设计　李颖明



○○○

传记 文粹 年表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史最动荡的年代，也是新与旧的交替、中与西的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因而孕育出了一大批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奇才人杰。本丛书选取其中性情独特、才智超群者凡十三人。寻其传记、自传，选其文章精粹，编其大事年表汇为一册。使读者通过一本书既可知其生平业绩，亦可涉其学术思想。十三人中大多不仅是学者文人，也是政治上的行动家。所以不仅他们的文章反映了时代风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他们个人的生平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轨迹。通观全书，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



ISBN7-5060-1106-9/Z·83

定价：20.70元